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沙俄侵华史

第二卷

THE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VOLUME TW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沙俄侵华史

第二卷

THE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VOLUME TW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说 明

本书第二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余绳武、徐曰彪、刘存宽、吕一燃、谢本书（云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7年9月

前 言

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老朽的农奴制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崩溃。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反封建斗争和非俄罗斯族地区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俄国贵族农奴主阶级为了转移群众斗争目标，缓和国内矛盾，维护专制统治，扩大剥削范围，力图加紧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在俄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日益孕育成熟，使用近代机器的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农奴制的继续存在，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又限制了它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沙皇政府虽然采取高筑关税壁垒、扩大国家订货、发展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扶植资本主义的措施，仍然不能满足资产阶级与日俱增的对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要求。俄国资产阶级渴望征服更多的殖民地，直接用武力夺取市场。这样，俄国农奴主阶级和后起的俄国资产阶级，都疯狂地要求扩张领土。地主阶级传统的扩张野心一经与资产阶级夺取市场的贪欲相结合，就使沙皇俄国的侵略性空前膨胀。

在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统治年代和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统治初期，俄国政府继续在欧、亚两洲的广大地域内实行野蛮的对外扩张，“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①在西方，“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那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②在东方，它先后发动对波斯和土耳其的战争，夺走高加索地区的大片土地；修筑漫长的堡垒线，逐步蚕食哈萨克草原，武力侵入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觊觎浩罕和希瓦等汗国，准备征服整个中亚；此外，它还对日本怀着不可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5—546页。

抑制的侵略野心。

辽阔富饶的中国黑龙江流域，历来是沙俄眼中的一块肥肉。《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国统治集团妄念未消，继续窥伺这片中国领土，不断制定新的入侵计划。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有比较强大的自卫力量，沙俄的图谋未能得逞。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这就使沙俄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

1847年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标志着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进入了行动阶段。1858—1860年，沙皇政府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为进一步侵吞中国大片土地制造了“根据”。

此外，沙俄还扩大了对中国的陆路通商权，攫取了海路通商权、领事裁判权、内地传教权以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侵略特权。这些条约的内容表明：它们违反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庄严规定，粗暴地践踏国与国交往的平等原则，严重地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彻头彻尾的奴役性、掠夺性条约。

应当着重指出，这三个强盗条约全都是沙俄武力侵华政策的产物。沙皇政府一贯奉行“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后盾”的方针，《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订立前，就已穷凶极恶地出动大批军队，先后抢占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蓄意把武力侵占的既成事实强加于中国。与此同时，沙俄不择手段，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有利时机，勾结英、法侵华联军，趁火打劫，一面耍弄阴谋，伪装调停，扮演“诚实掮客”；一面张牙舞爪，实行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叫嚷要联合英、法对华作战，逼迫清政府接受它的蛮横要求。三个中俄条约，就是用这种巧取豪夺的卑劣手段强迫缔结的。

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①恩格斯也指出，俄国插手第二次鸦片战争，“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

河一样长的河流”。^①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俄国掠夺中国大片领土的罪行，阐明了这些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证明了沙俄实际上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得侵略实利最多的一个国家。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外国侵略者为了巩固和扩大从清政府手中得到的权益，对清政府由打到拉，加紧笼络和控制；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为了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也不惜牺牲国家主权，乞求这些外国侵略者给予“援助”。这样，自《北京条约》签订后，便出现中外反动派公开勾结、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险恶局面。沙皇俄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充当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

沙皇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在上海附近的王家寺等地，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同由沙俄参加的中外反革命武装展开血战，狠狠地打击了来犯之敌；在辽阔的东北边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沙俄的武装入侵；直到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许多年以后，当地人民还坚持武装抗俄斗争。历史证明，沙俄侵略者用大炮吓倒了腐朽的清政府，但他们永远吓不倒英雄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亿万中国人民！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37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尼布楚条约》后 150 年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野心	(1)
第一节 1689 年以后清政府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	(1)
第二节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一世沙俄侵吞黑龙江的一贯图谋	(16)
一 彼得一世侵吞黑龙江的野心	(16)
二 “收复失地”的疯狂叫嚣和“假道”黑龙江的无理要求	(17)
三 叶卡捷琳娜二世陈兵中俄边境,图谋“远征黑龙江”	(22)
四 18 世纪末叶起,沙俄加紧窥伺黑龙江	(26)
第二章 沙俄重新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地区和逼签中俄	
《瑷珲条约》、《天津条约》	(32)
第一节 沙俄武力侵占黑龙江地区的准备	(32)
第二节 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沙俄海军入侵黑龙江下游地区	(42)
第三节 沙俄哥萨克军对黑龙江地区的大举入侵	(58)
第四节 中俄阔吞屯“谈判”和沙俄对黑龙江地区武装入侵的继续扩大	(66)
第五节 穆拉维约夫武力逼签中俄《瑷珲条约》	(76)
一 沙俄侵略军兵临瑷珲城下	(76)
二 在沙俄炮口下进行的瑷珲“谈判”	(78)
三 《瑷珲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83)
第六节 普提雅廷的侵略使命和中俄《天津条约》的订立	(87)

第三章 沙俄武力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迫订中俄《北京条约》	(101)
第一节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	(101)
第二节 彼罗夫斯基的敲诈勒索和布多戈斯基的“勘界”活动	(110)
第三节 伊格纳切夫使华及其与肃顺的交涉	(115)
第四节 伊格纳切夫与英、法、美的勾结和中俄《北京条约》 的缔结	(122)
第五节 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和《珲春东界约》的订立	(135)
第六节 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殖民统治和 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141)
第四章 沙俄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150)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160)
附录二 俄文参考书目	(163)
附录三 西文参考书目	(174)
附录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180)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185)

地图目录

1849—1853年沙俄海军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示意图	(44)
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示意图	(102)

插图目录

库页人	(8)
费雅喀人	(9)
清朝德勒恩衙门	(11)
清朝官员向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居民征收贡赋	(11)
1775年三姓副都统给库页岛姓长的谕令	(12)
黑龙江北岸的中国村庄	(13)
首次从海上侵入黑龙江的沙俄兵船“贝加尔”号	(47)
1718年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黑龙江口和库页岛	(49)

沙俄在庙街强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52)
沙俄侵略军在哈吉湾(皇帝港)强建的康士坦丁哨所	(58)
俄国武装船队强行通过瑗琿(1854年)	(62)
沙俄占领下的阔吞屯(马林斯克)	(64)
俄国兵船云集阔吞屯(1854年)	(64)
沙俄占领下的海兰泡	(85)
沙俄占领下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103)
沙俄侵略军在伯力附近强建的营舍	(104)
沙俄占领下的扎依(索菲斯克)	(105)
沙俄占领下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107)
吴大澂等会勘中俄边界铜柱铭文	(140)
薛焕为沙俄“会剿”太平军、“代运南漕”知照吴煦的密札 (1860年12月16日)	(155)
“中外会防公所”吴云等人为英、法、俄侵略军“出队攻打 王家寺”给吴煦的情报(1862年4月4日)	(156)
沙俄公使巴留捷克为波波夫带领兵船来华镇压太平军 致清政府的照会(1862年10月11日)	(158)

第一章

《尼布楚条约》后 150 年间 沙俄侵略黑龙江的野心

第一节 1689 年以后清政府对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管辖

我国东北第一大河黑龙江，源远流长，水势壮阔，奔腾入海。巍峨的外兴安岭，绵亘数千里，是江北原野的天然屏障。江口东南，库页岛像巨鲸卧伏在碧波万里的太平洋之滨，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隔海相望。在这辽阔的地域，山河壮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民世代在这里居住繁衍，用辛勤的劳动，开发和建设了祖国的东北边疆。

正如本书第一卷所述，在 17 世纪中叶，沙俄殖民强盗曾经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妄图把这片中国河山攫为己有。由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才使它不得不停止侵略战争。1689 年，中俄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领土。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即派遣官吏查勘中俄东界，并在额尔古纳河口和格尔必齐河口竖立界碑，碑上刻有满、汉、蒙、俄和拉丁五种文字的《尼布楚条约》约文。1709—1710 年，康熙帝（1662—1722 年）“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① 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在清政府任职的西方传教士雷孝思（原名雷易）、杜德美（原名比埃尔·雅多）和弗里德里等人。他们远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

^① 《康熙实录》，第 246 卷，第 9 页。

页岛等地，测绘了北至外兴安岭的全部东北地图。^①

在行政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库页岛，是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从1757年起改称吉林将军）的辖区。黑龙江中、上游一带，“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格尔必齐河”，“东至外兴安岭之兴（亨）滚河（源）”，“东南至毕占河”，属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亨滚河河源和毕占河以东，“东北至飞牙喀（费雅喀）……海界（鄂霍次克海）”，“东南至希喀塔（锡霍特山脉）……海界（日本海）”，包括被称为“宁古塔所属大洲”的库页岛，都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②

为了保卫东北边疆，防止沙俄“侵界”，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就开始实行严格的巡查边境的制度。康熙时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一书中记载：

每年5月，由卜魁（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和瑗琿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边，至鄂尔姑纳河（额尔古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察视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艾浑（瑗琿）往者，从黑龙江溯舟北上，折而西，过雅克萨故墟，至界碑（即格尔必齐河界碑）”。^③

1765年，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在奏折中也详细地报告巡边的路线和地点：一路自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口，然后自该河口北上至外兴安岭；一路自黑龙江入精奇里江，北行至该河上源托克河口，^④然后至外兴安岭；一路自精奇里江入西林木迪河，经该河上源英肯河^⑤，至外兴安岭；一路自牛满河经西林木迪河至外兴安岭。

根据富僧阿的报告，清政府进一步具体规定：“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⑥、西里木第（即西林木迪）两河间遍查，回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

① 1718年，这些地图和国内其他地区测绘的地图编在一起，进呈康熙帝，名曰《皇舆全览图》（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载《地学杂志》第18卷第3期。并参见康熙《皇舆全览图》）。

②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2卷；嘉庆《大清一统志》，第67卷；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2卷，《库页附近诸岛考》。

③ 方式济：《龙沙纪略》，《述本堂诗集》本，第15页。

④ 托克河，在瑗琿“城西北一千六百四十里，源出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东南入精奇里江。”参见《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4卷。

⑤ 英肯河，也叫英垦河，在瑗琿“城北一千五百里，源出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南入西里木第（西林木迪）河。”参见《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4卷。

⑥ 鄂勒希河，也作鄂勒喜河，是牛满河（今苏联布列亚河）的上源（该河位置见《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安山（即外兴安岭）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必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安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①

从此以后，每年五六月间，便由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副都统各派协领 1 员，佐领、骁骑校各 2 员，兵丁共 240 名，分三路至格尔必齐河口、额尔古纳河口、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祖鲁海图）等处巡视，“谓之察边”。三路察边队伍到达目的地后，“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瘞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瘞木牌以备后来考验，以此为例。”^②

在黑龙江等城官兵巡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的同时，布特哈总管则派遣章京、骁骑校、兵丁等巡查精奇里江、托克河口、英肯河口、西林木迪河、牛满河和西勒莫德河等处，并在这些地方垒立石堆，称为“封堆”或“鄂博”，以标示每年巡查必须到达的地点。

外兴安岭山梁和发源于外兴安岭南坡的各河源，则每隔三年由黑龙江副都统和布特哈总管派遣官兵巡查。各路官兵在巡查期间，如“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③这种定期巡边的制度，始终贯彻执行，从未间断。^④

黑龙江下游一带，则由三姓副都统派遣官兵巡查。1850 年到黑龙江下游旅行的天主教教士维诺尔特也证实：清朝官员每年率领“一支拥有 12—15 只船的小舰队”到黑龙江下游巡查，并派官兵到木城^⑤去，防止高级地方官吏包庇走私贩。^⑥

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和琿春沿海等地，同样年年巡查。三姓副都统和宁古塔副都统负责巡查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琿春协领负责巡查琿春

① 《清高宗实录》，第 743 卷，第 4—5 页。

②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 5 卷。

③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 52 卷。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第 3 卷第 2—3 页载：咸丰十一年（1861 年）十一月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奏：“查乾隆三十年（1765 年）奏定章程，每年派黑龙江城官兵前往格尔必齐河口巡查边界一次，又每届三年赴格尔必齐河源至（外）兴安岭巡查一次。惟上年新定和约（中俄《北京条约》）内载，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石勒喀）、额尔古纳两河汇处，即顺黑龙江下流，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等语。今黑龙江城巡查官兵，如仍照往年查至格尔必齐河河源并（外）兴安岭等处，即深入俄夷地界，与新订和约不符……是以本年巡查边界官兵……将巡查江左河道一差裁撤。”由此可见，直到 1861 年，才停止巡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边界。

⑤ 这里所说的“木城”，位于黑龙江下游敦敦河口附近。敦敦河即今苏联阿纽依河。

⑥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1861 年伦敦出版，第 104 页。

沿海一带，“事竣后，将经由地方情形，汇奏一次。”^①

清政府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设立许多卡伦，派遣官兵驻守。“卡伦”是满语，也称“喀伦”，即哨所。^②

设在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有乌鲁苏穆丹卡伦（位于今苏联境内布谢西北），精奇里江卡伦，毕拉河口卡伦（毕拉河是精奇里江的支流），苏楚纳卡伦（苏楚纳河是西林木迪河的支流），博屯河附近的布特哈检貂卡伦，牛满河卡伦和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北岸的黑龙江口卡伦等。这些卡伦除博屯河附近的检貂卡伦归布特哈衙门管辖外，其余各卡伦都归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③

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有设在伯力附近图勒密的乌苏里江口卡伦，设在海参崴以东的西林河卡伦和雅兰河卡伦，设在绥芬河流域的绥芬河卡伦，^④设在珲春东部沿海的蒙古河卡伦、图拉木卡伦和朱伦卡伦等。^⑤ 这些卡伦，分别由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和珲春协领管辖。清政府在黑龙江以北设置卡伦主要是为了“防御俄罗斯”；^⑥ 在乌苏里江以东设置卡伦主要是为了防止满、汉人等私挖人参；设置布特哈检貂卡伦则是为了征收赋税。

此外，各卡伦还有稽查行人和传递公文等项任务。在上述地区设置卡伦和派兵巡查边境，都是清政府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的明证。

其实，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官方也无法否认中国在上述地区的领土主权。它曾多次应清政府的要求，将违反《尼布楚条约》越界闯入黑龙江地区的俄国人逮捕治罪，“有割耳鼻者，亦有砍手者，大辟者。”^⑦ 例如，1693和1694年，清政府曾两次致函俄国，抗议俄国人偷越边界到精奇里江上游一带捕貂，指出这是违约侵犯中国领土的严重行为，要求俄国政府查拿和惩办越界者，禁止此后发生这类事件，以保证两国边界的安宁。在清政府

① 嘉庆《大清会典》，第13卷。

②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2卷记载：“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满语）谓之喀伦，俗称卡路。”嘉庆《大清会典》第52卷也载：“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曰卡伦。”

③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第16卷；《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西清：《黑龙江外记》，第2卷；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0卷，《北徼喀伦考》；《黑龙江志稿》，第3卷；《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77卷，第1—2页。

④ 《清高宗实录》，第269卷，第11—12页；《始末》，咸丰朝，第30卷，第1页。

⑤ 《清高宗实录》，第276卷，第5—6页；萨英额：《吉林外纪》，第3卷。蒙古河、图拉木和朱伦卡伦，以设在蒙古河、图拉木河和朱伦河畔而得名。这几条河，都在今苏联境内，东南流入日本海。

⑥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33卷。

⑦ 图理琛：《异域录》，卷上。

的要求下，俄国有关当局按照《尼布楚条约》规定逮捕并惩处了私越边界的人。^①为此，沙俄尼布楚统领加加林致函清内大臣索额图说：为了使今后不致因有人逾越两国使臣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所划定的国界而引起争端，为了使今后不致因有人由我国大君主皇帝陛下境内越界而破坏和好条约，鄙人钦遵我国大皇帝陛下谕旨，当贵国差官之面，已将 4 名主犯处以死刑，6 名胁从也予以鞭笞和割耳的处分。对于其余尚未查获的越界者，一旦查获，也将根据和好条约，予以惩处。

1779 年，俄国政府又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将偷越边界进入黑龙江地区的 17 名俄国人，“俱擒向交界处，与天朝（中国）人当面治罪。”^②俄国出版的地图也承认，外兴安岭以南是中国领土，例如，1745 年帝俄科学院出版的《全俄罗斯地图集》，就是依照《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标示中俄边界的。^③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曾承认：“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南坡，按照《尼布楚条约》”，“无疑是中华帝国的领土”。^④

1853 年，沙俄政府给清朝理藩院的照会中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国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固（格）尔必齐河之东山（外兴安岭）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⑤1857 年奉命出使中国的叶·瓦·普提雅廷也毫不含糊地承认，外兴安岭以南地区，“按照条约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⑥

在清代，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各族居民分属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管辖。“黑龙江将军所属”的“打牲部落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⑦“居于额尔古纳河及精奇里江之地”，^⑧“沿嫩江而北”，直至牛满河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 15 卷，《尼布楚城考》；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67 页。

② 《清高宗实录》，第 1089 卷，第 26—27 页；第 1090 卷，第 1—3 页；第 1096 卷，第 17 页。

③ 《全俄罗斯地图集》，1745 年出版，1761 年拉丁文版，总图；分图第 17、19。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1891 年莫斯科出版，第 2 卷，第 80 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 6 卷，第 32 页。

⑥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色档案》杂志（以下简称《红档》杂志）1927 年第 21 卷，第 196 页。

⑦ 毕拉尔，也写为毕喇尔，系鄂伦春族的一支，居于牛满河流域等地。

⑧ 乾隆《大清一统志》第 48 卷载：“国初有索伦、达呼里（达斡尔）两部，居额尔古纳河及精奇里江之地”，继因罗刹侵扰，“移住嫩江”，《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部分回到黑龙江左岸，“仍居旧地”。又《龙沙纪略》载：“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源以南，虞人（打牲部落）鄂伦春地，其众夹精奇里江以居。”

流域和外兴安岭南麓“西里（林）木迪河一带”。^①外兴安岭以南的辽阔原野，是他们驰骋射猎捕貂的地方。黑龙江将军属下的布特哈衙门又称“黑龙江打牲处”，“东北数千里内，处山野、业采捕者悉隶之”。^②布特哈衙门设有满洲正副总管和索伦、达斡尔正副总管，“统理达呼尔、索伦、鄂伦春、毕喇尔事务。”^③不论是索伦、达斡尔，还是鄂伦春、毕拉尔，都有佐领的建制，索伦五旗四十七佐领，达斡尔三旗三十九佐领，鄂伦春九佐领，毕拉尔二佐领。^④各佐领都设有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由黑龙江将军选拔各族头人担任，直接“管理打牲户属”。^⑤

1855年，披着科学家外衣到我国黑龙江流域“考察”的沙俄侵略分子马克也不得不承认：“玛涅格尔人（鄂伦春族的一支）由他们当中推举出来的头人管辖；此外，玛涅格尔人那里还有一名由上司从头人当中指派的官员，他驻扎在呼玛河畔距河口不远的地方，官衔是‘章京’，他的帽子上缀一颗天蓝色的玻璃顶子。这个官员手下有数名领催（拨什库）和一名官吏（哈番），协助他办理事务。”^⑥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勒尔、鄂伦春和恰喀拉等族，^⑦起先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混同江岸（即黑龙江下游）及海中大洲（库页岛）居住之赫哲、费雅喀、库页、鄂伦春、奇勒尔”，划归三姓副都统管辖，“统以吉林将军”。^⑧清政府把这些少数民族以喀喇（氏族）或噶珊（乡）为单位，编入户籍，设喀喇达（氏族长，也称姓长）或噶珊达（乡长）“分户管辖”。^⑨单是噶珊这种基层行政单位，见于清代图籍的就有近百处，“数千里濒江分设，

①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729卷；图理琛：《异域录》，下卷。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卷，《索伦诸部内属述略》。

③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740卷。参见《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

④ 同上书，第740卷。

⑤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740卷；嘉庆《大清会典》，第69卷。

⑥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859年彼得堡出版，第81页。

⑦ 吉林将军所属的赫哲居于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下游一带；恰喀拉分布在尼满河源锡霍特山区中部，和锡霍特山脉以东、岳色河以南，直至琿春东南沿海一带；奇勒尔分布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北部沿海一带；鄂伦春、费雅喀、库页等族分布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

⑧ 嘉庆《大清会典》，第67卷。

⑨ 《清朝文献通考》，第271卷。

东至海滨。”^①喀喇达和噶珊达多由当地各族头人充任，由清朝发给“顶戴，文凭”^②，他们是清政府在这个地区的基层行政官员。

1808 年受日本政府派遣到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进行侦察活动的间宫林藏，也以亲身的经历证实，清政府在这个地区“均设喀喇达、噶珊达指挥当地夷人”，“喀喇达和噶珊达均由满洲官吏任命”，由清政府“颁发文书，盖有官印”，“他们臣属于满洲。”^③

1956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西伯利亚民族志》也承认：在那乃人，（赫哲人）分布的地区，“每个氏族以三姓满汉当局从那乃人中任命的氏族长（喀喇达）为首，村长（噶珊达）受氏族长节制”。“满人不仅给这些人以满清官职和封号（喀喇达、噶珊达等等），并且还根据职位，给予奖赏。所有这些人物都领到专门委任状，上面用满文载明其权利和职务。”^④

马克思指出：“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⑤清政府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管辖，还表现在向当地各族居民征收赋税方面。黑龙江布特哈衙门所属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每丁“岁纳貂皮一张”，^⑥于每年 5 月到齐齐哈尔缴纳。有些部族散处边远，不便于到齐齐哈尔来，则由清政府另外指定纳税地点，派官吏前往征收。^⑦清政府把当地各族居民缴纳的貂皮，按质量分为三等，“如足数及等，赏给总管以下等人缎匹青布有差”；“若数目不足，交与理藩院议处”；“其足数不及等者，免其处分。”^⑧

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各族居民，也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定期按户缴纳赋税。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和鄂伦春等族一年缴纳一次，恰喀拉族二年缴纳一次，每次“每户纳貂皮一张”。^⑨乌苏里江两岸和黑龙江下游的居民，在“宁古塔副都统处输纳”。乌苏里江东南沿海和库

① 康熙《皇舆全览图》；《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大清一统舆图》；《吉林通志》，第 17 卷，第 30 页。

②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 32 页。

③ 间宫林藏：《东鞑纪行》，1942 年东京出版，第 72—77 页。

④ 列文、波塔波夫编：《西伯利亚民族志》，195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789 页。

⑤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8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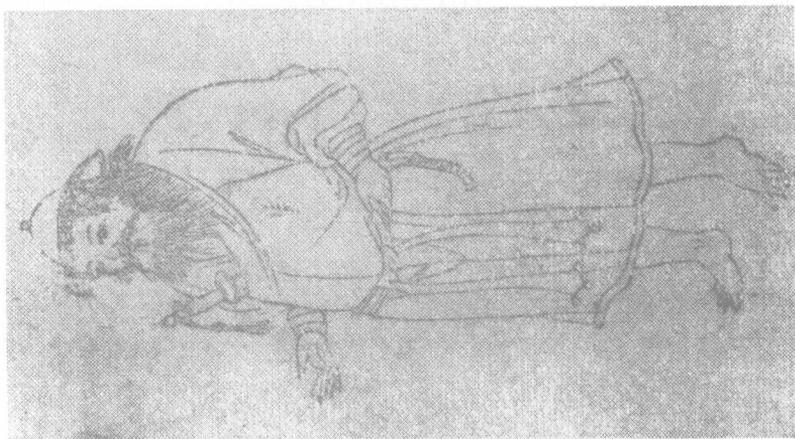
⑥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 5 卷。参见《清朝文献通考》，第 38 卷；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 748 卷。

⑦ 西清：《黑龙江外记》，第 3 卷、第 5 卷。

⑧ 《清朝文献通考》，第 38 卷。参见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第 748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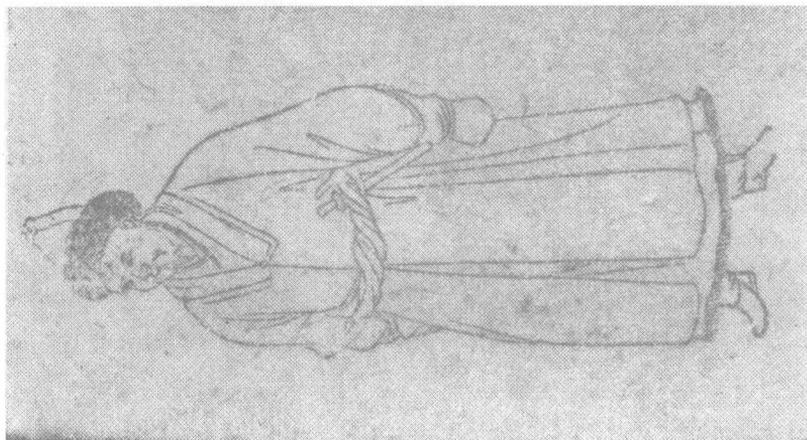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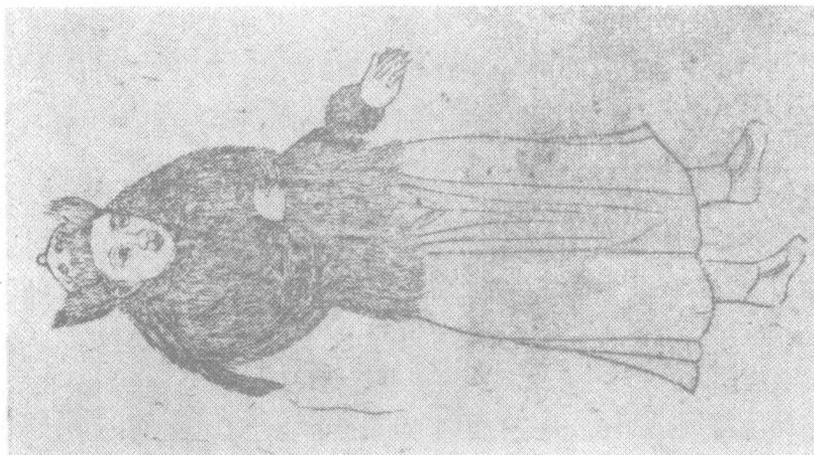
⑨ 嘉庆《大清会典》，第 11 卷。参见《皇清职贡图》，第 3 卷。

庫野居東海島之雅丹達里堪等處男則雜
頂心以前之髮而蓄其後長至肩即截去草
笠布衣綴紅布卍字於肩背間亦有衣魚皮
者性好鬪出必懷利刃婦女幼時即以針刺
唇用烟煤塗之土語謂之庫野話歲進貂皮



库页人（采自《皇清职贡图》）

費雅喀在松花江極東沿海島散處以漁獵
為生男女俱衣犬皮夏日則用魚皮為之性
悍好鬪出入常持兵刃歲進貂皮



費雅喀人（采自《皇清职贡图》）

页岛等地的居民，不能按时到宁古塔，则由宁古塔副都统派遣官吏到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地方和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今苏联布拉瓦附近）等处，设立衙门，就近征收。^① 后来，由于他们改属三姓副都统管辖，收税的地点也随之有所变动。乌苏里江两岸和黑龙江下游奇集以上的居民在三姓城缴纳，奇集以东和库页岛等地的居民在黑龙江下游德勒恩官署缴纳，乌苏里江东南沿海的居民则在莽牛河（也称和罗河，即今苏联霍尔河）附近的官署缴纳^②。此外，清政府还先后在黑龙江下游的奇集屯、敦敦河口的敦敦屯和莫勒奇（也称莫尔齐，在今苏联共青城附近）对岸等处，设置征收赋税的官署。^③ 据嘉庆年间的一次统计：“三姓所属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鄂伦春、恰克（喀）拉五十六姓，二千三百九十八户，每户纳貂皮三张”，共缴纳貂皮 2398 张。^④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各族人民向清政府缴纳赋税的事实，不仅清代官方文献有大量记载，在外国人的游记等著作中也有反映。间官林藏在《东鞑纪行》中写道：库页岛的喀喇达、噶珊达每年率领当地居民前往黑龙江下游的德勒恩，向清政府缴纳赋税。在德勒恩，他亲眼见到了清政府在这里设立的征税衙门，并称之为“满洲行署”。“满洲行署面临满浑河（黑龙江），背为辽阔平野，其间树木苍郁”，“大河宽阔，风浪不大，水流平稳，便于停泊”。“此处，有较高级官吏三人，另有中级官吏以上五六十名”，还有“无法得知具体数目”的“下级官吏”。此外，他还记述了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各族居民到“满洲行署”纳税以及清朝官员在这里监督贸易和处理案件的具体情况。^⑤ 1845—1846 年曾到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旅行的法国传教士布吕尼埃也证实，三姓官厅每年派出官员，沿黑龙江而下，向赫哲、费雅喀等族征收毛皮。^⑥ 马克在《黑龙江旅行记》中也承认：黑龙江上、中游至精奇里江一带的“玛涅格尔男人……从二十岁起缴纳人口税（毛皮实物税），而且必须照政府的要求编入八旗。成年的玛涅格尔人缴纳的赋税为每年一张貂皮。这种赋税由玛涅格尔人自己或由他们的头人送到呼玛河口，满

① 《满洲源流考》，第 8 卷；《清朝文献通考》，第 271 卷。

② 萨英额：《吉林外纪》，第 8 卷。

③ 《吉林通志》，第 17 卷，第 31 页；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 35 页；间官林藏：《东鞑纪行》，第 23 页；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103 页。

④ 嘉庆《大清会典》，第 11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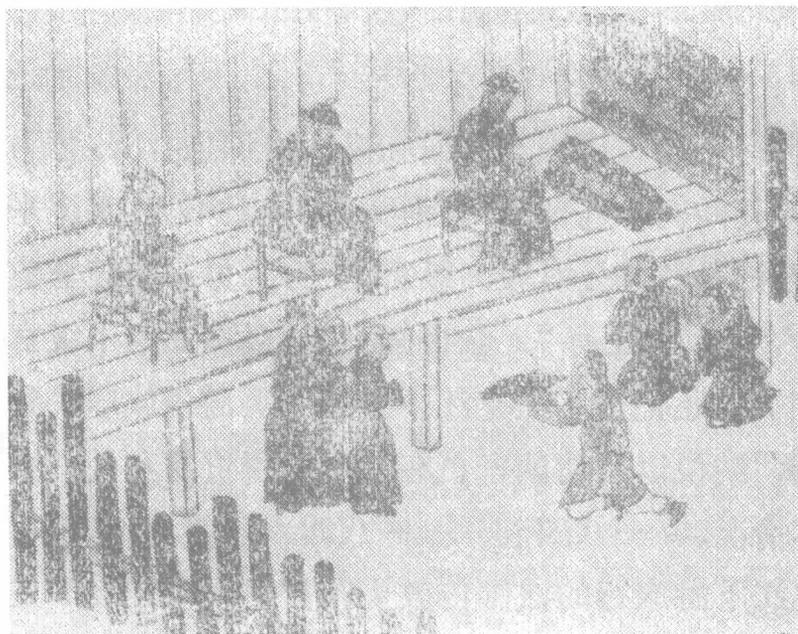
⑤ 间官林藏：《东鞑纪行》，第 28—33 页。

⑥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8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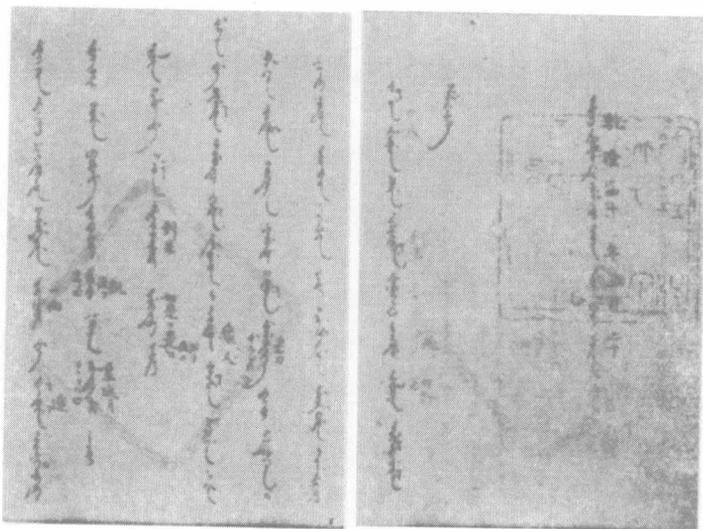
清朝德勒恩衙门

(采自间宫林藏《东鞑纪行》)



清朝官员向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居民征收贡赋

(采自间宫林藏《东鞑纪行》)



1775年三姓副都统给库页岛姓长的谕令

(采自间宫林藏《东鞑纪行》)

洲官员在十二月和三月前来这里征收赋税”^①，“很久以来，满洲官员每年都从松花江来到黑龙江，沿江而下，向附近居民征收赋税。”^②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这里既有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恰喀拉、费雅喀、库页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人和满族人。众所周知，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在沙俄入侵以前，“自格尔必齐河起，至霍尔托库止，^③黑龙江城附近左岸，向有旗户分驻三十余屯。”^④连同汉人村庄算在一起，黑龙江以北地区有满、汉“五十余屯，万余人口”。^⑤

1854年闯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军亲眼看到：“结雅河（精奇里江）东岸是盛产粮食的平原地带，虽然每村人家很少（有七户、九户、二十五

①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137页。

③ 霍尔托库，位于黑龙江左岸、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以东。1857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奏称：“黑龙江口为松黑两水汇流之处，自格尔必齐河至此约程三千八百里……（自格尔必齐河）下至江左之霍尔托库约四千里”（《始末》，咸丰朝，第17卷，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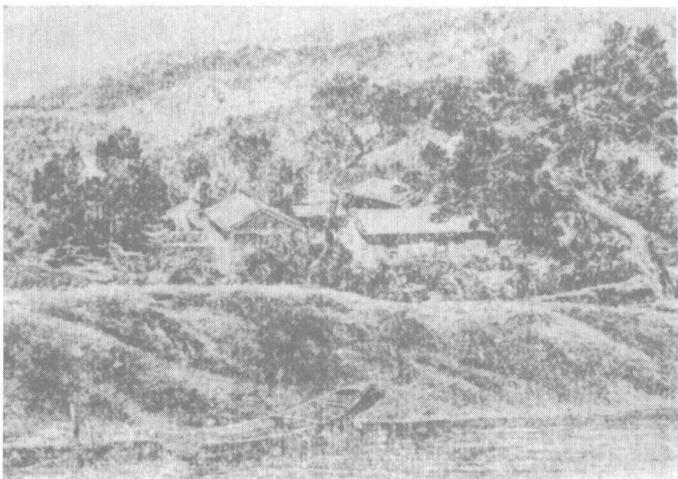
④ 《始末》，咸丰朝，第17卷，第18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45卷，第16页。

户)，但这样的中国村子很多。”^①

1857 年曾到过黑龙江的美国人柯林斯也清楚地写道：“从结雅河到兴安岭，黑龙江两岸居住着满人和汉人，他们从事农业”；“结雅河从汇流处往上，直到相当远的地方，两岸有很多满人的村庄。”^②

英国人拉文斯坦也指出：“大量的满族村落分布在精奇里江的两岸，这些村落有白杨林和枞树林掩蔽，受不到寒冷的北风的袭击，四周围绕着耕作得很好的田野”。^③



黑龙江北岸的中国村庄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历来是清政府“采捕参珠之地。”^④ 捕捞珍珠有专门的满族采珠户，隶于吉林将军属下的打牲总管衙门。每年 5—9 月，官员率领采珠人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各支流寻采。采捕结束后，“各以所得之珠，纳之于官，如供赋焉。”^⑤ 乾隆（1736—1795 年）时人有“元珠素出东海滨，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1959 年海兰泡出版，第 161 页。

② 弗维尔编，柯林斯著：《西伯利亚纪行——从黑龙江到太平洋（1856—1857）》，1962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第 221、313 页。

③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175—176 页。

④ 《始末》，咸丰朝，第 33 卷，第 22 页。

⑤ 萨英额：《吉林外纪》，第 1 卷。

旗丁泗采世其业”；“千家散处江边村，年年泗采贡天府”的诗句^①，说的就是吉林所属满族八旗珠户采珠供赋的事情。采捕珍珠是政府的专利，严禁私人捕捞。俄国人马克也曾谈到，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珍珠贝由清廷的潜水员捞取，其他人一律禁止捕捞，违者处死。”^②

采掘人参同捕捞珍珠一样，也归政府直接管理。“凡刨参，官给以票。”^③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绥芬河流域，是著名的出产人参的地方，这一带的参票，由三姓副都统衙门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发放。^④领了参票，便可带人进山采掘。领票人叫做揽头，挖参人叫做刨夫。这些揽头和刨夫，不是汉人就是满人。尼满、苏城、绥芬等河流域的山地，都是他们采掘人参的重要地点。^⑤依照规定，采人参每年必须向政府“按额交上等好参，挑剩余参，方准赏给售卖。”^⑥

此外，这个地区还有专供八旗使用的各种山场。例如，在兴凯湖东南勒富河一带有镶红旗的“围猎山场”和“采捕山场”，乌苏里江东南雅兰河一带有正黄旗和镶蓝旗的“采捕山场”，绥芬河下游安巴雅哈河一带有正蓝旗的“围猎山场。”^⑦

虽然清政府为了维护专利，曾把乌苏里江以东一带定为禁区，不准汉、满人等随便进入；但是，人民却不理睬政府的禁令，仍然成群结队地进入这个地区，从事开发。1742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向乾隆帝报告说：“宁古塔属之绥芬、乌苏里外，雅兰、西楞暨南海诸岛屿地方，偷挖人参与刺字人犯，十数年间，已聚数千人。以前尚渔猎鹿鱼，摘食榛子过冬，至春夏间偷挖人参，潜至宁古塔、吉林等处发卖。今则与宁古塔、吉林奸商结伙，每岁由宁古塔、琿春等处运致米粮，协济伊等。伊等亦渐次开垦地亩，将参抵换各物，渐立微产。”^⑧在往后的岁月里，汉、满劳动人民继续不断地迁入这个地区定居。他们大都居于山沟河谷，因此

①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13卷、第121卷。

②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164页。

③ 嘉庆《大清会典》，第13卷。

④ 同上。

⑤ 《清宣宗实录》，第65卷，第3—4页；乾隆《大清一统志》，第47卷；嘉庆《大清一统志》，第68卷。

⑥ 同上书，第65卷，第3页。

⑦ 《八旗通志》，二集，第71卷；《吉林通志》，第35卷，第13—14页。

⑧ 《清高宗实录》，第175卷，第14页。

也称“沟民”。

道光（1821—1850年）年间，姚元之曾记载说：黑津（赫哲）“在三姓东三千里外，散处至东海边，……沟民者，杂处于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别种也，盖皆汉民掘人参者，及内地逋逃者。”他们组织严密，“有老大哥为之长，群听令焉”，“条教严明，众不敢犯。”^①这些汉人和满人，祖祖辈辈在这里建设家园，狩猎捕鱼，采掘人参，开垦田地，使“整个边区布满了从事农业的村庄。”^②

19世纪中叶，沙俄入侵者就曾见到，这里有“很多完全定居的汉人和满人，他们的村落……分散在所有的河谷。”^③“他们种植玉米、小米、大麦、小麦、猫尾小麦，还种一些大麻、马铃薯、黄瓜、南瓜和其他蔬菜。所有这些产品既用来满足庄稼人自己的需要，也用来向挖参者出售。天朝（指中国）的居民以他们特有的勤劳从事田地的耕作”，“差不多每一家都有磨盘”，有的还有小型的酒坊。^④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俄国军官阿尔谢尼耶夫也只得承认：“南乌苏里地区小路的开辟，应当归功于中国居民（指汉人）”，“他们取的地名是很确切的，从名称就可大体判断，当地有何特点，河流的走向如何，在大森林中有何野兽，等等。以后移居此地的俄国人大部分保持了中国原有的地名”，^⑤例如，大西南岔、小西南岔、大尖山、头道沟、二道沟、蛤蟆河子、红高粱沟、董家沟、山羊沟、小棵树河，等等。

上述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前，清政府一直在这一广大地域行使主权。这个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中国各族人民的血汗，是他们胼手胝足，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发的。

①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第3卷。

② 布谢：《乌苏里地区》，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1895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第413页。

③ 同上书，第412页。

④ 维纽科夫：《阿穆尔地区、中国和日本之行》，1952年伯力出版，第162—163页。

⑤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1914年伯力出版，第30、55页。

第二节 从彼得一世到尼古拉一世沙俄侵吞 黑龙江的一贯图谋

一 彼得一世侵吞黑龙江的野心

《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较长久的相对安宁。但是，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未变，侵华之心不死。在该条约签订后的150年间，沙俄统治集团一再疯狂叫嚷“修改”《尼布楚条约》，不断派遣间谍潜入我国黑龙江地区侦察，处心积虑地要霸占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

首先是蓄谋卷土重来，侵吞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是沙皇彼得一世。17世纪末，商品生产在俄国已有一定的发展，全俄市场已经形成。彼得一世为了适应新兴商人阶级扩大国外市场的需要，把夺取出海口作为俄国的一项重要国策。黑龙江是亚洲东北部流入太平洋的惟一可以通航的大河，侵占了黑龙江，沙俄便可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此，他在自己的笔记中毫不掩饰地强调“整个远东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对俄国的极端重要性”，^①下狠心要把黑龙江据为己有。《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第四年，即1692年，他便训令出使中国的义杰斯，要“侦察”中国军队在黑龙江流域的动向，以便伺机而动。^②同时，彼得一世用心深远地加强了“黑龙江流域的大门口”——外贝加尔地区的军事力量，并力图把伊尔库茨克和雅库茨克建成沙俄由西向东和由北向南入侵黑龙江的基地。

黑龙江口是从该江通往太平洋的咽喉要地，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因此，彼得一世特别处心积虑地图谋侵占黑龙江口。他曾指示军事委员会主席阿·缅施科夫：“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因为它们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③他还提出：“将来必须在濒临大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④彼得的廷臣沙尔铁科夫甚至把我国的黑龙江与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相提并论，视为俄国的内河，1714年他奏请沙皇在俄

①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40页。

② 班蒂什-卡姆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第63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6页；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1969年美国出版，第246页。按：顿河流入亚速海；涅瓦河注入波罗的海。

④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1914年海兰泡出版，第70—71页。

国各大河口建立造船厂，其中竟包括黑龙江口！^①

1716 年，彼得堡两家巨商请求俄国枢密院准其取道石勒喀河和黑龙江，前往日本等地贸易。为此，彼得的宠臣勃柳斯元帅曾要求西伯利亚总督提供关于黑龙江通航情况的情报，并建议沙皇派遣地形测绘人员到西伯利亚东部和黑龙江一带进行“科学考察”。^②这一意见极受彼得一世重视。1719 年，他命麦谢尔什米特“博士”前往俄中边境地区“考察”。麦谢尔什米特经尼布楚到达额尔古纳河西岸，后来曾潜赴我国呼伦池附近活动。^③1722 年，陆军军官弗·索依莫诺夫向彼得直接提议：“应探索一条沿石勒喀河和黑龙江通往堪察加然后到达日本的道路。”沙皇回答说：“我全知道了。但不是现在，而是必须缓些动手。”^④显然，彼得很赞成索依莫诺夫的主张，问题仅仅在于选择有利的时机。

彼得一世不仅把黑龙江视为通往太平洋的必经之路，而且企图把这一地区变成沙俄殖民势力进一步伸向中国内地的桥头堡。1724 年，彼得曾向他的亲信表示，他打算亲自出马，经西伯利亚“去到通古斯人的地方，直抵中国万里长城”。^⑤所谓“通古斯人的地方”，这里主要就是指中国黑龙江地区。

彼得一世死于 1725 年 1 月。彼得以后的历代沙皇，全盘继承了他的侵略中国黑龙江地区的方针，并且不断予以充实和发展。

二 “收复失地”的疯狂叫嚣和“假道”黑龙江的无理要求

继承彼得一世的衣钵，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1727 年）于即位后不久，便着手研究入侵黑龙江的问题。1725 年 9 月，沙皇政府命令为划分中俄中段边界和扩大贸易出使中国的萨瓦，要“尽可能慎重地探知中华帝国的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⑥，并查明取道黑龙江开展对远东贸易的可能性。^⑦

① 勒·别尔格：《俄国地理发现史纲》，1949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24—25 页。沙尔铁科夫奏折全文，参见叶菲莫夫《伟大的俄国地理发现史片断》，1949 年莫斯科出版，第 104—105 页。

② 叶菲莫夫：《俄国考察太平洋史片断（十八世纪上半叶）》，1948 年莫斯科出版，第 88 页；伦森：《俄国向日本的推进：俄日关系（1697—1875）》，1971 年纽约出版，第 35—36 页。

③ 葛列科夫：《1725—1765 年俄国地理发现史概要》，1960 年莫斯科出版，第 16 页。

④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1963 年伦敦出版，第 149—150 页；叶菲莫夫：《俄国考察太平洋史片断（十八世纪上半叶）》，第 205 页。

⑤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杂志 1929 年第 25 期，第 17 页。

⑥ 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196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 111 页。

⑦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 481—482 页。

萨瓦在使华过程中积极执行这一指示，回国后向沙俄政府呈交了从中国窃取的许多极为重要的“精确情报”，提出了武装占领黑龙江的方案。他认为，中国“是一人口稠密、防御很差的富饶国家”，“因此，俄国在远东经济方面和领土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①他建议立即在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边境地区修建要塞，配置炮兵，并就地制造大炮，^②以便对中国施加压力，伺机入侵。在1730年的《秘密情报》中，他给沙皇政府设计了6条从西伯利亚向中国扩张的道路，其中有3条要通过黑龙江：一条是通过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水路，然后经陆路到盛京（今沈阳）；一条是经黑龙江到鄂霍次克海，再从海上经天津到北京；一条是由尼布楚经齐齐哈尔直达北京。而为了占有黑龙江“需要一支强有力的舰队”。^③这样，按照萨瓦的意见，黑龙江竟是沙俄势在必夺的向中国内地扩张的捷径要道！

同年，他还向沙俄政府呈送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力量和现状的秘密情报》，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收复失地”。他叫嚷，俄国如对中国作战，“在几年内不需要费很大气力，就能清除黑龙江的西部地区和中国在黑龙江北岸建筑的一切堡垒，收复尼布楚和约时割让的全部土地。”到那时候，黑龙江将摆脱“中国的占领”，边界将成为“光荣和有益的边界”。他甚至认为，只要“俄罗斯帝国与欧洲邻国能有持久的和平，国库能在开支之外积蓄几百万卢布”，就可以发动一场“占领中国”的战争！不过，他估计这种战争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俄中贸易将完全停顿；“西伯利亚人和全俄罗斯的臣民将陷入贫困和破产的境地”；而中国人民将全力武装自己，变得更加尚武。因此，他建议沙俄政府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必须三思而行。^④萨瓦的报告充分说明了沙俄统治集团的色厉内荏：他们一方面极端狂妄，恨不得一口吞下黑龙江甚至全中国；另一方面又极端虚弱，十分害怕具有光荣的反侵略斗争传统、永远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

在萨瓦出使中国的同时，沙俄政府还派遣以白令为首的“第一次堪察加勘察队”到东北亚和北太平洋一带进行“探险”活动。1730年，“勘察队”成员舍斯塔科夫驾船到达乌第河口外善塔尔群岛，并进窥黑龙江河口

①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中译本，第133页。

② 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1949年纽约出版，第30页。

③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中译本，第199页。

④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373—375页。

湾,测量了那里的水深。^①同年,白令返回彼得堡,向沙皇政府提议由他本人进一步“勘察”由堪察加南端到黑龙江口直至日本北部的海路。^②沙皇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再派出“第二次堪察加勘察队”,仍由白令率领。在 1732 年 5 月,俄国枢密院关于派遣“第二次堪察加勘察队”的训令中,明确地把调查黑龙江特别是探测黑龙江口作为该队的主要任务之一。^③

根据白令的“勘察”计划,1735 年夏天,“勘察队”重要成员、帝俄科学院院士米勒尔和教授格麦林从伊尔库茨克到达尼布楚,搜集有关中俄边界的资料,准备做翻案文章。接着,1737 年 7 月,米勒尔派出测量人员斯科别里琴和舍其洛夫由尼布楚启程,“寻找”通往鄂霍次克海的通道。这支有 20 名哥萨克护送的队伍逾越中国边界,深入精奇里江上游古里河(基柳依河)一带,然后到达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他们一路上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窃取了大量情报。^④次年,他们又沿黑龙江而下,窜到离雅克萨四十英里的地方。^⑤1741 年 9 月,“勘察队”派海军准尉谢利金和地形测绘员格沃兹杰夫等从鄂霍次克出发,测量乌第河到黑龙江口的海岸。谢利金等虽然没有到达黑龙江口,但于次年 8 月间侵入了库页岛东岸附近北纬 $50^{\circ}10'$ 的海域。^⑥

1740 年,白令第二次“勘察队”的活动尚未结束,沙皇安娜就迫不及待地命令米勒尔起草了关于黑龙江的《备忘录》。米勒尔按照主子的旨意,极力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胡说该约是“被迫签订的”,“违反国际公法”,“俄国上当受骗了”,而现在正是“揭露已犯的错误,赶紧补救”的时候!^⑦他极力主张“修改”《尼布楚条约》,重新划分中俄东段边界,并强调

① 叶菲莫夫:《伟大的俄国地理发现史片断》,第 112—118 页;葛列科夫:《1725—1765 年俄国地理发现史概要》,第 45—49 页。

② 宾杰尔:《世界地图上的俄国人名》,1948 年莫斯科出版,第 14 页。

③ 诺维科夫-达翰斯基:《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8)》,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 4 册,1958 年海兰泡出版,第 83 页;叶菲莫夫:《俄国考察太平洋史片断(十八世纪上半叶)》,第 234—235 页。

④ 诺维科夫-达翰斯基:《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8)》,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 4 册,第 83—84 页;葛列科夫:《1725—1765 年俄国地理发现史概要》,第 132、159 页。

⑤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68 页。

⑥ 法因别尔格:《俄日关系(1697—1875)》,1960 年莫斯科出版,第 31 页;葛列科夫:《1725—1765 年俄国地理发现史概要》,第 108 页。

⑦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 250—251 页。

在向中国交涉时，必须坚持“俄国重新占有黑龙江左岸，或者，至少也要获得顺黑龙江到堪察加和日本的航行权。”^①

米勒尔的这个《备忘录》与十年前萨瓦的《意见书》一样，充分反映了俄国封建贵族和商人阶级掠夺领土和追逐巨额利润的贪欲，在沙俄统治集团特别是西伯利亚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收复黑龙江”的声浪，甚嚣尘上。伊尔库茨克副省长郎克看了《备忘录》后，首先表示赞同。^②接着，堪察加有人向彼得堡提出占领黑龙江的方案，认为“从海上，即从黑龙江口着手”，“收复黑龙江”是可行的。^③1746年，白令的助手契里科夫又上书彼得堡，建议在黑龙江口设置哨所，并要求中国政府许可俄船在黑龙江上自由航行。^④

1753年6月，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向枢密院提出了一份新的“勘察”黑龙江的计划，强调取道黑龙江是向鄂霍次克边区和堪察加等地运送粮食和军需物资的“惟一可靠和于国库有利的措施。”^⑤同年末，枢密院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方案，决定一面授权外交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提出相应的要求，一面委派米亚特列夫组织新的“勘察队”，赶造船只，并指定弗·索依莫诺夫负责具体领导工作。1754年，索依莫诺夫不等中国政府的答复，就率领由原“第二次堪察加勘察队”的部分成员和西伯利亚官员组成的队伍，乘三艘大船从尼布楚地区出发，顺石勒喀河到达额尔古纳河口，企图闯入黑龙江。由于中国人民和清政府的坚决反对，索依莫诺夫等被迫折回。^⑥

1755年春，俄国枢密院于接得索依莫诺夫的“勘察”报告后，即拟派专使前往北京，要求中国允许俄国船舶在黑龙江航行；^⑦枢密院并将此意通知色楞格斯克城防司令弗·雅科比，征求他的意见。雅科比在回答枢密院的咨

①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1卷，193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12页。转引自《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4册，第84—85页。

②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251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42页。

④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82—83页。

⑤ 安德列耶夫：《十八世纪俄国在太平洋和北美洲的发现》，1948年莫斯科出版，第51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43页。参见绿冈隐士《清（中）俄关系》，中译本，卷下，1903年上海维新书局出版，第7页。

⑥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247页；葛列科夫《1725—1765年俄国地理发现史概要》，第190页。按：1757年索依莫诺夫继米亚特列夫任西伯利亚总督。

⑦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247—248页。

询时表示,他深信“中国朝廷不会同意让俄国船只在黑龙江航行”,因为“(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人不得前往该地及在那里建立居民点。”^①因此,单靠谈判无济于事,必须用武力作外交的后盾。他建议先秘密地在石勒喀河准备武装船队,在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地区建仓储粮,然后从俄国本土派出大批军队,配备足够的武器弹药;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才可向清政府提出上述要求。如果中国方面拒绝,就下令在黑龙江沿岸构筑堡垒,武装占领黑龙江地区。为防止中国反击,还必须在色楞格斯克边境地区对面蒙古境内选择有利地形建筑工事。^②雅科比不但向枢密院提出了占领黑龙江的策略与步骤,甚至开始在音果达河上造船,预做入侵的军事准备。由于得悉“中国人对此已经察觉,并且随时准备当俄国人在黑龙江出现时给予有力的回击”;“由于为实现这项巨大的考虑中的计划而调动必要数量的军队需要巨额经费”;^③加以此时俄国已卷入对普鲁士的七年战争(1756—1762年),兵力不足,因此,雅科比的方案未能实现。

索依莫诺夫和雅科比等人的图谋失败以后,沙俄侵略者仍不放弃谋取黑龙江“航行权”的野心。他们认为中国内部准噶尔部封建头目的叛乱,是沙俄实现这一侵略要求的有利时机。当时俄国外交委员会甚至把“解决黑龙江航行问题”作为必须“立即达到”的一个目的。^④

1756年6月,沙皇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1741—1761年)决定派布拉吉谢夫前来中国。名义上布拉吉谢夫只是一名信使,实际上却授予他与中谈判“黑龙江问题”的权力。在1757年初俄国政府给他的十五条训令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要他“请求中国朝廷允准俄国船只在黑龙江上自由航行。”^⑤布拉吉谢夫随带的俄国枢密院致清朝理藩院信件的主旨也只有一个:要求“假道”中国内河黑龙江!该信说,西伯利亚交通不便,生活物品不易运到堪察加等地,所以要利用黑龙江航运。信中接着写道:“惟因该黑龙江系流经中国大皇帝陛下领域之内,而通过该江航行又为我俄罗斯船舶所必需”,因此要求中国皇帝准行,“并颁发圣旨晓谕沿该黑龙江附近各城市及各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2卷,1916年赤塔出版,第92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43—44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2卷,第92—93页。

③ 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282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2卷,第123页。

⑤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264—265页。

地方居住之属民、地方当局及土著人等一体知悉，以期于俄罗斯船舶通过该江之时，得以畅行无阻，准许停留，并于沿途给予可能之协助。”沙俄向中国勒索内河航行权，实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早 100 年。俄国枢密院的信中还说：“此事对中国方面毫无损失，对于友好与和平亦毫无疑问。”^①把侵略说成友谊，这正是沙俄的一贯伎俩。

1757 年 9 月，布拉吉谢夫将俄国枢密院的信件送达理藩院。清政府对于“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的无理要求，以“初与俄罗斯议定十一条（指中俄《恰克图条约》）内，并无逾界遣人运送什物一项”，断然拒绝。同时命令黑龙江地方官员：“务须加意防守卡座，勿令私过；倘不听阻止，恃强前行，”“即酌派官兵擒拿，照私越边界办理。”^②同年 11 月，布拉吉谢夫回国后，在给枢密院的报告中写道：他受到中国官员的礼遇；但是，清政府对黑龙江的主权问题，立场明确坚定，绝不容许俄国“假道”。^③

沙俄政府为了达到侵略目的，诡计多端。它一面派出布拉吉谢夫前来中国，在要求“假道”黑龙江的同时，口口声声表示要“保持及加强两帝国间所永恒确立之友好关系”^④；一面却违背《尼布楚条约》的明文规定，悍然命令鄂霍次克港司令什别列夫采取行动，迫使乌第河口和黑龙江口之间地区的居民“归顺”俄国。^⑤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沙俄的外交历来就是这样不守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的。

三 叶卡捷琳娜二世陈兵中俄边境，图谋“远征黑龙江”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皇位，把沙俄的侵略扩张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她执政期间（1762—1796 年），沙俄曾两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侵略中国也念念不忘，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⑥公开表示：“假如黑龙江真是一条可供我们向堪察加和俄国在鄂霍次克海的领地运送粮食的方便途径，那末，占

① 俄国最高枢密大臣“致大亚细亚各地及中国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军机大臣及理藩院尚书”（俄历 1756 年 12 月 21 日，公元 1757 年 1 月 1 日）。

② 《清高宗实录》，第 544 卷，第 1—2 页；《东华续录》，乾隆朝，第 46 卷，第 18 页。

③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 249 页。

④ 俄国最高枢密大臣“致大亚细亚各地及中国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军机大臣及理藩院尚书”（俄历 1756 年 12 月 21 日，公元 1757 年 1 月 1 日）。

⑤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 83 页。

⑥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杂志 1929 年第 25 期，第 17 页。

有这条河流对我们是重要的。”^① 为了解决所谓“黑龙江问题”，开辟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她屡次利用欧洲局势比较缓和的间隙，在中俄边境调兵遣将，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甚至企图搞突然袭击。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刚上台，就委派近卫军大尉克罗波托夫来华，企图向清政府重提“假道”黑龙江问题。^② 在“谈判”的烟幕下，1763 年 2 月，她下令调整中俄边境地区的边防体制，将有关加强尼布楚和色楞格斯克边防的全部事务集中于“特别军事委员会”之手，^③ 并计划在东线“和中国人作战，从尼布楚方面进攻，以便夺取黑龙江。”同年 12 月，她密令西伯利亚边界司令官在西线密切配合，准备向我国喀什噶尔等地进攻。^④ 同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命令米勒尔起草关于黑龙江的第二个“备忘录”。在这份题为《关于对华战争的意见》的秘密文件中，米勒尔无视历史事实，极力否认中国对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主权，硬说“整个黑龙江，从上游到江口，原为俄国所有”。他极力主张发动侵华战争，叫嚷这是“恢复（俄国）原先对黑龙江和绝大部分蒙古地区的权利”的唯一手段。他还特意设计了一条俄中边界线，公然把黑龙江作为界河，把大片的中国领土和战略要地肆无忌惮地划入俄国的版图。^⑤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指挥下，沙俄的国家机器不停地朝着对华战争的方向转动。1764 年 5 月，俄国枢密院审议了捷维雅舍夫中校提出的所谓西伯利亚“防务”案，决定：

1. 在祖鲁海图前哨建立堡垒，并向那里移民，以便控制从尼布楚到齐齐哈尔的通道；
2. 在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流处建立碉堡，以便阻拦“敌军的船只”。^⑥

同年秋，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召集特别会议，有 7 名大臣参加。“会议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 40 页。

② 萨文：《沙俄及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193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39 页。按：此人因故未能到达目的地。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2 卷，第 171 页。

④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1882 年莫斯科出版，第 58 页。

⑤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 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 378—393 页。

⑥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2 卷，第 170—171 页。

的意图之一便是向黑龙江派遣远征军。”^①会上估计了同中国作战可能产生的结局，并决定授权伊尔库次克省处置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②

中俄边境的上空，一时战云密布。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供认：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前，俄国“正要着手解决中国问题，已有六个团作好了准备。”^③但是，仗终究没有打起来。这并不是因为她突然对中国发了善心，而是由于她手中力量有限。首先，中国在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北方的边防比较巩固，对入侵者有所戒备，这不能不使沙俄有所顾忌；同时，俄、土战争的爆发，更推迟了沙俄的侵华计划，使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敢冒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

对土耳其的战争刚结束，叶卡捷琳娜二世又试图着手解决“黑龙江问题”了。1775年，她公然下令从乌第堡派遣部队前往我国亨滚河，在尽可能靠近黑龙江的地方建立居民点，然后由此出发调查黑龙江口的水深。她还命令：如果黑龙江可容海船驶入，就进一步占领江口。根据这项命令，1777年，从乌第堡派出了30名哥萨克兵，侵入亨滚河。当地鄂伦春族居民迅速向北京报警。清政府立即向俄国提出严正抗议，声明：如果俄国不停止侵略活动，中国就要关闭恰克图的一切贸易。^④俄国政府一时派不出足够的后援部队，又不愿轻易放弃恰克图贸易的巨额收入，不得不将哥萨克兵撤去。

此后，沙俄继续在中俄边境地区加紧备战，等待时机，企图得逞。1785年7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军事委员会主席格波爵姆金亲王的秘密敕令中，授权他为加强西伯利亚“防务”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其中包括在西伯利亚边境“部署必要数量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队；给该地区以足够的大炮和其他军需物资”；向边境地区或邻近边境的战略要地集结和输送必要的人力。^⑤次年，波爵姆金即图谋入侵黑龙江，并狂妄地认为俄国只要发兵1万，即可横行中国！^⑥

5年后，原伊尔库次克城防司令伊万·雅科比（弗·雅科比的儿子）也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吞并蒙古和黑龙江的狂妄计划，主张沿黑龙江重新划分中

①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第60页；萨文：《沙俄及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第40页。

②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270—271页。

③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253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46页。

⑤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第309页。

⑥ 托克：《叶卡捷琳娜二世传》，1799年伦敦出版，第1卷，第310页。

俄东段边界。为此目的，他认为必须在外贝加尔集中两个军团的正规军（内步兵 2 万，骑兵 1 万）；把恰克图和尼布楚分别建成南下（占领蒙古）和东进（占领黑龙江）的基地；在伊尔库次克和赤塔设立仓库；在边疆地区扩建工事，并招募通古斯族猎户和布里亚特族牧民加入哥萨克边防军。^①沙俄政府由于在西方连年征战，财政支绌，兵员不足，所以，没有贸然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入侵。但是，它吞并黑龙江地区的图谋，并没有丝毫改变。

当时，俄国在北太平洋上的势力已扩展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把这个号称“毛皮王国”的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法等国的船队也相继出现在这一带海域。沙俄统治集团预感到俄国在东北亚——北太平洋上的霸主地位即将遇到西欧国家的挑战。它力图在北太平洋上站稳脚跟，并在夺取殖民地的竞争中超过自己的对手。于是，改善西伯利亚与北太平洋两岸俄国新殖民地的交通，以降低运粮费用和商品成本，提高在国外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便成了沙俄向远东进一步扩张中的突出问题。一贯的侵略野心遇上了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新的侵略“理论”。果然，从 18 世纪 80 年代起，沙俄为侵占黑龙江又给自己制造了新借口：“捍卫新领地的需要！”到了 19 世纪，这种“捍卫论”又演化为“安全疆界论”。

1783 年，西伯利亚总督拉巴首先以“新殖民地和商业企业的需要”为“理由”，向沙俄政府提议“兼并黑龙江边区”。^②1786 年，御前大臣巴·索依莫诺夫、商务委员会主席沃隆佐夫和宫廷侍卫长别兹鲍罗德科也提议派舰队前往太平洋，“保卫俄国的利益，守卫俄国航海家发现的土地。”^③据此，叶卡捷琳娜二世于 1787 年初正式下令：“为了捍卫我们在俄国航海家们所发现的土地上的权利”，应当向远东派遣一支规模巨大的“探险队”。给“探险队”队长穆洛夫斯基上校的特别训令规定，该队除调查外国人在俄国美洲领地的活动、向鄂霍次克等据点运送军需物资外，主要的任务是：“巡视对着黑龙江口的大岛屿库页岛，测绘它的海岸、海湾和港口，同样也要测绘黑龙江口，并尽可能在库页岛靠岸，探明它的居民情况、土质、森林和物产。”^④在沙俄海军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帝俄科学院的积极参与下，该队的各项准备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2 卷，第 216—217 页。

② 诺维科夫-达翰尔斯基：《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8）》，载《阿穆尔州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 4 册，第 87 页。

③ 法因别尔格：《俄日关系（1697—1875）》，第 47 页。

④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第 40—41 页。

工作迅速完成，并计划于年底出发。但是，这一年，俄、土战争爆发；次年，俄国又与瑞典交战，穆洛夫斯基战死，这个计划被迫搁置。^①

四 18世纪末叶起，沙俄加紧窥伺黑龙江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农奴制开始由极盛走向解体；日益活跃的商品生产，由于农奴制的束缚，缺少足够的国内市场；农奴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不断发展。沙皇政府力图用持续的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满足资本对原料和市场的需要，从而进一步巩固沙皇的专制统治。

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是俄国在亚洲的最大的国外市场。

据统计，1802年，在俄国对亚洲各国的全部商品输出中，中国占63%；1807年，这一比重又增加到70%。^② 俄国对华贸易主要基地恰克图的贸易额，从1796年的510万卢布增至1810年的1316万卢布，同期，俄国在恰克图的关税收入由48.8万卢布增至134.5万卢布，15年间分别增长了1.5倍与1.7倍。^③

但从18世纪末开始，俄国对华贸易遇到了英、美等国的竞争。沙俄政府不甘心西方国家从中国市场上把“自己的”巨额收入抢走。它力图开辟中俄海路贸易以补充陆路贸易的不足，加强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这时，黑龙江不仅被视为俄国通往太平洋的捷径要道，而且被当作中俄海路贸易的必经桥梁！沙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谋求实现侵占黑龙江的野心。

1799年7月，在谢里霍夫等人创办的美洲公司的基础上，沙皇保罗一世（1796—1801年）敕令成立“俄国美洲公司”（以下简称俄美公司），以巩固沙俄在北太平洋的霸主地位；同时，这也是为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沙俄政府给该公司规定的任务是：牢牢地占领整个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其中包括美洲西岸的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群岛、库页岛南部和黑龙江口。”“这些殖民地连同已经归属俄国的堪察加、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将使俄国成为整个北太平洋至高无上的主宰”，从而“北太平洋将成俄

① 涅夫斯基：《俄国人首次环球航行记》，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17—20页。按：沙俄海军委员会为该队配备了四艘兵舰和一艘运输船。在筹备过程中，帝俄科学院院士、1772年曾率领俄国“科学院勘察队”从伊尔库次克到达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上游一带活动的帕拉斯，于1787年2月向海军委员会副主席提出了详细的“勘察”计划，公然主张在库页岛上建立俄国殖民据点。

②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37页。

③ 柯尔萨克：《中俄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年喀山出版，第97、105页。

罗斯帝国的内湖。”^①为此，沙俄政府赋予俄美公司“从事新的发现”，“占有新发现的土地”，等等特权。^②这个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样板建立起来的殖民机构，名义上是商业企业，实际上是沙俄“政府在一切不便以它自己的名义出面的特殊情况下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忠实、可靠的代理机构”。^③它在日后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向远东扩张的罪恶活动中，起着沙俄政府不能直接起的作用。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年）即位后，继续积极推行侵略黑龙江的政策。他特别重视“收集关于中国边境上的兵力和黑龙江航行条件的情报，并企图请求中国政府允准俄国在黑龙江口设置商务代理人。”^④1802 年亚历山大一世指派海军军官克鲁逊什特恩率“环球航行探险队”到远东进行海上考察，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探关于黑龙江航运的情报。沙俄政府给该队规定的任务是：将俄国派往日本的使节、俄美公司总经理列札诺夫送往日本，然后，查看 1787 年法国拉彼鲁兹和 1797 年英国布劳顿两航海队对鞑靼海峡的描述是否正确，并“勘察库页岛东岸和从鄂霍次克海到黑龙江口的通道”。^⑤训令还肆无忌惮地规定：“必须将库页岛置于俄国管辖之下。”^⑥

1803 年 8 月，克鲁逊什特恩率领大批人员组成的“探险队”，乘“希望”号渔船从喀琅施塔得出发，横越大西洋，绕过南美洲，进入太平洋，于 1804 年 9 月到达日本。随船同往的列札诺夫与日本进行了谈判。1805 年 6 月，该船将已完成赴日使命的列札诺夫送回堪察加半岛，随即掉转船头从鄂霍次克海沿库页岛西北海岸向南行驶，于 8 月中旬闯到黑龙江口外北纬 53°处，按照沙俄政府的训令开始了“勘察”活动。但克鲁逊什特恩由于做贼心虚，担心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怀疑，特别是害怕在黑龙江口遇到中国的舰队，^⑦不久便中止了对江口的“勘察”，于 8 月 30 日回到堪察加半岛南端的海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他得出了与拉彼鲁兹和布劳顿同样错误的结论：库页岛是

① 奥孔：《俄美公司》，英译本，1951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版，第 50 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 40 页。

③ 奥孔：《俄美公司》，第 223 页。

④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 72 页。

⑤ 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 12 卷，第 2 分册，第 282—283 页。

⑥ 伦森：《早期俄日关系》，载美国《远东季刊》杂志 1950 年第 10 卷第 1 期，第 25 页。

⑦ 克鲁逊什特恩：《1803—1806 年环球航行记》，1950 年莫斯科出版，第 204 页；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51 年莫斯科出版，第 120 页。

“半岛”，它和亚洲大陆之间有一条“地峡”相连；黑龙江口被浅滩淤塞，航行不便。^①

1805年10月，“希望”号满载皮货离堪察加半岛南下，于12月上旬到广州进行了大量非法贸易活动，并于次年2月9日启碇回国。克鲁逊什特恩回国后向沙皇建议：俄国应当立即占领库页岛南端的阿尼瓦湾，把它“作为进一步占领中国东北沿海地区的跳板”。^②

当时出使日本的列札诺夫也负有窥测我国黑龙江口的秘密使命。沙俄政府命令他在从日本回国途中，尽可能详细地调查库页岛、黑龙江口和鞑靼海峡的情况。^③ 1805年夏，列札诺夫回国后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公然宣称：“黑龙江理应成为中俄两国的边界。如果说这个地方现在属于中国皇帝，那仅仅是由于我们的缄默和温情。”他叫嚷为“收回”这条河流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他建议沙皇政府抢在别国之前，迅速占领库页岛特别是阿尼瓦湾，并主张向库页岛移民，以便进一步渗入和占有黑龙江^④。列札诺夫没有等待沙俄政府的批示，便于1806年8月命令海军军官赫沃斯托夫和格·达维多夫武装侵入我国库页岛。10月，赫沃斯托夫率水兵5名在阿尼瓦强行登陆，蛮横叫嚷该岛居民归俄国“保护”！但他们根本无法在岛上立足，很快便仓皇退走。

1809年，沙俄海军部又派海军大尉波杜什金前来黑龙江口和库页岛一带海域进行非法侦察活动，前后历时两年之久。

与克鲁逊什特恩等从海上窥测黑龙江口的同时，亚历山大一世还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实现其侵占黑龙江的目的。

早在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之初，他就收到了西伯利亚总督斯特兰德曼的一份特别条陈，强调俄国政府应与中国就“修改”边界、利用黑龙江航行等问题进行谈判；“如果中国人不同意谈判，就使用武力。”^⑤ 1803年4月，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也向沙皇建议派一位官员出使中国，就黑龙江航行等

① 克鲁逊什特恩：《1803—1806年环球航行记》，第205—207页。

②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13页。

③ 伦森：《俄国向日本的推进：俄日关系（1697—1875）》，第128页；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43页。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43—44页。

⑤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1918年赤塔出版，第2—3页；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253页。

问题进行谈判。同年 11 月，俄国枢密院将派遣使臣一事照会清朝理藩院。^①

1805 年 2 月，俄国政府正式任命戈洛夫金伯爵为出使中国的特命全权大臣。按照 7 月间给予的训令，戈洛夫金要求清政府允许在整个中俄边界上通商；准许俄国商人在广州贸易，在黑龙江口和广州设置商务代表，给予俄国政府商队在中国内地城市经商的权利，准予俄国派公使常驻北京。^②而他最重要的使命是：“搜集关于黑龙江航行和能否顺该河到鄂霍次克海的情报，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利用这条航道并在黑龙江口建立货栈，”^③同时要“暗示库页岛不属于中国”。^④

1805 年 7 月，戈洛夫金率随员（其中包括一批挂着“学者”头衔的高级侦探）及卫队共 240 余人从彼得堡启程，10 月到达恰克图。清政府饬地方官准备隆重接待。由于戈洛夫金不遵行清政府传统的礼仪，被拒绝入京。沙俄的计划又成为泡影。

1806 年 2 月，戈洛夫金等离恰克图回彼得堡。外交使团成员奥夫莱上校被派到尼布楚地区，刺探中国边境地区清军设防的情况，查明“将来能否到黑龙江和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之间的地方去进行一次小规模的秘密勘察”，并要求他“严守机密和谨慎从事”。奥夫莱在格尔必齐河一带亲眼看见了刻有五种文字的中国界碑，但仍然胡说“黑龙江之地属于俄国”。之后，他还为沙皇政府设计了一套侦察黑龙江“而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方法，以便进一步刺探情报。^⑤

戈洛夫金本人在给沙俄政府的报告中公然鼓吹：“俄国只有凭借武力才能达到目的”，主张出兵占领黑龙江下游、精奇里江与乌第河之间的广大中国土地。^⑥这一意见得到伊尔库次克地区俄军司令柯尔尼洛夫的响应。后者还主张在黑龙江上建造武装舰艇，向中国示威，迫使中国承允俄方的无理

①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俄国外交部文件集），第 1 集第 1 卷，1960 年莫斯科出版，第 403—405、555—556 页。

②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俄国外交部文件集），第 1 集第 2 卷，1961 年莫斯科出版，第 472 页；宫崎正义：《沿黑龙江地方近代中俄关系之研究》，1922 年大连出版，第 206 页。

③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1881 年彼得堡出版，第 33—34 页。

④ 巴斯宁：《关于戈洛夫金伯爵出使中国》。转引自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 46 页。

⑤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 47 页。

⑥ 陈芳芝：《中国边疆外交——东北的侵蚀（1858—1860）》，载《燕京社会科学学报》1950 年 7 月第 5 卷第 1 期，第 75 页。

要求。^①

继戈洛夫金使团之后，沙俄又向中国进行新的外交试探。1810年3月，伊尔库次克省省长特列斯金奉命就派遣新使团来华等问题，到恰克图与清政府代表举行会谈，并乘机提出“黑龙江问题”。清政府代表坚持“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容许俄国人在黑龙江岸立足”，特列斯金的试探“没有取得任何结果”。^②当时，沙俄的军队正忙于西方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无暇东顾。1812年6月，拿破仑入侵俄国，打乱了沙俄在远东的部署。拿破仑战败后，1814—1815年，欧洲各国封建君主举行了维也纳会议，沙俄成了“神圣同盟”的主宰、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沙俄在西方的优势地位一经确立，“黑龙江问题”马上又被提了出来。1816年，俄美公司的总经理谢麦林就所谓“黑龙江自由航行对俄国的利害问题”公开发表文章，鼓吹为了发展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必须占领黑龙江！”^③1824年2月，海军上将莫尔特维诺夫伯爵在给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的函件中，肆意歪曲《尼布楚条约》，叫嚷：“我们不能忘记，雅布洛诺夫山脉和黑龙江之间的边境地区，是俄国割让给中国的”，“现在我们感到痛心，黑龙江—西伯利亚流入大海的惟一宜于航行的河流，已不复在我们的境内。”他要求“挽回”“这些重大的损失”。^④1819—1822年间到过石勒喀河边金诺村的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甚至把黑龙江视为俄国的内河干线，认为迟早一定会“归还俄国”，而边金诺将“是一个大渡口和进入黑龙江的未来的码头”！^⑤

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上台后，沙俄进一步加速了侵华步伐，违约入侵的事件日益频繁，“收复黑龙江”的叫嚣日甚一日。

1828年，东西伯利亚总督拉文斯基和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多菲尼金派专人收集有关黑龙江流域的资料，其中包括越境到过黑龙江的猎户、渔夫和流放犯提供的材料，妄图“证明”黑龙江流域不是中国领土。拉文斯基根据这些颠倒黑白的材料断言：“住在黑龙江下游的基立亚克（费雅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页。

②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85—86页。

③ 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283页；诺维科夫-达翰尔斯基：《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8）》，载《阿穆尔州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4册，第89页。

④ 奥孔：《俄美公司》，第88—89页。

⑤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52—53页。

喀)人,库页岛和黑龙江沿岸的某些地区的土著居民,并不隶属于中国”。他还建议派遣专门“勘察队”前往这一带地方继续搜集情报,并提出了占领黑龙江的计划。^①与此同时,俄美公司建议在乌第河口建立海港,以便向黑龙江口进行经济渗透。为此,该公司在 1828 和 1829 年,先后派出海军军官库兹明等两批人前往“勘察”。^②1831 年库兹明又要求从尼布楚出发,“侦察”黑龙江,搜集关于两岸居民状况的“详尽、精确的情报”。^③

1832 年,曾任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监护官的拉狄仁斯基上校经乌斯季-斯特列尔卡闯入黑龙江,直至雅克萨。他起草了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后来,帝俄科学院院士米登多尔夫在越境潜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前,曾参考过这个计划。^④1833 年,俄国“植物学家”图尔查尼诺夫也沿石勒喀河侵入黑龙江,到雅克萨一带搜集情报。^⑤由于沙俄统治集团的精心策划与积极鼓吹,到 19 世纪 30 年代,武力吞并黑龙江的意图,在东西伯利亚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乌第堡的俄国商人,甚至在 1830 年就已公开传播俄军即将入侵中国的消息。^⑥沙皇俄国,这个决心“要把亚洲一口吞下的巨人”,^⑦已经张开血口,伸出利爪,一遇机会就要向中国黑龙江地区猛扑过来了。

①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 86 页。

② 吉布森:《俄国的毛皮贸易与粮食供应(1639—1856)》,1969 年伦敦出版,第 148 页。

③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 年阿穆尔勘察队》,1974 年莫斯科出版,第 9 页。

④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1925 年列宁格勒出版,第 236 页。

⑤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859 年彼得堡出版,第 66 页。

⑥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114 页。

⑦ 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128 页。

第二章

沙俄重新武装入侵 我国黑龙江地区和逼签中俄 《璦琿条约》、《天津条约》

第一节 沙俄武力侵占黑龙江地区的准备

19世纪中叶是沙皇俄国大举入侵中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沙俄除通过外交讹诈从清政府获得种种侵略特权外，又武力侵占了我们东北100万以上的领土，并加紧窥伺我国西部地区。^①

这时，古老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逼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一步一步地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情况，使沙俄获得了大举入侵的便利条件。

19世纪中叶，沙俄仍然是一个落后、野蛮的军事封建帝国。沙皇政府顽固地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内极力强化国家机器，镇压人民反抗，把整个俄国变成一座无比黑暗的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对外，沙皇政府继续充当“欧洲宪兵”，绞杀欧洲革命。同时，它疯狂地实行侵略扩张，掠夺别国领土，扩大封建统治和剥削的范围，并力图利用对外侵略来转移群众斗争的视线，摆脱国内的革命危机。侵略扩张政策符合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

19世纪中叶沙俄的对外侵略，也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得到俄国资产阶级的坚决拥护。

^① 关于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侵略，详见本书第三卷。

从19世纪3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封建社会的母胎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许多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工场劳动。1851—1860年的10年间,俄国机器制造业的生产总额增加15倍以上。^①蒸汽动力从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增加37倍多。^②作为当时俄国工业重要部门的棉纺织业,由于普遍采用新技术获得了急剧的发展:19世纪头50年,棉纱产量增加15倍;^③到50年代末,纺锭数已占世界第5位。^④雇佣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⑤然而,俄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遇到来自封建农奴制的强大阻力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先天不足的俄国资产阶级,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不仅指望沙皇实行“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为扩大国内市场创造条件,而且仰赖沙皇政府用军事力量来补充俄国经济竞争能力的不足,通过对外征服为自己夺取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开辟道路。它特别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东方,迫切要求从接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寻找出路。

上述19世纪中叶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必然导致沙俄侵华步伐的加速。这一次,沙俄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黑龙江地区。它决心把夺取这块中国领土的长期预谋,变为直接的大规模入侵行动。

当时,积极策划这一武装入侵的罪魁祸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鸦片战争后不久,他就发誓要不失时机地“实现他的高祖父和祖母(指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意图”,^⑥决心用武力吞并黑龙江,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政府根据他的意图,决定加紧研究中国的时局,调查中国的实力、资源,特别是黑龙江一带的情况,并多次派出秘密“勘察队”,分别从海上和陆上潜入中国。其中米登多尔夫和加夫利洛夫“勘察队”的活动尤为突出。

1842年,帝俄科学院决定派院士米登多尔夫“考察”西伯利亚东部和东北部。1844年9月,他和地形测绘员瓦加诺夫中尉从鄂霍次克海岸返回时,

①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1949年莫斯科出版,第21页。

② 札依翁契可夫斯基著,叔明译:《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31页。

③ 罗日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经济的发展》,载列文、波克罗夫斯基等著《十九世纪俄国史》(丛书),1907—1910年彼得堡出版,第1卷,第141页。

④ 彭迪先:《世界经济史纲》,1948年生活书店出版,第262页。

⑤ 例如,在加工制造业中,雇佣工人所占比重由1825年的54%上升为1860年的87%;在棉纺织业中,雇佣劳动者已占绝大多数。参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535—536页。

⑥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59页。

由乌第河未定界地区非法潜入我国国境，一路上窥测了外兴安岭南麓的牛满河、古里河等地，然后经石勒喀河回到外贝加尔，历时长达4个月之久。

米登多尔夫在黑龙江地区的活动，具有极明显的政治目的。他别有用心地“调查”当地居民“同中国的关系”，到处在中国境内寻找中、俄国界“界标”。^① 1845年初，他在呈给沙皇侍从将军、作战参谋别尔格的报告中，公然否认《尼布楚条约》的明确规定，把他在牛满河上游和古里河等处“发现”的一些石堆说成是清政府设立的“界标”，从而断言中国“自愿”把外兴安岭南麓的领土“让给”了俄国；^② 他还胡说黑龙江地区“既没有中国的边防部队，也没有中国的管理机关”；^③ 明目张胆地宣称“黑龙江下游从来不属于中国”，是“无主的土地”；^④ 居住在黑龙江口的费雅喀族是“独立的”，不向任何人纳税。^⑤ 他建议沙俄政府收买费雅喀族的部分土地，在黑龙江口建立贸易点；^⑥ 组织一支由他参加的秘密“勘察队”，乘船“勘测整个黑龙江河流”；^⑦ 并主张“刻不容缓地”占领黑龙江。^⑧

别尔格非常赞赏米登多尔夫的意见，认为“用些极为菲薄的礼物”，例如，“几普特烟叶”，就可以换取费雅喀人的一部分土地，将它“控制在我们（俄国）手里”。^⑨ 他把“报告”转呈尼古拉一世。沙皇对米登多尔夫的建议极为重视，立即准备制订新的入侵黑龙江的计划。

但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沙俄对于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一带的地理状况，还不甚了了。长期以来，西欧和俄国的“探险家”都认为黑龙江口不能通航，库页岛是一个半岛。如果情况属实，黑龙江作为一条联络西伯利亚内地和太平洋的航道的价值便十分有限。因此，探明黑龙江能否通航，成了沙俄向远东扩张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沙俄政府于1843年成立“特别委员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1909年莫斯科出版，第35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69页。

③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36页。

④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88页；弗纳德斯基：《俄国政治和外交史》，1936年波士顿出版，第305页。

⑤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35页。

⑥ 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284页。

⑦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01—202页。

⑧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第36页。

⑨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02页。1普特=16.38千克。

会”进行策划。

7月，该委员会成员、海军少将普提雅廷提议，趁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机，派战舰秘密前往黑龙江口、库页岛一带，“小心谨慎地勘察俄国同中国的东部边界”，调查黑龙江口通航情况，并在那里寻找“可靠的港口”。^①尼古拉一世一听正合心意，立即命令普提雅廷装备由海防舰和运输船组成的“海上勘察队”，从黑海开往中国，“勘察黑龙江口及河口湾，查明以前的著名航海家们关于海船不能进入黑龙江口的结论是否确实，弄清关于中国派有重兵驻守该河口的消息是否属实”。^②沙俄财政大臣坎克林害怕由俄国政府出面侵入黑龙江会危及恰克图贸易，他认为与其派遣耗资极多的庞大官方“勘察队”远涉重洋，毋宁委托俄美公司就近由堪察加派出船只直接前往黑龙江口“调查”，而由国库负担费用。^③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也不赞成以俄国政府名义派战舰前往远东执行上述任务。

8月，沙皇决定将此项“勘察”延期。1844年4月，海军上将克鲁逊什特恩又向尼古拉一世提议调查鞑靼海峡、黑龙江口与河口湾。^④沙皇政府遂于同年12月决定，委托俄美公司“勘察”黑龙江口。

与沙皇政府积极策划入侵黑龙江口同时，1846年3月中旬，东西伯利亚总督卢彼尔特也上奏沙皇，极力鼓吹侵占黑龙江对发展西伯利亚有“重大意义”，说什么“俄国东部地区需要黑龙江，就像俄国西部地区需要波罗的海沿岸一样”。他甚至断言“俄国占领黑龙江势在必行，迟早必定实现。”^⑤这一奏折促使尼古拉一世更积极地着手解决“黑龙江问题”。

1846年春，沙俄外交部给俄美公司下达了详细训令，要求调查“黑龙江河口湾、库页岛和大陆海岸之间的海湾（原文如此——引者）以及邻近河口湾直至乌第河湾的鄂霍次克海东南（应为西南——引者）海岸”。由于担心计划败露会引起清政府的严重抗议，沙俄外交部特地规定：船上应悬挂各色旗帜，务使中国人猜不出这是俄国的船只；船上人员应冒充是“来河畔捕鱼

①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10—11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59页；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36页。

③ 《俄罗斯人名词典》，1910年彼得堡出版，“普提雅廷”条；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60页。

④ 法因别尔格：《俄日关系》，第116—117页。

⑤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1975年莫斯科出版，第102页。

的”；如果遇到中国人盘问，就回答说：“风浪意外地把船只冲到这里来了。”^① 尼古拉一世惟恐“勘察队”的目的性还不够明确，又在训令上亲自批示：“要采取一切手段，确实查明船只能否驶入黑龙江；因为这是一个对于俄国极为重要的问题。”^②

根据沙皇的手谕与外交部的指示，俄美公司总经理、海军少将符兰格尔做了精心准备。1846年5月17日，他调派船长、海军少尉加夫利洛夫率领水兵和船员25人，乘“康士坦丁”号双桅战船从俄国北美殖民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锡特卡）开到阿扬，然后向船长下达“勘察”黑龙江口的任务。为了“不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俄国船只”，俄美公司给加夫利洛夫的补充命令规定：行动要谨慎，严守秘密；全部机要工作（如保管测绘仪器、缮写航海记录等）只许他本人承担，不许助手参与；不准把航行的目的地告诉船员；如果在黑龙江口遇到俄国逃犯，应与他们秘密交涉，允许给他们特赦，以免发生变故。^③

8月1日，“康士坦丁”号驶离阿扬，10日，到达黑龙江河口湾，然后加夫利洛夫乘舢板窜入河口湾12海里处进行“勘察”。在执行入侵任务时，加夫利洛夫按照规定进一步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他本人“装扮成一个非俄罗斯族的渔夫”，“连船上的烟草都是（美国）弗吉尼亚的，而不是俄国的”。^④ 关于这次出航的任务，只是在到达黑龙江口附近时，才向船员宣布。^⑤ 尽管耍了那么多花招，做贼心虚的加夫利洛夫仍然生怕落入中国的法网，不敢在黑龙江河口湾久留；加以遇到浅滩和风暴，遂于8月27日返航。

9月1日，“康士坦丁”号窜回阿扬，加夫利洛夫向俄美公司驻该地管理处负责人呈交了他的“勘察记录”和私绘的地图，说明由于上述原因，不能根据他的记录对黑龙江口的通航程度“得出任何结论”。^⑥

12月24日，符兰格尔向沙俄外交部报告：公司已完成了受委托的任务。他根据自己的推想断言：“黑龙江口只容吃水很浅的舢舨通行！”^⑦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61页。

②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第42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64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71—172页。

⑤ 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284页。

⑥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66页。

⑦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38页。

这时，欧洲正处于1848—1849年革命前夕。在革命风暴冲击下，由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反动秩序趋向垮台。欧洲一切反动君主国家都寄希望于沙俄的援助。面对正在向自己的西大门延烧的革命烈火，彼得堡统治集团内部在侵华政策上开始出现分歧。总理兼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和财政大臣符隆钦科等人认为，这时俄国必须集中全力来对付欧洲革命；论轻重缓急，应是先欧后亚。他们担心俄国在远东采取新的扩张步骤将削弱它在欧洲的力量，妨碍它继续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同时担心一旦与中国决裂，会使恰克图贸易中断，从而使国库每年减少50万—100万卢布的巨额收入，并严重影响俄国纺织品的销路。^①因此，他们对占领黑龙江地区的问题，抱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希望等待更有利的时机，避免顾此失彼。

另一派以内务大臣勒·阿·彼罗夫斯基、海军总参谋长阿·施·缅施科夫等为代表，反对上述意见，主张趁中国正处于严重削弱与混乱的时期，在远东采取新的行动路线，立即并吞黑龙江地区。以上两派都宣称只有自己的意见符合罗曼诺夫王朝的最高利益，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过是沙俄政府内部在侵华步骤上的激进与缓进之争，在侵占黑龙江这个目标上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涅谢尔罗迭持上述观点，因此，他在接得俄美公司的上述报告后，就顺水推舟，于12月27日上奏沙皇说：“海船不能进入黑龙江口，库页岛是一个半岛，所以黑龙江对于俄国没有任何意义。”^②但是，侵略成性的尼古拉一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仍然念念不忘占领中国的黑龙江地区。他需要一个死心塌地为他奔走效命的忠实鹰犬，前往西伯利亚实现这一侵略计划。1847年9月他选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就是这样的人物。

尼·尼·穆拉维约夫出身于上层贵族官僚家庭，父亲曾任御前大臣、枢密官。他在贵族士官生学校毕业后，到沙皇军队中服役，参加了1828—1829年对土耳其的战争、1830—1831年对波兰人民革命的血腥镇压，随后又几次参加屠杀高加索人民的军事远征（1838—1844年），“成为沙皇政策的坚决的推行者”。^③为此，他深得尼古拉一世的宠信：1841年晋升少将，1846年任图拉市卫戍司令和图拉省省长。1847年9月，尼古拉出巡途经图拉，又提拔他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并亲自就沙俄侵华政策对穆拉维约夫详加指示，特地关照说：“至于俄国的黑龙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33—34页。

② 特列涅夫：《格·伊·涅维尔斯科依传》，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14页；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与西伯利亚铁路》，1899年伦敦出版，第171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85页。

江，以后再谈吧！”^① 随即又用法语补充道：“对会听话的人，用不着多说。”^② 这里，尼古拉竟然把中国的内河黑龙江说成是“俄国的”河流，极露骨地表明了他图谋侵吞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从这些强烈的暗示中，穆拉维约夫完全懂得沙皇委以重任的用意所在。

为了“迅速实现皇帝的意志”，一向“自称是哈巴罗夫的继承人”的穆拉维约夫，^③ 受命后便匆匆离开图拉市，于1847年10月上旬赶到俄都，“毫不延迟地立即着手了解当时西伯利亚的情况，尤其是黑龙江的情况”。^④ 同时，他四处活动，一面攀识沙俄宫廷中的达官要人，寻求支持，一面罗致“人才”，准备大干。1848年1月离开彼得堡前，他曾晋见沙皇，取得了“把一切必要的情况都直言不讳地直接上奏”的独特权力，作为自己在西伯利亚实行独裁统治和向中国东北大举入侵的“一道护身符”。^⑤ 1848年3月，穆拉维约夫到达伊尔库次克任所后，立即把解决“黑龙江问题”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活动中高于一切的中心课题”，^⑥ 亲自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很快就向沙皇政府提出了一整套侵略黑龙江的方针和策略。

他首先强调：侵占黑龙江地区是巩固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统治和向太平洋扩张的关键。1848年9月，他在给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的信中，就大谈黑龙江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说什么“谁能占有黑龙江左岸和黑龙江口，谁就能占据西伯利亚”。^⑦ 1850年3月，在给内务大臣的函件中，他又极力强调：“俄国只有占有黑龙江，或者至少取得在该河上航行的权利，才能保卫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使其永属俄国版图。”^⑧ 同时，他公开宣称：“占据黑龙江地区对于我（俄）国分享东洋（太平洋）的国际利益的问题也具有很大的意义”。^⑨ 按照这种强盗逻辑，似乎为了西伯利亚的

① 按：这句话在俄文中是双关语气，同时暗含“至于俄国的黑龙江，应首先考虑这个问题”之意。

② 《俄罗斯导报》，1888年，第151—152页。转引自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71页。

③ 伊·叶菲莫夫：《布钦斯基教授对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评论和回忆》，1896年彼得堡出版，第13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71页。

⑤ 同上书，第181页。

⑥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90—91页。

⑦ 穆拉维约夫：《致内务大臣公函摘录》。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35页。

⑧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58页。

⑨ 同上书，第288页。

“安全”和俄国在太平洋的侵略利益，它就“有权”任意侵占中国的固有领土！

为了适应俄国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和天然资源的需要，穆拉维约夫还从经济上论证了侵占黑龙江地区的“必要性”。1849年3月，他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公然把我国的黑龙江看作俄国的生命线，断言：“西伯利亚产品的真正出路、东西伯利亚未来的福祉，全赖打开一条通向东洋的可靠而便利的交通孔道”；“如果黑龙江不通航，任何行业都不能够发展，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规模。”又说：“整个黑龙江左岸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矿源”，而“黄金已成为俄国不可或缺之财富”。^①

同年5月，他又上书沙皇说：“我认为保持我国同中国贸易的惟一办法，是把定点互市改为贩运贸易，把我国纺织品沿黑龙江运到中国东北各省，这些省份离英国人目前活动的地区较远，从而可以避免同英国人竞争。”^②他还露骨地宣称：“获取黑龙江足以补偿因恰克图贸易衰落而造成的损失。”^③为此，他竭力主张抢占黑龙江，打开从北方入侵中国的大门。

在策略上，穆拉维约夫力图利用清政府面临的民族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侵略利益。1850年3月，他获悉道光帝去世，年仅18岁的咸丰帝（1851—1861年）继位，局势不稳，就曾向尼古拉一世献策：“应利用中国目前的事件”，“趁英国人尚未完全统治中国之际，根据我（俄）国内部之急需，在同中国交界处增兵防守，并进而占据黑龙江。”^④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后，穆拉维约夫又多次促请沙皇政府利用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乘虚而入，把黑龙江地区据为己有。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军占领南京，清政府岌岌可危，这时他更野心毕露地叫嚷：“如果俄国在东方更加强大一些，它甚至可以充当中国的保护者。”^⑤

穆拉维约夫提出这些侵略主张，口口声声都说是为着“防英”。这一方面是由于俄、英两霸为掠夺中国存在着深刻矛盾，沙俄不允许英国插手黑龙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06—207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47—48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8页。

④ 穆拉维约夫：《上皇帝疏》。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56页。

⑤ 科斯廷：《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47页。

江，把这一地区视为禁脔；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烟幕，表明沙俄力图利用中国人民由于英国侵华而激起的仇英情绪和清政府对英国的恐惧心理，把自己伪装成中国的“天然盟友”，以便骗取清政府的好感，趁机扩大侵略，最后将全中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穆拉维约夫的主张和彼得一世以来沙俄统治集团的侵华方针一脉相承。这个主张在西伯利亚获得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赞助，^①在彼得堡得到了彼罗夫斯基、缅施科夫等人的支持，很快为尼古拉一世所批准，成为19世纪中叶俄国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

穆拉维约夫不仅系统地提出侵略黑龙江的主张，而且全力以赴地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

(一) 侦察中国沿边和黑龙江一带情况。1848年末，穆拉维约夫亲自出马考察外贝加尔地区，足迹远至边境城镇恰克图、祖鲁海图一带。^②随后，他又派遣地形测绘员瓦加诺夫带领4名哥萨克，从斯特列尔卡出发，前往黑龙江侦察。^③1851年，他又派卡札凯维奇和斯基勃涅夫“勘察”黑龙江上源音果达河、鄂嫩河和石勒喀河，探明从石勒喀河到额尔古纳河完全适宜航行。^④同年末，他在伊尔库次克主持成立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规定该会的任务是“积极执行沙皇意志”，“在学术上”为俄国夺取黑龙江服务。^⑤

(二) 积极储备军粮和筹措侵华经费。沙俄政府由于连年对外征战，国库空虚，无力拨付巨款供穆拉维约夫开展“黑龙江事业”，于是责成他“努

^① 例如，1847—1850年间，仅伊尔库次克富商库兹涅佐夫一人，就向穆拉维约夫提供了255万卢布侵华经费。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领俄军第一次大规模入侵黑龙江时使用的“额尔古纳”号轮船，也是库兹涅佐夫出资建造的。又如，伊尔库次克的另一巨贾索洛维约夫为1855年俄军第二次武装入侵黑龙江捐助了半普特黄金。恰克图的商人也在金钱和物质上大力支持穆拉维约夫侵略黑龙江。参见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49、343页；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第267—268、271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91页。

^③ 基里洛夫：《阿穆尔省的移民》，载《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会员著作集》，第5页。按：瓦加诺夫一伙潜入我国黑龙江上游后，于1850年被当地鄂伦春族居民击毙。

^④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144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90页。1854年后，西伯利亚分会曾多次配合穆拉维约夫的侵华活动，派会员到我国黑龙江、松花江一带进行“地理考察”。沙俄侵占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广大地区后，该会在伯力设立支会，并在海参崴设立分部。参见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第239页；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435—443页；马尔戈林：《阿穆尔地区》，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10—11页。

力寻找地方资源”，就地筹集侵略经费。^①为此，穆拉维约夫首先向东西伯利亚居民开刀，对他们恣意榨取，“给他们强加上各种繁重的赋役”。^②由于连年歉收，外贝加尔地区粮食本已不能自给。穆拉维约夫为了筹措军粮，竟强制征调民粮，并“以警察手段”压低粮食收购价格^③（低于实价50%）。结果，“外贝加尔许多地方发生粮荒”，居民只得“以谷糠和树根充饥”。其中距黑龙江最近的“尼布楚地区受征购征用之害比它处尤大。”^④

（三）筹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在穆拉维约夫为侵略黑龙江而做的准备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扩建武装部队。这是穆拉维约夫推行侵华政策的主要支柱。正如旧俄学者所说，穆拉维约夫确立了如下信念：“目标——黑龙江；手段——外贝加尔军队；执行人——穆拉维约夫。”^⑤

长期以来，沙俄的战略重点在西方，部署在东西伯利亚的兵力相对薄弱，不足以实现它狂妄的侵华野心。因此，穆拉维约夫就任总督后，立即着手扩充外贝加尔的兵力，计划于正规军之外，建立一支庞大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入侵黑龙江的主力。按照他的意见，这支军队由五部分组成：

- （一）全部哥萨克边防军；
- （二）外贝加尔哥萨克城防团；
- （三）所有的“异族”团队；
- （四）外贝加尔地区各村镇的哥萨克；
- （五）尼布楚矿区的农奴。

前四个部分组成骑兵，最后一部分编成步兵。

尼古拉一世完全赞同穆拉维约夫的扩军方案。在他的扶持下，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扩建极为迅速。到1851年6月，总数已接近5万人，内有战斗部队1.7万多人。^⑥为了提高作战能力，这些军队定期举行大规模集训，穆拉维约夫常亲自前往督察，“鼓舞”士气。1852年9月，他踌躇满志地向沙皇报告，哥萨克军“已扩建完毕”。^⑦至此，外贝加尔地区的男性适龄居民，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93页。

②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54页；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13页。

③ 维纽科夫：《1857—1858年向黑龙江移民的回忆》。《阿穆尔地区、中国和日本之行》，第121页。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15页。

⑤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3页。

⑥ 同上书，第34页。

⑦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92页。

几乎都已置于沙俄军事组织之中。外贝加尔哥萨克居住地区变成了一个兵营。

穆拉维约夫不仅竭力扩建哥萨克军，做陆上入侵的准备，而且力主在太平洋大办海军，以便侵占中国东北沿海港湾和岛屿。^① 1849年3月上旬，他在一份奏疏中强调，俄国必须在黑龙江口设置要塞，在黑龙江口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之间派区舰队巡航，并从俄国内地派部队到这些要塞和区舰队服役。1849年12月，沙皇批准将鄂霍次克和堪察加的全部舰只组成西伯利亚区舰队，归穆拉维约夫统辖。1852年6月康士坦丁亲王^②担任海军总参谋长后，继续扩充沙俄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在他任职期间，每年有10—24艘军舰出没在太平洋上，肆无忌惮地把我国黑龙江口一带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

1853年，尼古拉一世穷凶极恶地指示穆拉维约夫说：中国理应满足俄国的全部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③ 事实证明，穆拉维约夫正是按照这一指示行事的。在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以后，他接着便从海上和陆上发动了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武装入侵。

第二节 涅维尔斯科依为首的沙俄海军入侵 黑龙江下游地区

如前所述，沙俄统治集团认为，侵占黑龙江口和库页岛是俄国兼并整个黑龙江地区的关键；而探明黑龙江口究竟是否便于通航，又是动手入侵以前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世纪中叶，沙俄利用清政府内外交困、边防空虚的时机，派遣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率领水兵入侵我国黑龙江口，便是它为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涅维尔斯科依是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贵族地主家庭出身，1829年入中等海军武备学校，毕业后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1846年晋升海军大尉。

^① 烟山专太郎：《俄国侵略黑龙江地方史》，1903年湖北学报馆译印，第3页；黎际涛：《俄人东侵史》，上册，1930年哈尔滨出版，第363页。

^②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1827—1892），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次子。1850年被指定为国务委员会委员，1852年出任海军总参谋长，次年主管海军部，不久兼任“阿穆尔（黑龙江）委员会”主席。他是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沙俄侵华的重要决策人，一贯积极支持穆拉维约夫侵略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活动。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84页。

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受到沙文主义教育，接受了“彼得一世关于黑龙江及其河口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想法，^①把17世纪的沙俄殖民强盗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奉为英雄，立志要继承他们的侵略事业。参加海军后，他竭力鼓吹“俄国应当建设一支太平洋舰队，找到便利的海港，并且在那里建设必需的基地”。^②在强烈的扩张野心驱使下，他积极搜集和研究有关黑龙江的资料，愈加坚信侵占黑龙江“对俄国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③并对拉彼鲁兹、布劳顿和克鲁逊什特恩等人关于黑龙江口不能通航、库页岛是半岛的结论表示怀疑。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涅维尔斯科依决心亲自到黑龙江口作一次实地“勘察”。1847年末，涅维尔斯科依靠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的帮助，谋得了正在建造的“贝加尔”号船长的职位。按照沙俄海军部的计划，这艘军用运输船建成后，将定期从喀琅施塔得运载军需物资，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涅维尔斯科依接受新的任命后，立即前往彼得堡晋见海军总参谋长缅施科夫，请求在完成堪察加之行后，允许他乘该船前往鞑靼海峡和黑龙江口“考察”。缅施科夫授意他去晋见穆拉维约夫。穆拉维约夫和涅维尔斯科依一见如故，对他的打算“表示完全赞同”，答应“努力用一切办法来促其实现”。^④

在穆拉维约夫的鼓舞下，涅维尔斯科依一面亲自跑到造船厂催促提前完工和安装大炮，以便早日成行；一面继续在彼得堡游说，寻求大人物的支持。同时，他拟定了“调查”鞑靼海峡、黑龙江口和其他港口的详细计划，于1848年2月函请已在伊尔库次克任所的穆拉维约夫转呈沙皇政府批准。

这时，穆拉维约夫也亟盼涅维尔斯科依尽快去“考察”黑龙江河口湾。他写信给缅施科夫，请求海军部下令：“贝加尔”号船长应于卸货后，“遵照相应的指示去测绘上述海岸，”^⑤并通知涅维尔斯科依说，他本人已将有关此事的指令呈报沙皇批准。7月，涅维尔斯科依接信后，又去晋见缅施科夫和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他挖空心思编造了一套准备欺骗清朝政府的谎言说，如果被中国人发现，他就诡称这艘船是被鄂霍次克海的“疾风和急流送到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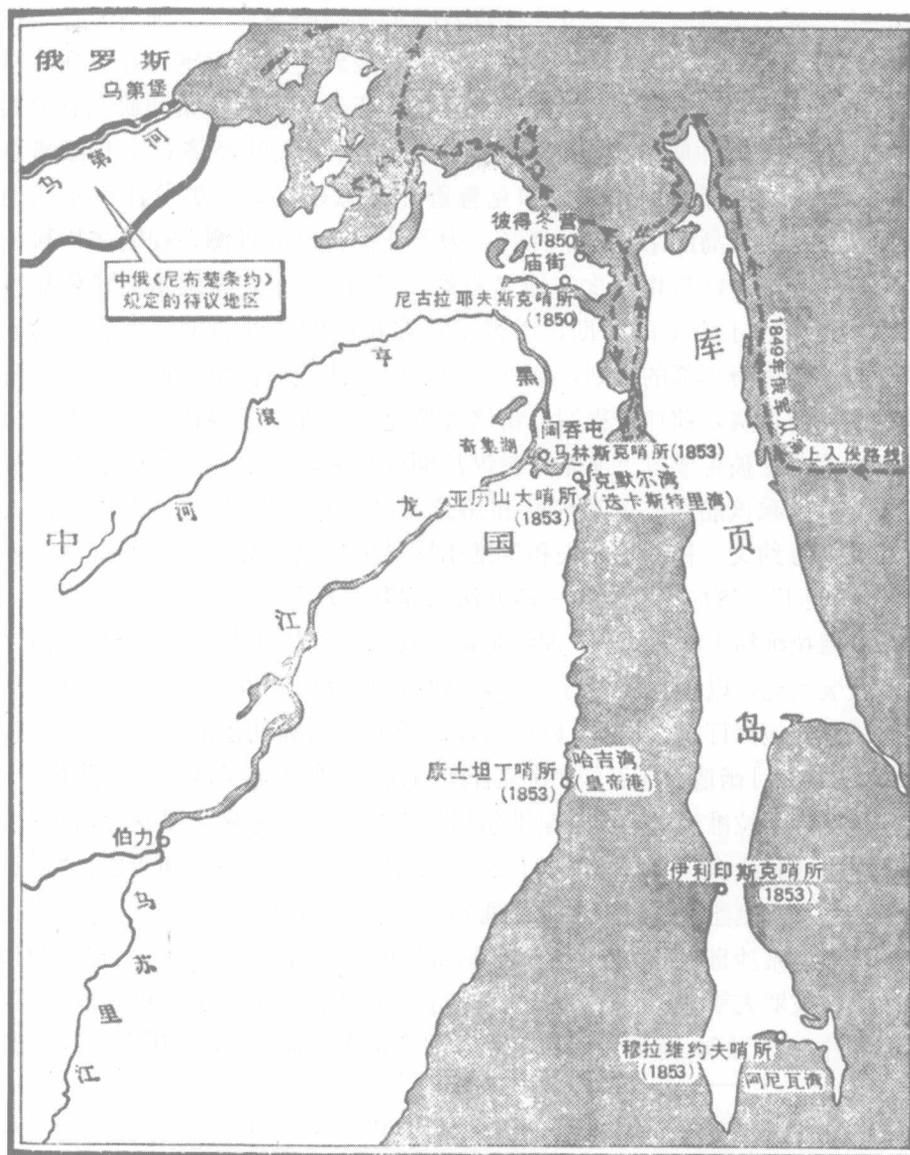
① 卡马宁：《涅维尔斯科依传》，载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2页。

② 特列涅夫：《格·伊·涅维尔斯科依》，第14—15页。

③ 什利亚明：《格·伊·涅维尔斯科依船长的功勋》，1949年莫斯科出版，第3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74页；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第122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81页。



1849—1853年沙俄海军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示意图

龙江口的”。由于穆拉维约夫和彼罗夫斯基等人的支持，缅施科夫同意了涅维尔斯科依的请求，命令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卸完货后，前往勘察鄂霍次克海西南岸。至于黑龙江河口湾，缅施科夫指示说：“这一地区属于中国”，没有沙皇的诏令，是不能去考察的。但是，这种考察如果不引起有损人、船的事件，也可以“偶然进行”。^①

涅维尔斯科依受命后欣喜若狂，立即决定提前出发。1848年9月2日，“贝加尔”号从喀琅施塔得启程，开往堪察加，船上有军官9人，军士、水兵、炮兵28人。11月下旬，当“贝加尔”号尚在途中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就迫不及待地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寄发了给涅维尔斯科依的密令：要“特别详细测绘”库页岛北部东西两岸、黑龙江河口湾与河口；办事要“严守秘密”；为了“笼络”当地居民，要“态度亲热”，“再送些礼物”。密令还强调：如果在那里遇到了欧洲人，涅维尔斯科依应诡称“我（俄）国船只经常在此地考察海岸”，借以“暗示”“库页岛北部和黑龙江左岸是我（俄）国的领土”！^②这份密令表明，穆拉维约夫的侵略意图比沙俄海军部又进了一步。

与穆拉维约夫等组织与支持涅维尔斯科依从海上入侵黑龙江口同时，沙俄总参谋部也在积极策划从陆路侵入黑龙江，于1849年初向沙皇提出报告，胡说《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不准确”，要求派遣秘密的陆上“考察队”前往外兴安岭南坡一带，以便重新“测定”这段“边界”。^③

为了统一侵略黑龙江的部署，根据沙皇的训令，1849年2月上旬在彼得堡成立了由总理兼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海军总参谋长缅施科夫、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和作战参谋、侍从将军别尔格等主要军政头目组成的“阿穆尔问题特别委员会”（又名“基立亚克委员会”）。该会不顾中俄两国的成约，悍然决定：由海军部派遣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队长的“勘察队”（实际上已派出），勘察黑龙江口一带和库页岛的北部海岸，并尽可能在黑龙江口北岸附近选择有利据点，伺机占领。

2月20日，沙皇批准了这一决定。与此同时，“特别委员会”还审议和通过了总参谋部的上述报告，决定派遣以阿赫杰中校为队长的“陆上考察队”，到外兴安岭南麓中国领土上去“勘界”。为了掩人耳目，“委员会”将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82—83页。

② 穆拉维约夫：《给“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依先生的指令》。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37—38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199—200页。

该队命名为“外贝加尔地区考察队”，并规定：“万一碰到中国人，应该回答他们说，是打猎的，因追踪猎物而越界。”“考察”任务应于三年内完成。^①此项决定，也于2月间经沙皇批准。

同年4月，这个由24人组成的“陆上考察队”在阿赫杰率领下从彼得堡出发。沙皇命令穆拉维约夫协助该考察队尽快完成任务，以便根据米登多尔夫在外兴安岭南麓找到的“界牌”“最终确定俄中边界”。^②穆拉维约夫获悉此事后，对彼得堡的上述意图十分不满，认为这和他吞并整个黑龙江以北和滨海地区的计划不一致。因此，他力图将阿赫杰“考察队”的活动纳入自己的行动计划，主张改派该“考察队”赴乌第河地区“勘察”。这一意见随后为沙皇所采纳。

当时，穆拉维约夫特别关注的是涅维尔斯科依入侵黑龙江口的成败。1849年5月，他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取道雅库次克前往堪察加，以便与涅维尔斯科依取得直接联系。

前面提到，为了争取时间，“贝加尔”号提前起航。该船驶离喀琅施塔得后，横渡大西洋，然后绕过南美洲，穿过太平洋，以八个月零二十三天，即比一般船只快两个多月的时间，于1849年5月24日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涅维尔斯科依一到这里，就收到了穆拉维约夫寄来的训令和密信。训令要求他详细“考察”黑龙江口及该河本身的状况，调查库页岛北部港湾情况和黑龙江河口湾一带通航的前景，确定从北面进入该河的途径；探明有无便于“防卫”黑龙江河口湾和它的入口处的地点。为了掩盖沙俄践踏《尼布楚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的海盗行径，训令还要求：“调查”，应秘密进行，船上不得悬挂俄国的军旗或商旗；“勘察”结果应尽速密报缅施科夫和穆拉维约夫转呈沙皇，不得声张。密信强调：“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在1849年年底将关于黑龙江口和河口湾的情报上报。^③

涅维尔斯科依接信后决定开始行动，“前往黑龙江口和河口湾，即当时我国（俄国）政府及整个文明世界公认属于中国的地方去。”^④6月11日，“贝加尔”号卸完货物，立即南驶，6月24日到达库页岛东岸，转而向北，开始了在中国领海内的“探险”活动。涅维尔斯科依在库页岛北部没有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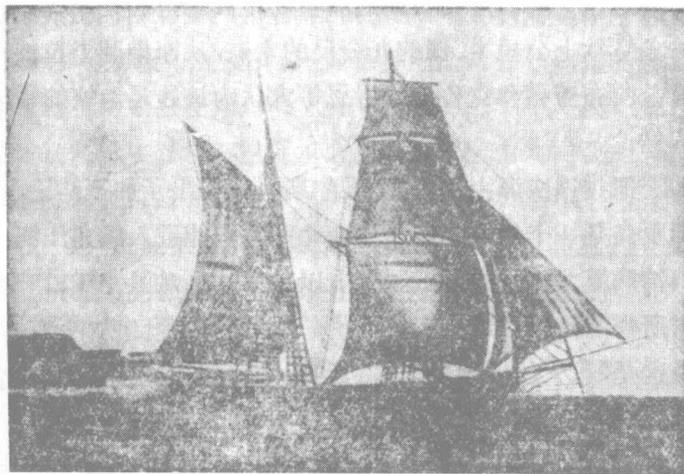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00—201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71页。

③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21—22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63页。

可供海船使用的避风港，便转向西南行驶，穿行于该岛与大陆之间的海面，沿途不断测量水深，描绘海岸，终于确定了从北面进入黑龙江河口湾的航道，并于7月9日下午侵入河口湾北部进行详细侦察。随后，他派海军准尉格罗特乘舢板沿库页岛西岸往南调查水道情况；派海军中尉卡札凯维奇乘舢板沿大陆海岸向南偷测黑龙江口。^①卡札凯维奇到达黑龙江口后，便沿河道左岸探测，找到了一条深6—9米的水道。接着，7月22日，涅维尔斯科依亲自出马，率领3名军官、14名水兵，分乘3只舢板，顺卡札凯维奇找到的深水线，于次日潜入中国内河黑龙江，当晚沿左岸到达库艾格达岬，并擅自将该地改名为康士坦丁半岛。25日，又潜往黑龙江口右岸，然后沿河口湾向南行驶，进入鞑靼海峡，一路上不停地测量水位，察看地形。经过12天，舢板到达了大陆海岸与对面的库页岛距离最近之处，找到一条宽约7.5千米、深约9米的水道，从而推翻了拉彼鲁兹、布劳顿和克鲁逊什特恩等人认为该处是地峡的错误结论。



首次从海上侵入黑龙江的沙俄兵船“贝加尔”号

（采自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126页）

通过这次海上入侵，涅维尔斯科依得出了如下结论：库页岛是一个岛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00页。本段所载日期均据涅维尔斯科依与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一书的日期稍异。

屿；海船从南北两方都能进入黑龙江河口湾和黑龙江。这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黑龙江口一带所作的比较接近事实的描述。沙俄侵略者自吹自擂，说这是“重大的地理发现”。其实，远在涅维尔斯科依的“发现”上千年以前，中国唐朝就对库页岛做了记载。^① 明朝对于“在奴儿干海东”的“苦夷”、“苦兀”、“库兀”即库页岛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② 在清代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已经清楚地标明库页岛是一个脱离大陆的海岛；其后，乾隆年间编撰的《盛京通志》更明确地指出：库页岛是一“大洲”，在“混同江（黑龙江）口之东大海中”。^③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连旧俄学者也不得不指出：“中国人从很古以来，就确信库页岛是一个岛屿”，并且早就绘图立说，对自己的这一带领土，做出正确的记载了。^④

涅维尔斯科依在达到主要目标之后，又按照穆拉维约夫的指令，窜到鄂霍次克海西南海岸进行测绘。他在黑龙江河口北面，先后“找到”一个巨大的港湾和一个开阔的可以避风的停泊场，并擅自把这两处分别命名为幸运湾和圣尼古拉湾。

9月15日，涅维尔斯科依踌躇满志地回到阿扬。这时穆拉维约夫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候“贝加尔”号的消息。当“贝加尔”号在阿扬港海面出现时，穆拉维约夫亲自乘汽船前去迎接，立即听取了涅维尔斯科依的汇报。随后，他派卡尔萨科夫专程前往俄都，给缅施科夫呈送涅维尔斯科依的简要报告和他本人有关此事的公函，极口称赞涅维尔斯科依的海盗行径表现了对“祖国（俄国）的无限忠诚”，“给祖国带来利益”。^⑤

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为彼得堡搜集了有关黑龙江口一带的极重要的情报，向沙俄当局证明了黑龙江是一条从西伯利亚腹地通向太平洋的重要航道，更加激起了沙俄侵吞我国黑龙江地区的野心。正如旧俄学者所说，这是沙俄“为占领黑龙江迈出的第一步”。^⑥

同年12月，涅维尔斯科依回到伊尔库次克，进一步向穆拉维约夫陈述

① 《新唐书》，第219卷，《黑水靺鞨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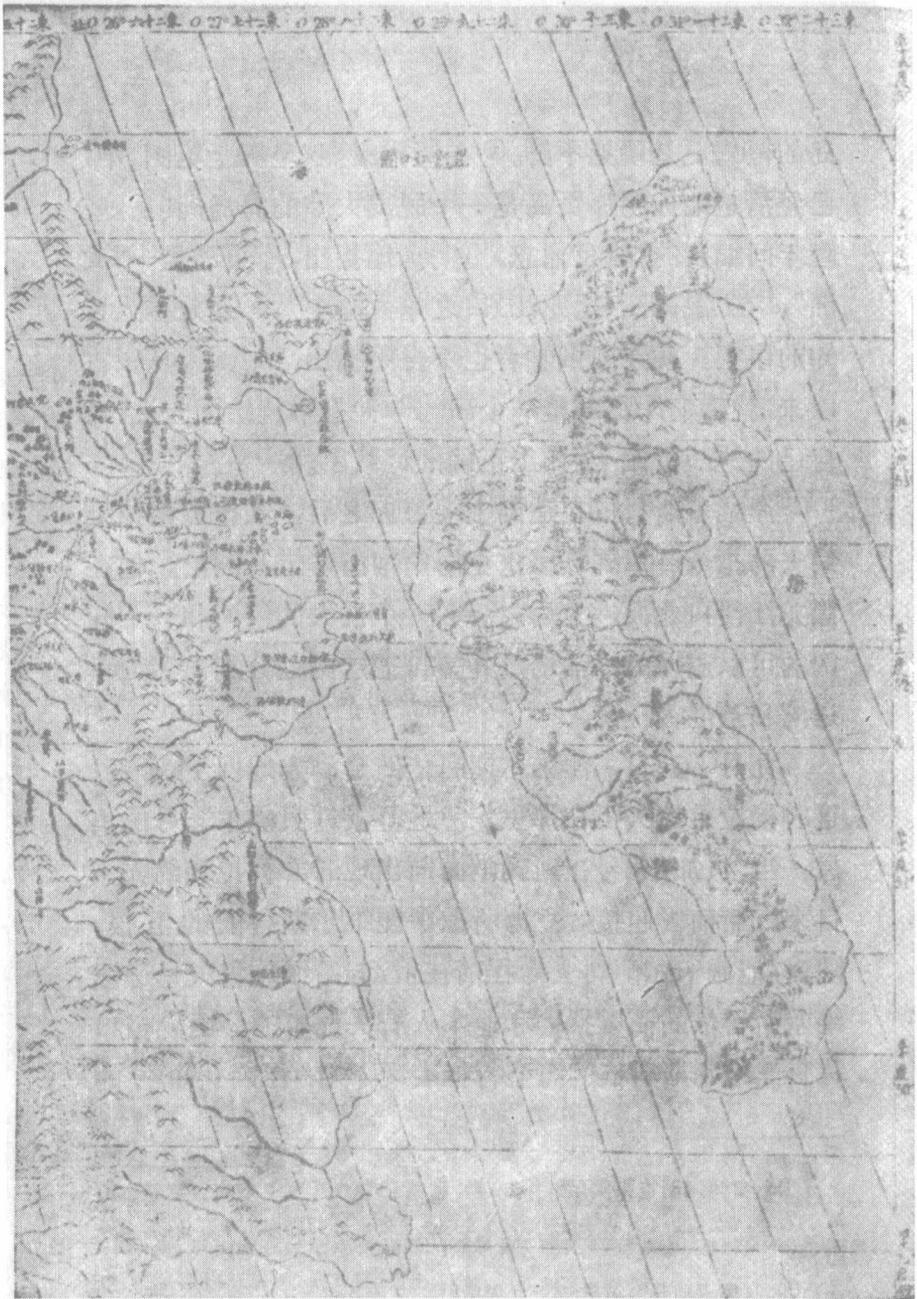
② 参见《明宣宗实录》，第69卷，宣德五年八月庚午条；《寰宇通志》，第116卷，《女直》；《大明一统志》，第89卷，《女直》；《辽东志》，第9卷，《外志》等。

③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第27卷。

④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36页。

⑤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45页；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第69—70页。

⑥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1页。



1718年康熙《皇與全覽圖》中的黑龙江口和库页岛

占据黑龙江下游的“重要意义”，主张俄国政府应当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勘察，大规模地向那里移民，“不失分秒地在黑龙江下游站稳脚跟”。^①

穆拉维约夫支持涅维尔斯科依的上述主张。1850年1月，他特派涅维尔斯科依前往彼得堡，向缅施科夫呈交“考察”黑龙江口的全部记录、地图以及他亲自起草的报告，强调俄国“必须刻不容缓地占据黑龙江口”，然后夺取黑龙江的航行权，占据黑龙江左岸。他要求立即从鄂霍次克派人前往黑龙江口库艾格达岬附近修造冬营，认为这是俄国占据黑龙江的“标志”和“开端”。^②

涅维尔斯科依到达彼得堡后，受到缅施科夫的热烈欢迎。缅施科夫表示，他和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完全赞同“立即占领黑龙江口”的意见。^③但是，涅谢尔罗迭等认为占领黑龙江口的时机尚未成熟。尼古拉一世为了解决这一分歧，于1850年2月14日下令召开“特别委员会”进行研究。缅施科夫和彼罗夫斯基在会上大肆赞扬涅维尔斯科依的活动，竭力鼓吹占领黑龙江口的必要。涅维尔斯科依也到会发表意见，狂妄地宣称占领黑龙江口轻而易举。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采取折中方案。15日，委员会决定：以经营俄美公司业务为名，先在幸运湾或鄂霍次克海西南岸某地设立冬营，但不能触及黑龙江口及河口湾；为建立和防守冬营，从鄂霍次克调派25名哥萨克和水兵。同时，擢升涅维尔斯科依为海军上校，指定他负责执行占领幸运湾的任务。^④

担负着新的侵华使命，涅维尔斯科依于同年夏季从俄京匆匆赶到阿扬，率领25名武装人员乘“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直驶幸运湾。7月9日，涅维尔斯科依等到达目的地，与俄美公司派往当地的奥尔洛夫会合，随后占领了离黑龙江口很近的海岸，并于7月11日在那里建立了俄国第一个侵略据点——彼得冬营。接着，又从阿扬给该据点运来了更多的兵员和武器弹药。^⑤至此，涅维尔斯科依完成了沙俄政府交给他的侵略任务。

但是，涅维尔斯科依绝不以此为满足。7月24日，他亲自率领6名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12页。

② 穆拉维约夫：《呈御前海军总参谋长、侍从将军缅施科夫先生的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50—52页。

③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第76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17—118页。

⑤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54页。

水兵和 2 名译员乘坐小艇，携带火炮 1 门，进一步闯入黑龙江，上驶约 120 千米，到达特林，即中国明朝奴儿干都司衙门和永宁寺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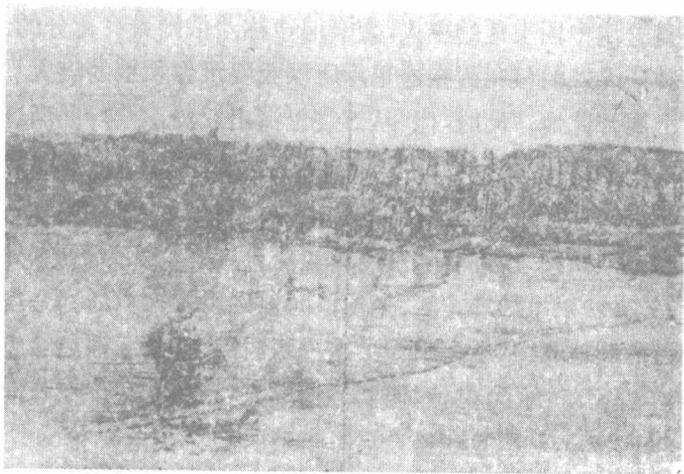
沙俄侵略者的出现，引起了我国当地居民的警惕。当涅维尔斯科依和译员刚爬上岸，200 名左右村民马上把他们团团围住。一名年老的清朝官员（章京）上前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不经中国许可，“任何人都无权来到这里”。这时，涅维尔斯科依不但拒不撤离，反而自称是这块中国土地的主人，蛮横地声称：“俄国人有足够的、独一无二的权利留在这里，所以我要求你和别的满人马上离开此地。”同时，他“从口袋里掏出双筒手枪对准满洲人”，威胁说：如果谁敢反抗，“马上就送他归天”。在涅维尔斯科依的示意下，其他水兵也都拥到岸上，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进行恫吓。接着，他扬言：俄国“认为石山（外兴安岭）以下的黑龙江、全部滨海地区以及库页岛都是自己的属地”；“从现在起”，当地一切居民“已处于沙皇的庇护之下”，为了“保护”他们，俄国人“已决定在伊斯开湾（幸运湾）和黑龙江口设立军事哨所！”^①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俄国海军军官凭借武力，非法闯入中国领土，肆无忌惮地把大片中国领土宣布为“俄国所有”，真是狂妄之极！

在特林逞凶以后，涅维尔斯科依掉转船头顺黑龙江下驶，于 8 月 13 日窜到江口附近的庙街。当天，他强迫附近各村居民到这里集合，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升起俄国的军旗，宣布在该地建立以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侵略据点——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随后，他把同来的 6 名水兵、1 门火炮留下，实行军事占领，自己已经彼得冬营回到阿扬。

应当指出，俄美公司在沙俄的领土扩张活动中，起着十分恶劣的作用。它不仅掩护和支持涅维尔斯科依，而且打着“开展贸易”的幌子，直接从阿扬派人潜入黑龙江口北岸我国费雅喀族地区进行侵略活动。早在 1845 年，该公司就曾派海军准尉奥尔洛夫从阿扬潜至黑龙江口北部，窃取情报，并为建立冬营预定地址。^②1847、1848 年，奥尔洛夫前往邻近亨滚河的土古尔河一带活动。1849 年 3 月，沙俄政府应俄美公司总经理处的请求，从鄂霍次克派出工匠和哥萨克各 10 名，组成“俄美公司阿扬商站贸易考察队”，由奥尔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 119—121 页。

②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 年阿穆尔勘察队》，第 11 页。



沙俄在庙街强建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采自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

洛夫率领前往黑龙江河口湾以北地区继续活动。^① 同年夏，这个考察队在上述地区获取了“有价值的材料”，并写了“关于这个地区的概况”。^② 1850年3月，奥尔洛夫又奉命率领3名随行人员，携带大量“礼物”从阿扬出发，越过乌第河中俄未定界地区，于6月17日到达幸运湾，再由此乘船闯入黑龙江口，窜到库艾格达岬。一路上他不停地在费雅喀人中进行策反活动，探问黑龙江口结冰、开冻的时间，窥测黑龙江口航运情况和陆上交通条件，测量地形和水深，私绘地图。7月9日，涅维尔斯科依在幸运湾登陆时，第一个前来与之会合并充当向导的也就是这个奥尔洛夫。他实际上就是涅维尔斯科依第二次入侵黑龙江口的先遣人员。涅维尔斯科依返回阿扬后，奥尔洛夫被任命为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指挥官，并被授予“在各种情况下相机行事”的权力：如果外国人到此，“应向他们宣布这是俄国的领土”；“如果满人前来贸易，则声称是同基立亚克人进行贸易的俄国商人。”^③ 俄美公司在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的罪恶活动中，就是以这种极端狡诈的姿态出现的。穆拉维约夫后来供认：“俄美公司在黑龙江事业一开始，就扮演了颇为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69—70页。

② 奥孔：《俄美公司》，第223页。

③ 穆拉维约夫：《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76页。

重要的角色，为这一产生了重要成果的事业奠定了基础。”^①

1850年秋，穆拉维约夫和涅维尔斯科依先后动身赴彼得堡。12月，穆拉维约夫根据涅维尔斯科依的报告，向尼古拉一世汇报了占领幸运湾和庙街的经过。沙皇“仔细地听取了”他的陈述，“表示十分满意”。^②在随后呈交的“特别条陈”里，他进一步建议将黑龙江下游我国费雅喀等族人民“纳入俄国国籍”。^③同时，他要求明年夏天用“在鄂霍次克海所拥有的全部兵力来加强”黑龙江口的哨所，并通过同清政府的谈判，“实现俄国取得黑龙江航行权的宿愿”。^④“特别条陈”上达后不久，沙皇为表彰穆拉维约夫的“非凡业绩”，连续赐给他两枚勋章，颁发了嘉奖令。

12月下旬，沙皇政府召开所谓“黑龙江与基里亚克问题委员会”，参加者有各部大臣、海军总参谋长和穆拉维约夫等。会上，穆拉维约夫、缅施科夫和彼罗夫斯基等人竭力强调占领庙街的必要性。涅谢尔罗迭则认为，在庙街等地“建立兵营为时尚早，而且太危险”，因为当时俄国正在加紧准备对土耳其作战，不应同时在太平洋地区采取类似步骤，以免“中国大兴问罪之师”，影响俄国在近东的侵略部署。他主张“对于黑龙江口一带应审慎行事，逐步加以占据，而且必须通过俄美公司”进行，并主张立刻从庙街撤出。^⑤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定，撤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以俄美公司之名继续保留彼得冬营，但不得触及黑龙江和库页岛。^⑥

会议同时重新研究了阿赫杰“考察队”的任务，决定由该“考察队”“勘察”格尔必齐河以东山脉的走向和乌第河未划界地区。^⑦

但是，尼古拉一世对撤销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决议极不满意。他亲自召见了涅维尔斯科依，亲热地拥抱他，夸奖他的海盗行为是“好样的、高尚的、爱国的”，并连连感谢他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赐给他勋章一枚，然

① 奥孔：《俄美公司》，第224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80页。

③ 穆拉维约夫：《特别条陈》。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85页。

④ 穆拉维约夫：《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79页。

⑤ 穆拉维约夫：《签署皇太子主持的钦命召开的黑龙江与基里亚克问题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时写的特别条陈》。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81页。

⑥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49页。

⑦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30页。

后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叫嚷说：“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①

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基立亚克委员会”于1851年1月底重新开会，由皇太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担任主席。亚历山大在会上“坚决表示应该占领黑龙江口”。缅施科夫、彼罗夫斯基继续强调必须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增强兵力，在黑龙江口沿岸进行水上和陆上的巡逻，并通过“贸易”扩大对该地居民的“影响”。2月中旬，会议做出了新的决定。下旬，沙俄政府正式命令，以“俄美公司零售店”的形式保留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从西伯利亚舰队抽调官兵63名，组成“黑龙江勘察队”，加强彼得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由涅维尔斯科依任队长，归东西伯利亚总督统一调遣。^②

涅维尔斯科依受到尼古拉一世本人的赏识，更加趾高气扬。会后不久，他就离开彼得堡，赶往东西伯利亚。1851年7月，他从鄂霍次克率领一批军官、水兵和哥萨克，乘船第三次闯入幸运湾，与彼得冬营的俄军会合。8月中旬，涅维尔斯科依亲自率领博什尼亚克中尉和25名武装人员，再次侵入库艾格达岬。他极力煽动费雅喀人“不要听满洲人的话”，妄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同时利用东正教“作为在基立亚克人中间扩大俄国影响的工具”。^③他曾直言不讳地供认：俄国入侵者正是凭借大炮和十字架来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的。^④

为了搜集更多的情报，涅维尔斯科依以彼得冬营为基地，一再派遣武装的小分队到黑龙江下游、库页岛等地活动。1851年9—12月，侵略者的足迹已扩大到亨滚河、黑龙江下游右岸和鞑靼海峡沿岸。1852年1—2月，涅维尔斯科依又陆续派出4个小分队，分别侵入土古尔河上游、奇集湖、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又名南格玛尔湾）和库页岛。3月初，涅维尔斯科依借口从乌第河上游一带得到的情报，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说什么外兴安岭从乌第河上游起不是向东北，而是向西南延伸，横跨黑龙江中游及松花江，直达朝鲜边境和日本海，并断言：“按照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第一条，黑龙

① 格鲁兹捷夫：《阿穆尔》，1900年彼得堡出版，第15—16页；日丹科：《纪念海军上将格·伊·涅维尔斯科依》，1913年海参崴出版，第15—16页。按：后来沙俄侵略者在海参崴为涅维尔斯科依建立“纪念碑”时，公然把尼古拉一世的这句话刻在石碑上，作为他们永远奉行的方针。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24—125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45页。

④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31页。

江边区和乌苏里江边区至海应当属俄国所有。”^①由于这种异想天开的说法太不顾起码的地理常识，连旧俄学者也不得不指责它是“牵强附会”。^②早期苏联在再版涅维尔斯科依的《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一书时，也一再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③然而，在很长时期内沙俄侵略者却一直把这个谎言当作他们向中国提出狂妄的领土要求的主要依据！

与此同时，涅维尔斯科依还制订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要求穆拉维约夫准许他：

1. “占领奇集屯和南格玛尔湾（即克默尔湾），把它们作为离尼古拉耶夫斯克最近的据点”，并“向南勘察鞑靼海峡沿岸，直到朝鲜边界为止”；

2. “派遣一个特别勘察队去勘察乌苏里江”，并在江口附近建立冬营。为此目的，他要求增拨经费，扩大“勘察队”的建制，增派2名军官和50名队员。^④

他还要求在葛林河和亨滚河上游、宏加力屯、乌苏里江口和库页岛等地建立哨所。他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先武装占领奇集屯和克默尔湾，然后以此为据点，逐步吞并整个黑龙江地区、乌苏里江地区和库页岛。

穆拉维约夫完全赞同涅维尔斯科依的计划。1852年通航期一开始，他就根据涅维尔斯科依的请求，下令从鄂霍次克调派水兵和哥萨克去补充彼得冬营，并将涅维尔斯科依呈请占据克默尔湾和奇集屯的报告转呈康士坦丁亲王，竭力说服彼得堡当局予以批准。

与涅维尔斯科依在我国黑龙江下游的侵略活动相配合，以阿赫杰为首的“陆上考察队”，根据沙俄政府“特别委员会”的决定，也潜入外兴安岭以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侦察活动。1852年12月，阿赫杰于完成“勘察”任务后回到伊尔库次克，向穆拉维约夫呈交了有关黑龙江的重要情报和地图。穆拉维约夫如获至宝，认为俄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措施”，立即将黑龙江以北及沿海广大地区“置于我（俄）国保护之下”，^⑤并打发阿赫杰带着上述情报赶赴俄京汇报。紧接着，穆拉维约夫本人也于1853年4月初应召赶到彼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50、175页。

②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50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19页，第381页注128。

④ 同上书，第151—152页。

⑤ 穆拉维约夫：《奏疏》。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02页。

得堡。

当时，尼古拉一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①加紧了对其土耳其的侵略。英、法为了维护自己在近东的势力，支持土耳其对抗俄国。双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穆拉维约夫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可能扩及远东，因而主张在远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到达彼得堡后，他立即上书沙皇，力陈英国正在进一步向中国扩张，为了“抢在对手之前”，实现沙俄在远东的侵略目的，俄国首先必须修改同中国的边界；同时，为了使“俄国的东洋沿岸一带的统治获得更迅速、更可靠的发展，应该立即批准俄美公司占据库页岛”。^②

尼古拉一世对于穆拉维约夫的扩张计划极为重视。4月23日，他悍然授权俄美公司占据库页岛，并批准扩大“黑龙江勘察队”的编制。

接着，沙皇于5月初亲自召集会议，听取穆拉维约夫和阿赫杰的侵华报告。他浏览了阿赫杰进呈的地图后，指着从牛满河（布列亚河）直至太平洋的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叫嚷：“这是我们的！”然后对陆军大臣说：“请就此事与中国人进行交涉。”之后，沙皇把穆拉维约夫叫到黑龙江全图跟前，手指着黑龙江口对他说：“一切都很好，可是我得从喀琅施塔得派兵去防守它。”穆拉维约夫连忙回答说：“陛下，用不着从那么远的地方派兵。”说着，手指从外贝加尔地区顺着黑龙江向东移，补充道：“可以就近派兵防守。”沙皇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说：“唉！穆拉维约夫，总有一天你会为黑龙江发疯的！”穆拉维约夫心领神会地回答：“陛下，走这条路是迫于形势啊！”沙皇赞赏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好，那就让形势把我们引上这条路吧，我们等着。”^③

当然，尼古拉一世并没有“等着”。会后，他就批准了占领克默尔湾和奇集屯的决定，同时悍然宣称：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下游以北和鞑靼海峡沿岸克默尔湾等地“属于俄国”。^④这样，尼古拉一世不但完全批准了涅维尔斯科依的侵略行动，把已侵占的中国黑龙江口的大片领土列为俄国的属地，而且把尚未侵占的中国黑龙江中游以北及滨海广大地区，强行划入了俄

①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0—241页。

② 司徒卢威：《西伯利亚回忆录（1848—1854）》，1889年彼得堡出版，第152—156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25页。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54—155页。

国版图。

涅维尔斯科依据以往的经验，深知他所采取的“跑在中央训令前面”的种种措施，完全符合沙皇的本意。^① 因此，还在沙皇作出上述决定以前，他便派军队于3月间分别占领了克默尔湾和奇集屯；6月上旬，他又派兵侵入“世界上最优良最宽阔的海湾之一”——哈吉湾，并擅自命名为尼古拉一世皇帝港（现称苏维埃港）。^②

1853年7月23日，涅维尔斯科依在彼得冬营接得穆拉维约夫的通知，得悉沙皇已下令占据库页岛，并决定从堪察加增派100多人及一艘轮船归他调遣。在同一通知中，穆拉维约夫命令他可在库页岛南部先占据两三个据点，架设大炮，构筑工事，并升起俄美公司的旗帜。^③ 涅维尔斯科依接令后立即采取行动。26日，他率领奥尔洛夫等16人乘“贝加尔”号直驶库页岛，由北端沿东岸南下；8月11日到达该岛最南部阿尼瓦角，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停泊场，便驶入鞑靼海峡。18日，该船进入哈吉湾。尽管沙皇的命令没有要求侵占该地，但涅维尔斯科依认为，在这里建立哨所后，“俄国人就会成为全部沿海地区的实际主人”，因此，仍然决定在该地最大的内港建立康士坦丁哨所，实行军事占领。^④ 21日，“贝加尔”号继续北上，驶入克默尔湾，涅维尔斯科依登陆后就地建立了亚历山大哨所，之后，徒步前往奇集湖，于阔吞屯旁强建了马林斯克哨所，再取道庙街，于29日返回彼得冬营。奥尔洛夫等人则驾船驶往库页岛西岸，在北纬50°附近强建了俄国在该岛的第一个侵略据点——伊利印斯克哨所。

9月6日，穆拉维约夫的专差官少校尼·布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带领军队，乘“尼古拉”号到达彼得冬营。与涅维尔斯科依会合后，两人乘同一艘船再度南侵库页岛，于10月2日进入该岛优良港湾——阿尼瓦湾。经过两天的侦察与准备以后，10月4日，涅维尔斯科依指挥布谢、鲁达诺夫斯基等带领25名水兵在该湾强行登陆，随即在岸上竖起俄国军旗，架设大炮，并在该湾东面的高地设立了以穆拉维约夫的名字命名的哨所，蛮横地声称：“库页岛作为黑龙江下游的延续地区，属俄国所有。”^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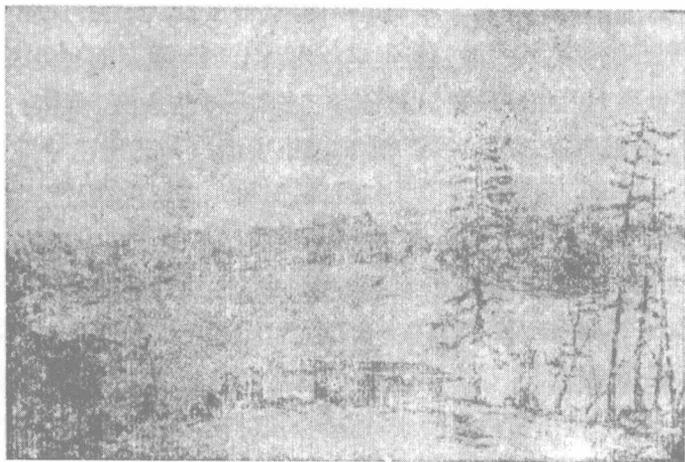
①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48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212页。

③ 法因别尔格：《俄日关系（1697—1875）》，第136页。

④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第123页。

⑤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237页。



沙俄侵略军在哈吉湾（皇帝港）强建的康士坦丁哨所

（采自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

尼古拉一世对涅维尔斯科依“行动坚决和占领库页岛主要据点一事十分满意”，在涅维尔斯科依的报告上亲自批了“很重要”三字，并且又赏给他勋章一枚。^①同时，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也下令嘉奖“黑龙江勘察队”。

至此，沙俄通过对阔吞屯（马林斯克）、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哈吉湾（皇帝港）等战略要地和海港的非法侵占，已把黑龙江下游地区大片中国领土，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从而为鲸吞整个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广大地区和攫取黑龙江航行权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沙俄哥萨克军对黑龙江地区的大举入侵

1854年夏季，在穆拉维约夫的直接指挥下，大批俄国兵船运载哥萨克部队，从外贝加尔强行闯入我国黑龙江，揭开了沙俄全面占领黑龙江左岸地区的序幕。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50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283页。

如前所述，沙俄早就蓄谋攫取黑龙江航行权。穆拉维约夫就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屡次建议沙俄政府向中国提出自由航行黑龙江的要求。这一方面是为了借以向太平洋地区的俄国殖民地运送军队和物资，而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割取我国黑龙江流域广大领土。沙俄侵略者曾经公然声称：俄国一旦“开辟阿穆尔之路”，黑龙江地区“将从此成为我国（俄国）的领土，”^①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们“沿黑龙江航行”的真实意图。在穆拉维约夫的主持下，武装航行和侵占黑龙江的各项准备，如扩大军队、制造武器、修建船舶、筹集军粮，等等，始终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终于为沙俄提供了武装入侵黑龙江的机会。

1853年10月，俄国为了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开战。不久，英、法与土耳其结成军事同盟，次年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开始。

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与英、法为争夺中、近东霸权而进行的不义之战，“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②战争爆发后，英、法的主力被牵制于近东战场。这时，正在欧洲游历、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的穆拉维约夫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尽管中国并未介入战争，他却借口战争的需要，力图加紧向中国实行扩张，并把这一纯粹侵略性的军事政策伪装成对付英国的“防御”措施。他急如星火地从国外赶回彼得堡后，立即于12月11日向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这个秘密报告，一开头就以“防卫”西伯利亚为“理由”，野心勃勃地要求武装占领黑龙江，并进一步控制全中国。他强调：西伯利亚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是俄罗斯的未来”，而“要想保住西伯利亚，目前就必须确保和牢固地占有堪察加、库页岛、黑龙江口，掌握黑龙江的航行权，并且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现在，我们可以用近五年来东西伯利亚逐步培训出来的地方部队来实现这一切。”^③

防御英国是借口，侵略中国是目的。穆拉维约夫自己也无法掩盖这一真相。他在报告中承认：近东的战火可能波及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克海沿岸；但是，“英国人不论想花多大力量，也不会把大量的登陆队派到那些遥远的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60页。

② 恩格斯：《神圣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6页。

③ 穆拉维约夫：《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秘密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04—105页。

地区……英国人以为那里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甚至不会想到有必要派强大的兵力去攻打。”^① 沙俄在远东的军事部署，目标是直接针对中国的。

穆拉维约夫在报告中供称，当时俄国“在外贝加尔省有将近一万六千名步兵和五千多名骑兵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其中有一万三千名步兵和骑兵，配备二十门大炮，可以随时毫不费力地开赴国外，必要时，这个数字还可以增加到一万六千名。”^② 他自恃有了这支可观的军队，就可入侵中国，“开辟黑龙江航线”。根据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首领、修士大司祭巴拉第^③提供的“经常的、十分详尽的关于中国事态的情报”，^④ 他得出结论说：“目前中国的内乱（指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黑龙江而下，满洲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拦，然后也许还会由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应该坚决地回绝……我敢断言，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⑤

接着，穆拉维约夫向沙皇政府报告了准备在外贝加尔边境地区向中国“大显兵威”的方案，以及在1854年解冻后“立即”率领俄军“取近路开赴黑龙江口”的计划，并要求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⑥ 沙皇命令皇太子亚历山大召集“特别会议”进行研究。1854年1月23日，会议接受了穆拉维约夫的意见，悍然决定：不管清政府同意与否，都要“沿黑龙江航行”。^⑦ 这一重大决议，标志着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已进入决定性阶段。

“沿黑龙江航行”的命令下达后，穆拉维约夫立即派主要助手卡尔萨科夫赶赴伊尔库次克，加速进行准备工作。他在家信中透露马上要向黑龙江进军的消息说：“我很高兴，我们决定利用欧洲进攻我国的时机，在亚洲开拓我们的事业。我将尽一切努力为我国奠定这一事业的牢固基础。”^⑧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04页。

③ 巴拉第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特务，1817年生于喀山，原名彼特里·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1840年他以助祭身份随沙俄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9年后回俄，旋以沙俄第十三届传教士团首领、修士大司祭身份来京，直到1859年；1864年率第十五届传教士团再次来华，1878年死于北京。巴拉第以常驻北京及接近清政府要员的机会，秘密搜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以隐色墨水书写，送交沙皇政府及其外交代表。在沙俄对华侵略中，巴拉第扮演了十分卑劣可耻的角色。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56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07页。

⑥ 同上书，第2卷，第105、108页。

⑦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56—57页。

⑧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51页。

3月下旬,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立即派札博林斯基携带给理藩院咨文前往北京。咨文诡称,为了“防范敌人占据我国东部岛屿与大陆领土”,他奉沙皇之命,率领军队取道黑龙江,赶赴太平洋,希望清政府不要“误会”。^①库伦办事大臣以其不合旧例,不准札博林斯基通过;来文按一般外交程序由库伦转送北京。

穆拉维约夫不等清政府答复,便决定采取行动。5月1日他离开伊尔库次克,前往航行的起点站——石勒喀河畔的小村镇石勒喀札沃德。5月19日,当他从边金诺到达该地的时候,石勒喀河上已停泊着满载军需物资的大小船只,岸上沙俄军队来来往往,“使人觉得石勒喀札沃德好象一座大兵营。”^②先期赶来的外贝加尔省的军政官吏、伊尔库次克的富商巨贾和东正教的代表,为穆拉维约夫出发“远征”,在这里大事张罗。高悬在教堂和街心的巨幅“颂词”,充分反映了沙俄侵略中国的狂妄野心。上面写道:“拿下黑龙江,守住这边疆!”“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③

1854年5月26日,穆拉维约夫正式发布入侵黑龙江的“出征”令,随即亲自率领由第十三、十四、十五西伯利亚边防营组成的“远征军”近千名,携带大炮、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分乘“额尔古纳”号轮船等70余只船,筏顺石勒喀河下驶。随行的还有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的一些会员。^④

5月30日,沙俄武装船队越过额尔古纳河左岸的乌斯季-斯特列尔卡闯入黑龙江。6月2日,前锋抵雅克萨;穆拉维约夫第一个跳上河岸,跑到早已被平毁的哥萨克贼窟阿尔巴津的废墟上凭吊早年沙俄侵略者的亡魂。6月9日,俄船到达精奇里江口,穆拉维约夫派专差官斯韦尔别耶夫前往璦琿,要求守城官“放行”。署黑龙江副都统胡逊布因清政府没有准许俄船“假道”黑龙江的命令,不许船队通过。^⑤次日,穆拉维约夫亲自前来璦琿,准备同胡逊布“交涉”,同时窥探当地守军虚实。临行前,他指示卡尔萨科夫,如

① 《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14—115页。按:该文于7月间送达北京时,俄船已过璦琿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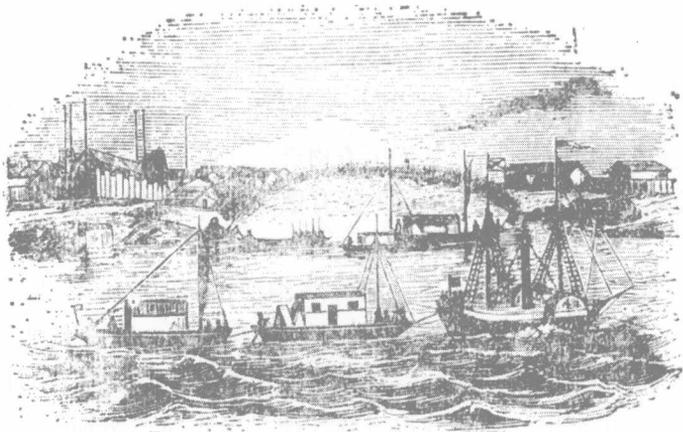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63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364—365页。

④ 阿列克谢耶夫:《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第144—145页;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117—118页。

⑤ 涅维尔斯科依:《俄同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294—295页。

果中国方面不放行，“一俟得到他的命令，立即攻城。”^① 俄船驶近南岸后胡逊布等上船诘问。穆拉维约夫蛮不讲理，硬说：“本属东面各岛，被英吉利侵占”，他奉命由黑龙江“抄近前往……今不放行，殊非取和之道”，并表示俄船决不退回。胡逊布“坚执不许经过”。^② 穆拉维约夫不听劝阻，命令俄船强行通过瑗琿。由于清政府在当地“向未设有战船，亦无水师”，^③ 对突如其来的沙俄侵略军毫无戒备，因此，俄船得以顺流东下。穆拉维约夫对黑龙江两岸富饶美丽的土地非常眼红。6月17日俄船越过乌苏里江口时，他指着江右森林密布、地势扼要的伯力一带地方说，将来要在这里建立“一座城市”。^④ 这就再一次暴露了沙俄“假道”黑龙江是假，企图侵占中国领土是真。最后，俄船于24—25日陆续驶抵阔吞屯，随即将大多数俄军部署在阔吞屯、庙街至克默尔湾一带，“占据村屯”，“砍木垫道，烧砖盖房，打铁练兵，沿江摆列铜炮”，实行野蛮的军事占领。^⑤



俄国武装船队强行通过瑗琿（1854年）

（采自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59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5、8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60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6页。

④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与西伯利亚铁路》，第209页。按：1858年后沙俄在该地强建了哈巴罗夫斯克城。

⑤ 《始末》，咸丰朝，第9卷，第7—8页。

首次武装航行黑龙江得逞后，穆拉维约夫立即派卡尔萨科夫飞奔俄京告捷。尼古拉一世破例接见了卡尔萨科夫，“对黑龙江航行的空前胜利再三表示感谢”，下令嘉奖穆拉维约夫等全体入侵人员，晋升卡尔萨科夫为上校，涅维尔斯科依为海军少将，卡札凯维奇为海军上校。^①

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罪行，并麻痹清政府，穆拉维约夫于7月初命令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行文理藩院说，这次俄军“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并无丝毫扰害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还说什么“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但愿中国同心相信，勿以兵过见疑”。^②沙俄赤裸裸的侵华罪行，竟被说成是对中国的善举，这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强盗逻辑。

穆拉维约夫强行武装航行黑龙江之日，正是英、美、法向清政府要求修改南京、望厦、黄埔诸条约、扩大在华侵略特权之时。陷于内外交困境地的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沙俄入侵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防御措施。咸丰帝在获悉“俄罗斯乘船拥众，由黑龙江东驶”后，对穆拉维约夫“所称与英人争岛之语”，表示“未可尽信”，并下令将黑龙江北岸乌鲁苏木丹卡伦“畏葸无能”的守卡官员革职查办，将不敢堵御俄船、“辄行退回”的巡查边界官“交部严加议处”，将“并未亲率兵丁前往堵御、查问俄罗斯船只”的署黑龙江副都统胡逊布“交部议处，以为坐卡官之戒”；^③然而，在给吉林将军的指示中却又说：“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对入侵船只“只宜勤加侦探”，不可接仗，“密探情形，随时奏报”。^④这种消极退让的态度，为沙俄进一步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

果然，1854年10月，穆拉维约夫刚回到伊尔库次克，就着手部署第二次入侵，积极“准备明年的航行”。^⑤12月2日，他在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强调：“为了明年的航行需要做许多工作，我们不能错过时机。”他要求卡尔萨科夫从速带一名造船工程师和造船图纸赶回伊尔库次克。他还说，已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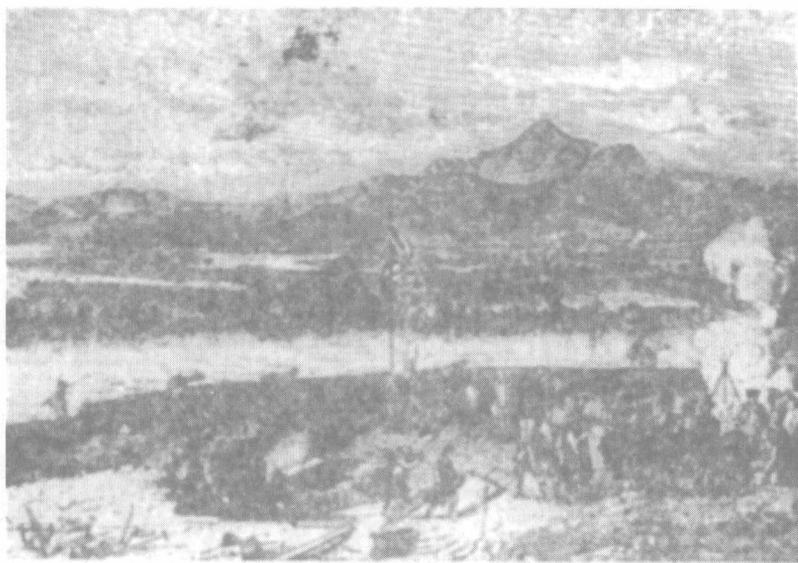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84、386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25—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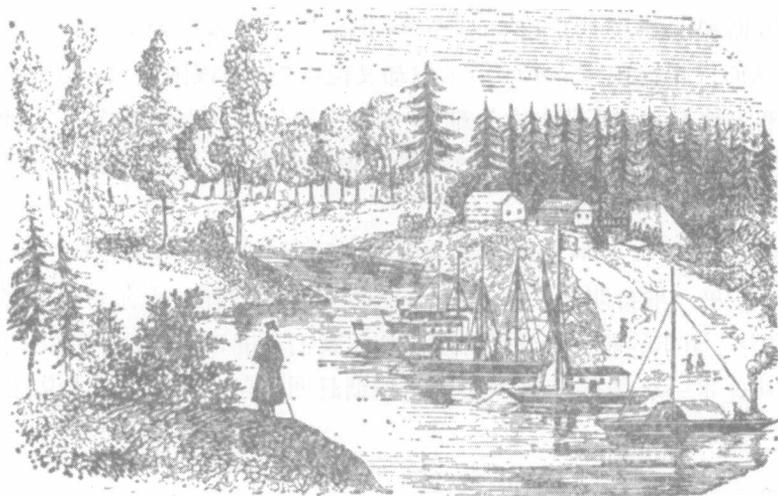
③ 《清文宗实录》，第131卷，第41页；第132卷，第5—6页。

④ 同上书，第131卷，第41页；第132卷，第9—10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36页。



沙俄占领下的阔吞屯（马林斯克）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俄国兵船云集阔吞屯（1854年）
（采自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

请康士坦丁亲王批准向美国订购轮船和轻巡航战船。^①同时，穆拉维约夫下令为第二次武装入侵黑龙江准备 130 艘船只、1 万普特要塞重炮、弹药以及其他军需物资。

1855 年 3 月 2 日，穆拉维约夫行文理藩院，声称他奉沙皇之命，为了“剿办英夷”，“即带领重兵，载运军器牲畜等件，复带接济东海兵船口粮，俟水路可行，即乘船由黑龙江地方，驶赴东海。”^②按照上述照会，沙俄的目的似乎仅限于“假道行兵”、“防堵英夷”，可是，4 月 10 日穆拉维约夫在给陆军大臣苏霍札涅特的公函里却供认：“今年我准备从外贝加尔军哥萨克骑兵中留下一连人，在黑龙江中游，即该河左岸布列亚河（牛满河）口处驻防。在该地设立哨所的主要目的，在于勘察地势，以便屯驻大批哥萨克兵。”为了侵吞黑龙江地区，他还决定成立黑龙江哥萨克骑兵团，“明年（一八五六年）四月他们就可动身前往黑龙江，及时在那里安家落户。”^③沙俄侵略者对中国说的是一套，背地里干的又是一套，明为“过境”、“假道”，实为屯兵占地、“安家落户”，不是一清二楚吗！5 月 6 日，清政府复照俄国，指出：俄方不应违背《尼布楚条约》，中俄两国之间，“一切事均应循照旧章方好，庶可两国有益。”照会还指出：“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④拒绝了俄方武装航行黑龙江的无理要求。

穆拉维约夫不等接到清政府答复，便按照预定计划，于 5 月中旬悍然下令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这次入侵共出动哥萨克军 3000 人，分乘 120 余艘船只，分 3 批陆续出发。随行的有 481 名哥萨克“移民”（军屯户）、以马克为首的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黑龙江考察队”，以及一些西伯利亚商人。运送的“主要物资是供加强尼古拉耶夫斯克各炮台火力用的要塞重炮”，^⑤此外，还有大批弹药、粮食和牲畜。首批俄船闯入黑龙江后，于 5 月 27 日到达璦琿附近。署黑龙江副都统、协领富勒洪阿等登船拦阻，面见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1 卷，第 388 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 10 卷，第 24 页。参见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2 卷，第 122 页，《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

③ 穆拉维约夫：《致陆军大臣的公函》。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2 卷，第 126—128 页。

④ 《始末》，咸丰朝，第 10 卷，第 33 页。

⑤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3 卷，第 70 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1 卷，第 417—418 页。

穆拉维约夫，“将钦奉谕旨剖切晓谕，告以令其由外海行走，不准由内江行驶。”^①穆拉维约夫置之不理，强行启碇东行。

6月下旬，沙俄侵略军陆续到达黑龙江下游，随即屯兵占地，建筑房屋，安设炮位，^②并且在阔吞屯至庙街长达300多公里的地带，建立起第一批哥萨克“移民点”和粮食、物资仓库。截至1855年冬，聚集在该地的俄国侵略者，已多达7000余人。^③这样，经过1854和1855年两次大规模的武装“航行”，沙俄基本上实现了对我国黑龙江下游地区的非法占领。

第四节 中俄阔吞屯“谈判”和沙俄对黑龙江地区武装入侵的继续扩大

沙俄侵略军武装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后，立即着手扩大侵略，蓄谋进一步吞并整个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1855年6月，当第二次“黑龙江航行”尚在进行的时候，刚刚登上沙皇宝座的亚历山大二世便悍然决定：“必须坚决地使整个黑龙江左岸属俄国所有”。^④同时，他企图通过外交谈判使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非法占领合法化，并强迫清政府割让更多土地，因此责成穆拉维约夫同中国谈判，签订条约。7月间，康士坦丁亲王将上述决定通知了穆拉维约夫。

武力侵占与“和平谈判”，是沙俄对外扩张中交互使用的两手，也是它在对华侵略中惯用的手段。早在1853年4月，穆拉维约夫就上书尼古拉一世，要求授权他就黑龙江沿岸从牛满河至海大片土地的“归属问题”直接同中国进行“交涉”。但是，涅谢尔罗迭试图先通过所谓“分界立牌”割取黑龙江以北一部分中国土地，暂时避免俄中冲突，以全力从事即将来临的克里米亚战争。因此，他未与穆拉维约夫磋商，就指示亚洲司以枢密院名义于6月28日径行照会理藩院，说中俄东段边界，“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希望清政府派员与东西伯利亚总督商办“设立界牌”事宜，“并求在无

① 《始末》，咸丰朝，第10卷，第35—36页。

② 同上书，第12卷，第9页。

③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与西伯利亚铁路》，第244页。按：其中一部分由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迁来。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68页。

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①

理藩院鉴于俄国枢密院来照中有“自固（格）尔毕（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尚待划界的仅“无界之近海一带”等字样，^②以为俄方确认《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仅要求解决乌第河未定界地区的分界问题，便决定接受俄国政府之请。9月18日，清政府命令黑龙江将军派员先行调查有关“立界”问题，准备与俄方谈判。11月初，咸丰帝根据黑龙江将军意见，决定约俄方于次年解冻后派员前来会商。部署已定，库伦办事大臣奉命于1854年2月26日照会穆拉维约夫，同意俄方建议，并约于“水路可行”后共同查办。

穆拉维约夫虽然早就主张同中国谈判，但这时由于涅谢尔罗迭制订的谈判方针不合他的意图，因此对立即举行谈判态度非常冷淡。他把扩大对黑龙江的武装占领作为当务之急，决定先集中全力抢占更多的中国领土，然后再通过“谈判”，强迫清政府接受既成事实。清政府对于穆拉维约夫的意图毫无所知，仍按计划进行准备。1854年5月24日吉林边界委员、协领富尼扬阿一行奉命从三姓出发，6月24日到达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处附近的拉哈苏苏（同江）。这时，穆拉维约夫率领入侵黑龙江的沙俄武装船队早已过境了。富尼扬阿等兼程追赶，直抵阔吞屯。沙俄官员回答说，穆拉维约夫已前往别处，临行时“并未谈及查界事”。富尼扬阿等被迫折回。穆拉维约夫在庙街接读中方送来的公文，竟置之不理。吉林将军于是奏请清政府知照俄国改期到明春（1855年）再行会晤。^③咸丰帝批准了他的请求。据此，库伦办事大臣于1854年12月23日行文东西伯利亚总督，定于次年6月由中俄双方各派委员，在格尔必齐河会同商定“安设界牌”之事。

1855年4月28日，中方委员富尼扬阿、吉尔哈善等离齐齐哈尔前往格尔必齐河，5月24日，在途中碰到穆拉维约夫等正乘船沿黑龙江东下。穆拉维约夫向中方委员声称，他虽然承办“立牌之事”，但“原定在格尔必齐河的谈判不能举行”，需待他赶到黑龙江口以后“再为商酌”，并无理要求富尼扬阿等回瑗珲等候。随后又把他刚派人到瑗珲投交的5月10日致理藩院的

① 《始末》，咸丰朝，第6卷，第32—33页。

② 同上。

③ 《始末》，咸丰朝，第9卷，第8—9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75页。

照会复述一遍，要求中国派员于9月间到黑龙江口谈判，“将此要事迅速办理”。^①清政府屈从了穆拉维约夫的意见。于是，富尼扬阿等奉命从格尔必齐河折回。8月19日，吉林、黑龙江、库伦三处委员会合后，即乘船驶离璦琿，赶赴黑龙江口。这时，早在黑龙江下游安营扎寨的穆拉维约夫，已接奉前引亚历山大二世6月间的谕旨，决定立即通过“谈判”，进行勒索，迫使清政府割让整个黑龙江以北地区。

9月20日，富尼扬阿一行到达阔吞屯。穆拉维约夫傲慢地派人通知说，他“身受风寒，不能接见，期于明日会晤”。次日，富尼扬阿等如约前往俄国船上，穆拉维约夫仍托病不出。富尼扬阿等候到傍晚6时，才由海军少将札沃依科出来会晤。在会谈中，札沃依科强词夺理，硬说为了防止英、法在太平洋上“对俄国造成威胁”，俄国需要“保卫黑龙江”！^②他蛮横地要求中国把黑龙江左岸“分与俄罗斯人占据，设卡守护”，并允许沙俄“夏由（黑龙江）水路乘船，冬则冰上骑马，上下不断行走”。这一狂妄的领土要求大出中方代表预料，富尼扬阿等当即严正指出：黑龙江左岸“系天朝（中国）地界”，不能让与。札沃依科“无言可答”，声称“俟复穆拉维约夫再定”。^③

9月22日，穆拉维约夫派人向富尼扬阿等提出一份《划界意见书》，强要中国接受。《划界意见书》悍然宣称：俄国花费巨款占领黑龙江口，“绝非权宜之计”；“俄国在黑龙江口集结的兵力和构筑的永久性工事，还要进一步加强”。为“保卫该地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俄国要求：

（一）“在该地占据的一切地方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

（二）“在整个黑龙江左岸设立居民点”，把黑龙江作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

《划界意见书》还大肆威胁说：“只有这样划界，中俄两国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现在和将来可能引起误会的一切根源。”^④

9月23日，双方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亲自出席。他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声称：“为了支持我们的武装力量和补偿其费用，俄国要求归并整个黑龙江左岸和邻近的沿海地区，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作为两帝国的边界”，

① 《始末》，咸丰朝，第10卷，第35—36页；穆拉维约夫：《对华关系条陈》。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30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27—428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2—3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37页。

并诘问富尼扬阿等是否同意俄方提出的《划界意见书》。对此，富尼扬阿等援引《尼布楚条约》及1853年6月28日俄国枢密院致理藩院的照会，严辞拒绝。穆拉维约夫蛮不讲理，竟宣称“由于同英法发生了战争，这一照会已失去约束力”。^①接着他取出俄方擅自绘制的、标明黑龙江左岸“属于”俄国的地图，^②荒谬地说：“黑龙江系由俄国发源，理应将左岸均为俄国地界，乌特河（乌第河）松花江（指混同江，即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龙江——引者）既未分界，即将松花江左岸分给俄国。”富尼扬阿等据理驳斥，重申：中俄两国东部“自（外）兴安岭山梁至东海为界，山阳地面，为中国所属，山阴地面，俱系俄国所属”，只有乌第河一带为“公中之地”，尚待分立界牌。^③同时指出：“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喀）人等，系为我朝贡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④穆拉维约夫无词以对，不得不承认精奇里、西林木迪、牛满等河“系大清国地方”，但仍要求割让给俄国。^⑤富尼扬阿等回答：“不遵旧制办理，不但有伤和好，我等亦不能擅专”。穆拉维约夫硬要富尼扬阿等将他的《划界意见书》带回，促理藩院“作速回复”，^⑥并宣布：来年春季，俄国还要取道黑龙江，“运送比去年和今年更多的兵力、物资和大炮”。^⑦由于俄方的蛮横态度，谈判遂告中断。

11月24日，吉林将军景淳将谈判经过奏报清廷。咸丰帝以黑龙江左岸，“为我国所属之地，诚无可疑；俄罗斯意欲分踞，其心甚为诡诈”，^⑧命令景淳等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1856年1月3日，库伦办事大臣、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会衔，照会俄国枢密院，严正驳斥俄方所谓“黑龙江至东海地方至今尚未划分”及“黑龙江发源于俄国应归俄有”的谬论，重申中国对黑龙江地区的领土主权。照会指出：穆拉维约夫率俄军东来，“自松花江（黑龙江）

① 布谢：《俄国征服黑龙江》，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291页。

② 亨利·麦卡尔维：《中国与阿穆尔州》，载英国《近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387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8页。

④ 同上书，第12卷，第3页。

⑤ 同上书，第12卷，第19页。

⑥ 同上书，第12卷，第8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29页。

⑦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37页。

⑧ 《清文宗实录》，第181卷，第6页。

口至阔吞屯，占据若许地方，均为大皇帝产贡之所，赫哲、费雅哈（喀）人等居住地方，捕打为业，历有年所。再精奇里、西林（木）迪、牛曼（满）河源，亦应本省每年派委官兵巡查。我大清国所属地方，由别国流入界内，及我国流入尔俄罗斯等国河岔，不止一处。此等河岔（归属），岂有以流出之处为辞之理。”接着，照会谴责了穆拉维约夫违反《尼布楚条约》，非法占据我国黑龙江口一带的罪行，驳斥了沙俄“仍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分去”的无理要求，并且要求俄国政府饬知穆拉维约夫按照1853年6月28日俄方来文，“于早年所定地方，迅速立界，以免误越。唯各饬所属，于近海地方，详加履勘。其未分界址地方，比对两国原定档案，秉公酌办。”^①这一抗议照会再次有力地证明：后来穆拉维约夫之流硬说清政府对俄方侵占黑龙江“从来无人提出疑议”、“长期缄默”，等等，^②纯属无稽之谈。

经过阔吞屯谈判，沙俄“阳请分界，阴图侵疆”的强盗面目暴露无遗。^③但是咸丰帝不仅没有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反而继续从东北边防前线抽调大批清军入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④1856年2月2日，吉林将军景淳向京城告急，要求从抽调入关的军队中撤回2000名，补充三姓、琿春、宁古塔三地的兵力，“以资防守”；^⑤咸丰帝竟驳复说：“此时粤匪（诬指太平军）未平，正在攻剿吃紧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同时他还训斥说：“从来抚驭外邦，唯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倘该国来春复至，别有要约，务须妥为驾馭，勿启衅端。”^⑥他对人民群众凶狠如虎狼，摧残唯恐不力，对沙俄侵略者则怯懦如羔羊，一味妥协退让。长期在北京活动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熟知清政府的内情，他密报穆拉维约夫说：“毫无疑问，

① 《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18—21页。

② 穆拉维约夫：《致普提雅廷伯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52、154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23页。

④ 自1853年初至1856年初，黑龙江省先后从瑗琿、呼伦贝尔、布特哈等处抽调入关的边防军，为数多达7000余名。（《黑龙江志稿》，第31卷，第33—44页）吉林省原有守军10105名，至1856年初4次征调入关的共7000名，已回者不及800名；地处边防要冲的三姓、琿春、宁古塔三处仅剩老弱兵丁800余名。结果，边陲辽阔的黑龙省因“军营屡次提调官兵，库存军器短绌，一切掣肘”，“各路无防”（咸丰朝《始末》，第12卷，第17、24页）；“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形成了“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的严重局面。（《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23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24页。

⑥ 《清文宗实录》，第187卷，第14页。

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俄）国采取妥协政策”。^①因此，穆拉维约夫不仅对清政府的抗议置之不理，而且按照原定目标，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了新的侵华部署。

1855年9月26日，即阔吞屯谈判中断后的第三天，穆拉维约夫就照会理藩院说：“本职受命于明年取道黑龙江，为该河口驻军与要塞增援部队，运送大量给养、武器和弹药，并使河口驻军与要塞同内地各省建立冬夏不断的迅速的交通联系。”^②

10月31日，穆拉维约夫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署哥萨克处处长札博林斯基，要“抓紧时间筹办”第三次武装入侵用的装备和轮船。^③11月11日，他又致函札博林斯基说：“假如中国人明年想阻挠我们在黑龙江上航行，我至少应当及时地向他们表明，我们准备向蒙古和满洲地区进军。”^④

针对沙俄的侵略行径，咸丰帝于11月11日颁发谕旨说：“该国上下船只，不得再由黑龙江往还，以符定制。”穆拉维约夫获悉后悍然声称：尽管中国政府禁止通航，俄国可以不予理会。^⑤

为了减少入侵时可能遇到的困难，1856年1月24日，穆拉维约夫命令巴拉第根据他的《划界意见书》的精神，“在北京尽力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国有利”；^⑥同一天，他还派副官沃尔康斯基随带译员希什马廖夫和几名哥萨克，携带大宗行贿物品，以信使名义前往库伦，“搜集详细情报”，探听“中国政府是否真想阻止我们（俄国）航行，是否真为此调动了军队”。沃尔康斯基等人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探明了清政府没有为阻止沙俄入侵而采取任何军事部署。这些情报为穆拉维约夫确定第三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的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⑦

部署完毕后，1856年1月底穆拉维约夫前往彼得堡，向亚历山大二世面

① 穆拉维约夫：《外交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42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39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438页。

④ 同上书，第1卷，第438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2卷，第2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39页。

⑥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北京传教士团首领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的指令》。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44页。

⑦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43—444页。

陈一切，促请沙俄政府采取更坚决的侵略行动。临行时，他将第三次入侵黑龙江的任务委托卡尔萨科夫负责。

同年3月30日，克里米亚战争以沙俄的失败告终，交战双方缔结了《巴黎和约》。沙俄控制地中海、独霸巴尔干的计划暂时受挫，它在近东的出海口被英国堵塞，它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战后，沙俄政府立即采取“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政策，把侵略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它迅速免除了总理兼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及亚洲司司长谢尼亚文的职务，分别代之以疯狂主张侵华的哥尔查科夫和科瓦列夫斯基。4月初，亚历山大二世悍然决定“黑龙江航行继续进行”，必要时可使用武力。^①穆拉维约夫接到命令后立即派副官前往伊尔库次克，通知卡尔萨科夫加紧准备1856年的武装“航行”，指示说：“我相信你会遵照陛下的意旨去对付中国人。即使他们用帆船阻挡你的去路，你仍要继续前进”；要向中国人宣布：“航行每年都要进行”。此外，他提醒说：“你到瑗琿，要设法送钱送礼”，收买清政府地方官员。^②

在穆拉维约夫的精心策划下，1856年5月，卡尔萨科夫率领大小船只120余艘，运载哥萨克军1660名及大批牲畜、军需物资，分三批从石勒喀河侵入黑龙江。^③6月2日，卡尔萨科夫在炮艇护送下，带领第一批船队驶抵瑗琿，狂妄地通知瑗琿副都统魁福说，俄国船只和军队今后将经常在江中往来，因此已决定“在黑龙江左岸若干地方贮备粮食，派人保护”；同时威胁说，俄国在黑龙江口已有军队1万人，还有5000人左右在年内陆续开到，其中500人将驻守瑗琿对岸的海兰泡，“言毕回船，分起开行”，^④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内，沙俄侵略军以“借地囤粮”为名，在黑龙江中游左岸强行建立了4个军事据点：呼玛哨所（呼玛河口对岸），结雅哨所（海兰泡地方），兴安哨所（今苏联帕什科夫北面），松花江哨所（松花江口对岸）。在黑龙江下游强建诺沃米哈依洛夫斯克。魁福派员前往海兰泡劝阻，沙俄军官希尔科夫斯基奉命向中方保证：“各处粮房，本系暂盖，迨秋后全行拆毁”，并“亲书蒙古字铃印，递与该员等作据。”^⑤但是，沙俄说话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45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447—449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82—83页。

④ 《始末》，咸丰朝，第13卷，第9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51—452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3卷，第23—24页。

从来是不算数的。它一旦占领某地，便赖着再也不走。8月21日，穆拉维约夫下令：黑龙江左岸各哨所的沙俄占领军一律“留在原地过冬”，“待明春首次航行时，将他们的家眷、全部家产也迁去，使他们在该地定居下来。”^①不久，他又命令卡尔萨科夫建立黑龙江哥萨克团，待来年开春后增强从乌斯季-斯特列尔卡到阔吞屯的各哨所；同时命令步、骑、炮兵“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向黑龙江南岸进攻。^②

1856年10月，英国为了扩大在华侵略权益，故意制造事端，炮轰、焚掠广州，挑起了又一场海盗式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英国决定联合法国，增派军队来华，扩大战火。刚与英、法在近东火并、吃了败仗的沙俄，从战争一开始就密切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蓄谋趁机渔利，大捞一把。

1857年1月初，巴拉第从北京密报说，俄国应利用目前时机，在中国采取“坚决的行动”。他强调：“我对兼并黑龙江左岸已不再怀疑。”“我意此事可以毫不声张地解决，但是要行动！”^③2月5日，康士坦丁亲王把英、法企图增派重兵侵华的情报函告穆拉维约夫，并通知说，彼得堡为了“获得黑龙江左岸和滨海地区”，准备派普提雅廷为全权公使去中国“谈判”。^④2月10日，俄国驻美公使斯特克利也向彼得堡报告了英、法侵华的意图和目的，暗示它们“不会妨碍（俄国）取得黑龙江”。沙皇立即谕令把这一重要情报转告穆拉维约夫。^⑤2月21日，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致函穆拉维约夫，露骨地表示，“关于英国人在广州的行动及其对中国的进一步意图的最新情报，使我们更加确信：不能丧失彻底解决我国和中国之间现有问题的时机；如难于彻底解决，至少要为此采取某些果断行动。”^⑥

穆拉维约夫也认为英、法发动侵华战争，是俄国的天赐良机。2月9日，他致函科瓦列夫斯基说：“英国人焚烧广州，我丝毫不感到遗憾”；“中国事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67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475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91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83页。

⑤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91页。

⑥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9页。

态对我们十分有利”。^①他要求沙皇政府“赶快批准”把大批哥萨克移民运到黑龙江，以便趁机抢占整个北岸地区。

事实上，穆拉维约夫没有等待彼得堡的批准，一直在全神贯注地部署新的侵略。3月31日，他向陆军大臣报告，1857年初他返回伊尔库次克后，“便立即下令准备把原定于今年迁往黑龙江的哥萨克及其家眷按期运往目的地”，为此而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从未稍停”。其中黑龙江哥萨克团的头三个连已准备就绪，“有关的最后指令一到，便可立即出发。”^②3月18日，他在给卡尔萨科夫的信中透露了野心勃勃的侵华计划：如果俄国政府决定对中国“诉诸武力”，他可以“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璦琿”；还可派出一支部队，从祖鲁海图跨过额尔古纳河，径取海拉尔、墨尔根和齐齐哈尔。过了3天，他又写信给卡尔萨科夫，声称一旦“对中国人使用武力，那末，黑龙江将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基地。在璦琿登陆，从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他还特别强调，俄国应设法“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③

穆拉维约夫始终认为武力是实现侵华计划的基本手段。3月26日，他获悉普提雅廷向清政府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要求后，上书康士坦丁亲王说：“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认为黑龙江是中国的，那末，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④

沙俄政府对于穆拉维约夫抢占黑龙江以北地区的部署完全赞同。康士坦丁亲王首先表示坚决支持向黑龙江左岸大规模进行军事殖民。^⑤接着，亚历山大二世于4月1日亲自批准穆拉维约夫的请求，决定立即增派三连哥萨克兵前往黑龙江。^⑥

5月底6月初，在穆拉维约夫和卡尔萨科夫的指挥下，大批沙俄哥萨克军及其家属、一些俄国商人和“科学家”，分批从石勒喀札沃德出发，第四

① 穆拉维约夫：《致科瓦列夫斯基》。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48页。

② 穆拉维约夫：《呈陆军大臣的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50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85—486页。

④ 同上书，第488页。

⑤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78页。

⑥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95页。

次武装侵入中国黑龙江。6月中旬，哥萨克军主力七八百人，在亚兹科夫少校率领下，不顾清朝官员的劝阻，由黑龙江上游到达目的地结雅哨所。入侵者一面就地建造营房，屯兵驻守，“演练枪炮”，并在海兰泡架设大炮，对璦琿军民进行威胁；一面派先遣部队抢占我国黑龙江上、中游左岸的重要据点，为后续部队铺平道路。^①不仅如此，穆拉维约夫还悍然宣布：从明年航期开始，凡留在黑龙江左岸的居民，均属俄国管辖；不愿受俄国管辖的，都须迁到右岸；中国方面要是稍有反抗或集结兵力，俄国就要进兵右岸，收缴他们的武器，占领璦琿。^②7月7日，穆拉维约夫又悍然发布军令，宣布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所谓“黑龙江防线”，下设两个军分区，分别属外贝加尔驻军司令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③沙俄对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非法的军事占领体制，至此基本确立。

就这样，沙俄坚持武力侵华政策，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于1857年又侵占了我黑龙江上、中游左（北）岸大片土地；在同一年通航期，又向黑龙江流域“移民”2400余名，^④其中包括被释放的苦役犯（大多是强盗、杀人犯）1000名。^⑤到1857年末，黑龙江北岸的俄国“移民”已达6000人。^⑥同时，由于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口强行建立了军事哨所，沙俄把黑龙江上、中游左岸新占领区和1857年以前占领的黑龙江下游地区连成了一片。旧俄学者在记述这一年穆拉维约夫的侵华活动时，曾毫不掩饰地写道：1857年的“基本目标，即造成由哥萨克定居黑龙江的既成事实……已出色地完成了。这样，当中国人着手边界谈判时，他们面临着黑龙江已被（俄国人）占据的事实。”^⑦

清政府对于沙俄上述侵略行径，曾多次提出抗议。6月间，沙俄侵略军刚闯到海兰泡，璦琿副都统魁福即派员前往交涉，“诘其何日折回”。穆拉维约夫倚仗其“人众势炽，性近鸷悍”，先则向中国官员炫耀

①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34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97页。

③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10页。按：1856年末，沙俄政府下令设立以庙街为中心的东西伯利亚滨海省，擅自将我黑龙江下游沿岸地区划归该省管辖。

④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73页。

⑤ 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家的自传》，1899年波士顿出版，第185页。

⑥ 维纽科夫：《1857—1858年向黑龙江移民的回忆》。《阿穆尔地区、中国和日本之行》，第80页。

⑦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13—114页。

武力，“视以利器”，继则宣称“后起人数尚多”，“请仿照恰克图通商，或可彼此相安”，否则“兵丁实难保其不无滋扰”。^①而对所提责问，竟不做正面回答。7月31日黑龙江将军奕山命令呼伦贝尔总管吉拉明阿携带抗议照会，往见穆拉维约夫，严正指出俄军在海兰泡盖房，“是强占中国地方”，要求俄方“即早将人船撤回”。8月24日，理藩院与璦琿副都统魁福又分别照会俄国枢密院与穆拉维约夫，谴责沙俄“不遵旧章，任意妄为”，强烈要求俄国政府遵守《尼布楚条约》，“即将海兰泡等处人船撤回，以后兵船往他国者，仍在外海行驶”，“阔吞屯亦不可留人住居”。^②9月3日和11月9日，理藩院再向俄国枢密院发出照会，谴责沙俄“任意占据中国地方”，要求沙俄把入侵者从“向为中国地界”的海兰泡、阔吞屯等处撤走。^③这一次次的抗议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沙俄入侵，但是，它们却记下了沙俄侵华的滔天罪行。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对于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暴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当时就向全世界人民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港湾周围设立堡垒。”^④恩格斯指出的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第五节 穆拉维约夫武力逼签中俄《璦琿条约》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扩大和沙俄对黑龙江以北地区武装占领的基本完成，俄国政府认为“从政治上”最终解决“黑龙江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紧接着又演出了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的丑剧。

一 沙俄侵略军兵临璦琿城下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占中国南方的门户广州，给清政府以

①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34—35页。

② 同上书，第16卷，第16、19、22页。

③ 同上书，第16卷，第27—28页；第17卷，第20页。

④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重大威胁。侵略者以此为要挟，企图迫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战争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沙俄政府获悉上述情况后，立即召回正在巴黎休假的穆拉维约夫，于1858年1月5日召开“特别委员会”会议，进行密谋。穆拉维约夫极力主张继续向黑龙江“移民”，同时不放弃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谈判，认为这样对俄国最为有利。会议接受穆拉维约夫的意见，决定派他前往黑龙江“加强移民工作”，“赶紧把中国人置于既成事实的面前”，并重新授予他同清政府进行边界“谈判”的权力；同时决定普提雅廷继续留在中国，以便分享英、法可能攫取的一切侵略利益。会议之后，沙俄政府通知清政府说，穆拉维约夫已受命谈判中俄边界问题，如果中国希望了结“黑龙江问题”，可以与他会商。

1858年3月初，穆拉维约夫回到伊尔库次克后，立即派恰克图边务委员携带给理藩院的照会前往库伦，一面伪善地向库伦办事大臣表示俄国“爱好和平”和“对中国友好”的意愿，要“中国政府对俄国有所信任”；一面利用英、法对中国的战争进行勒索，说俄国完全了解清政府“处境的危急”，为了“防堵英夷，请将海兰泡空旷之地给予我（俄）国”；“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俄国今年即将向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沿岸各地“移民”！^①接着，穆拉维约夫又派信使通知璦琿副都统，开江之后，他急于去黑龙江口，不能在海兰泡耽搁过久；如果中国代表准备谈判，最好在他返回时进行。^②其实，此时，穆拉维约夫正急不可待地希望尽快开始谈判，绝不肯延迟这个放手勒索的机会，同时他明知奕山在黑龙江等他去谈判，但他却装模作样，故意表示对此事并不重视，借以抬高身价，以便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作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之后，穆拉维约夫便于4月18日离开伊尔库次克，取道赤塔，准备再度入侵黑龙江。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形势正发生越来越不利于清政府的急剧变化。4月初，英国专使额尔金和法国专使葛罗相继邀请俄、美代表同赴天津。4月下旬，英、法兵船闯入白河口外拦江沙，窥测形势，进行挑衅。英、法侵略军进攻中国越得手，沙俄对清政府的态度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63、164页；《始末》，咸丰朝，第19卷，第24—25页。

^②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47—348页。

也越蛮横。5月4日，驻海兰泡沙俄占领军头目亚兹科夫少校奉命向瑗琿副都统投书，说穆拉维约夫已经启程，五月间即可到达；又说，卡尔萨科夫少将“率领数百人船，下驶前来，如果（奕山）将军在此，一切事件，即可商办。”^①5月8日，穆拉维约夫率领俄军从斯列田斯克顺流而下，直驶瑗琿。等到奕山于5月17日从齐齐哈尔到达瑗琿准备与穆拉维约夫会晤的时候，俄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二 在沙俄炮口下进行的瑗琿“谈判”

挥舞武器进行讹诈，是沙俄对外扩张的惯用手段。1858年5月的瑗琿“谈判”，就是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倚仗自己的哥萨克军队，对中国实行武力恫吓、敲诈勒索的典型事例。

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英、法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刮起的黑风，助长了沙俄在黑龙江掀起的恶浪。

22日，穆拉维约夫趁势率随员乘坐汽艇，在两艘炮艇护送下，耀武扬威地从海兰泡赶来瑗琿，与奕山“会晤”。

23日，双方在瑗琿开始谈判。穆拉维约夫带着卫队前来出席第一次会议。出席的还有外交部官员彼·尼·彼罗夫斯基，满语译员希什马廖夫和总参谋部上校布多戈斯基。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奕山、瑗琿副都统吉拉明阿和佐领爱绅泰。穆拉维约夫首先发言，一开头就重弹沙俄“助华防英”的滥调，向奕山勒索大片中国领土。他宣称：“中英正在交战，英国很可能表现出占据黑龙江口及其以南沿海地区的欲望；只有我国根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系归俄国领有时，才能遏止英国的侵犯。”^②而英国一旦“侵占了方便的沿海港湾，就有可能进攻满洲腹地”，^③因此，“中国政府当前尤须尽快了结此事。”^④接着他又抛出了“自卫”论，说什么“俄国为从海上保卫自己的领土，应当占有滨海地区；而为了建立滨海地区同西伯利亚的联系，应当在黑龙江（从西到东最方便的水路）建立居民点。”^⑤“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

① 《始末》，咸丰朝，第22卷，第16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3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83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3页。

⑤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88页。

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因为这是两国之间最合适的天然疆界”！^①说完，他便拿出俄方擅自绘制的沿黑龙江、乌苏里江至海为界的“边界草图”，叫奕山观看。奕山指出，根据《尼布楚条约》，两国分界，“向以格尔毕（必）齐河、（外）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百数十年从无更改。今若照尔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为求两国和好，俄国应“及早将人众撤回”。^②至于两国未分界址，只有乌第河一处，尚待秉公商办。关于防范英国进犯西伯利亚一事，奕山指出：俄国在西伯利亚早已严密防守，现在英国正在中国沿海侵扰，对西伯利亚岂不比以前更少威胁？^③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穆拉维约夫“指画自带舆图，争执狡诈，理穷处辄以防堵英夷为词，甚至推诿不知。”^④第一次会议历时4小时，没有结果。临散会时，穆拉维约夫把去年他与普提雅廷一起拟定并为哥尔查科夫所赞同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限第二天答复。^⑤

俄方条约草案共分6条：

- （一）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
- （二）在两国界河上，只准两国船舶航行，不准他国船只往来；
- （三）在通商口岸，俄国与各国享同等权利；两国界河沿岸，准予自由贸易；
- （四）黑龙江左岸中国居民，限三年内移居右岸，所需费用，由俄方供给；
- （五）重新审订旧条约，另立新规章；
- （六）本条约为已往诸约章的补充。^⑥

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彻底撕毁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俄国非法占领黑龙江以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合法化，并进一步吞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51页。

② 《黑龙江将军奕山奏与木哩斐岳幅（穆拉维约夫）会商两国边界经过情形折》（1858年6月2日，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③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1944年伦敦出版，第305页。

④ 《黑龙江将军奕山奏与木哩斐岳幅会商两国边界经过情形折》（1858年6月2日，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⑤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88页；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第305页。

⑥ 巴尔斯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10页；《始末》，咸丰朝，第25卷，第11—12页。又据涅维尔斯科依所著《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草案”第四条所订年限为1年，见该书第352页。

24日,双方在俄船举行第二次会议。穆拉维约夫指派彼罗夫斯基出面谈判。中方代表爱绅泰断然拒绝俄方于头天提出的无理要求,并将上述“草案”退回。他指出:中俄边界已为过去两国的条约所确定,不可更改,“以河为界”的话应当删去;奕山只受权就乌第河地区分界立牌事与俄方会商,如果俄方不同意改变自己的草案,会谈势必决裂。^①彼罗夫斯基向爱绅泰暗示,俄国完全了解清政府目前的困境,并威胁说:“俄中两国能维持和好,悉赖俄皇的宽宏大量。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各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按另一种方式行动”。中国企图“依据旧约划定格尔必齐河以东和乌第河附近地区的边界,是徒劳无益的。”^②“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③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竟混淆视听,胡说《尼布楚条约》是在中国的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并且指责清政府向乌第河地区的居民征税,^④等等。在会谈过程中,穆拉维约夫坐在与会议舱仅一板之隔的另一船舱内,通过与布多戈斯基高声谈话,向彼罗夫斯基反复提示,指挥操纵。希什马廖夫则往返于两舱之间,不断向穆拉维约夫请示。^⑤由于俄方的无理取闹,会议仍无结果。

在25日的会议上,爱绅泰等坚持前议,要求俄方放弃第一条,并且说明,乌苏里江一带是吉林省地界,不归黑龙江省管辖,奕山无权就该地划界问题作出决定,应归吉林将军办理。对此,俄方以同意删去“草案”第五条为饵,企图诱使中国方面做出原则让步。^⑥至于“草案”第四条,即限期迁走黑龙江以北中国居民问题,俄方改为“今将黑龙江左岸,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豁尔莫勒津屯),^⑦其中旧居屯户仍令照常安居。”俄方做出这一变动,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和“让步”。彼罗夫斯基事后供

①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2—353页;穆拉维约夫:《致彼罗夫斯基》。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71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4—125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25卷,第13页。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11页。按:沙俄的这一指责,恰好从反面证明清政府对黑龙江以北包括该河下游在内的广大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戳穿了穆拉维约夫之流自己编造的黑龙“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那里从来没有中国人”的谎言。因为,如果清政府没有对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怎么可能到更远更北的乌第河地区去征税呢?

⑤ 胡世泽:《近代中俄关系的条约根据》,1918年巴黎出版,第161—162页;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第306页。

⑥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人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53页;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5页。

⑦ 即江东六十四屯。

认，沙俄这样做，是为了驱使当地居民为入侵的哥萨克生产粮食，并利用他们向南岸“扩大俄国的影响”，把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变成继续南侵的桥头堡。一句话，这样“对俄国不但没有任何害处，相反，会有好处。”^① 这次会议由于俄方耍弄花招，也没有达成协议。

穆拉维约夫看到中国方面不肯屈服，便决定亲自出马，对奕山施加更大的压力。26日，他身穿侍从将军的礼服，佩戴沙皇赐予的各种绶带和勋章，带着随员和卫队，气势汹汹地来到瑷珲，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中国方面“提出条约的最后文本”，企图逼奕山马上签字。^② 奕山“接阅夷（俄）文，（见）并未删改，”^③ 便援引历史事实，拒绝俄方的无理要求，指出：根据《尼布楚条约》，中国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地区享有充分的主权。因为：

- 一、这些地方的居民一直向清政府纳税；
- 二、中国在上述广大地区和两江沿岸设有哨所；
- 三、乌苏里江到海一带，本是当今皇室的故土。^④

穆拉维约夫不顾事实，胡说：黑龙江以北地区和沿乌苏里江一带，“从来”没有中国的哨所；当地居民“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纳税；从17世纪末起俄国对该地区就“拥有充分的权利”。他甚至搬出涅维尔斯科依的谬论说：“根据《尼布楚条约》第一条的原意”，整个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口一带，都属于俄国。因此，如果沿乌苏里江划界，那就已经“是对中国作出了巨大让步！”^⑤

接着，穆拉维约夫又颠倒黑白，硬把近几年沙俄武装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罪行，说成是为了“保卫”这些地方“不受外国人的侵犯”。^⑥ 奕山反驳说：“如果中国人为了同样目的要去尼布楚地区，俄国政府是否允许他们渡过额尔古纳河去驱逐外夷？”穆拉维约夫听了大为恼火，又以英国人入侵中国相威胁，硬要奕山在他提出的条约草案上“毫不犹豫地签字”，说什么“这个条约对中国特别需要”，否则，“以后英国人在什么地方滋事，制造麻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6页。

②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第305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53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25卷，第13页。

④ 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1920年俄国地理学会南乌苏里分会出版，第15页；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53页。

⑤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54页。

⑥ 同上书，第354页。

烦，那时只能责怪中国自己了”！^① 奕山回答说：“要是英国人企图出现在黑龙江”，我们将把他们“扔进大海里去。……”不等奕山说完，穆拉维约夫便勃然变色，起身向希什马廖夫大声叫嚷：“同中国人不能用和平方式进行谈判！”^② “告诉他们，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尽快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我要说的全部说了，现在是他们考虑和接受（俄国的）坚决的、不容更改的建议的时候；为此，我给他们限期到明天。”译员还没把话译完，他便怒冲冲地离开会场，上马直奔码头而去。^③ 穆拉维约夫回船后，当夜俄军大肆武力威胁，黑龙江“左岸炮声不绝，陆屯水船，号火极明”，“势在有意寻衅”。^④

在沙俄枪炮声的恫吓下，奕山终于可耻地屈服。27日，他派爱绅泰等登上俄船，表示愿意接受俄方的一切条件，只要求从条约草案中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穆拉维约夫明知奕山无权谈判乌苏里江地区的划界问题，若坚持一字不许改动，可能造成僵局，对沙俄反而不利；因此他狡猾地表示可以删去“为界”的字样，将乌苏里江以东改为“两国共管”。接着，穆拉维约夫以“倨傲之态”向爱绅泰宣布：中方必须“照字（指俄方最后修正案）办理，即对换画押文字，彼此为凭。如其不然，我先将左岸满洲屯户遣兵驱逐，不准屯居。”^⑤ 奕山因事关重大，要求派人送往北京，待批准后再签字；俄方担心发生反复，一口拒绝。^⑥ 这样，经过6天的“谈判”，奕山被迫于1858年5月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

为了替自己可耻的卖国行径辩护，奕山于事上奏咸丰帝，对璦琿谈判的前前后后，做了颇为详细的叙述。他说：“该（俄）夷连年举动诡谲，总为意图侵占江左地方，阳为和好，阴怀不轨之心；兹趁英夷侵扰广州机会，深知我国势难两顾，所以其焰愈炽。”“木哩斐岳幅（穆拉维约夫）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下行数十里停泊。木哩斐岳幅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并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6页。

② 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第15页。

③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第354—355页；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第307页。

④ 《吉林通志》，第55卷，第14页；《始末》，咸丰朝，第25卷，第13页；亨利·麦卡维：《中国与阿穆尔州》，载英国《近代史》杂志1964年第6期，第387页。

⑤ 《吉林通志》，第55卷，第14—15页。

⑥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6页。

扬言今夏续有卡尔萨科夫“带领数百人船前来”，公开进行武力威胁。而在清政府方面则“现在南贼（诬指太平军）未靖，军饷支绌，吉林、黑龙江两省兵丁尚未全行撤回。”奕山自知与穆拉维约夫“剖辩分界，本不当迁就了事，均应查照旧例分定为是。”但又说，敌我力量悬殊，“势处万难，若不从权相机办理，换给文字，必致夷酋愤激，立起衅端，势难安抚，实于边疆大有关碍”，“不敢保其将来如何结局”。^①奕山的这份奏文，洗刷不掉他卖国投降的罪责，却记录了穆拉维约夫武力逼签《璦琿条约》的强盗行径。

三 《璦琿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俄《璦琿条约》有满、蒙、俄三种文本。全约共3条，主要内容是：

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②

二、“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③

根据这个条约，沙俄割去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仅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民“永远居住”，归中国政府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原属我国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划为中俄“共管”，而所谓两国“共管”，实际上只不过是沙俄正式吞并这一地区的过渡步骤；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享有航行权，从而夺得了经由黑龙江前往太平洋

① 《黑龙江将军奕山奏与木哩斐岳幅会商两国边界经过情形折》（1858年6月2日，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② 本约中的松花江，指的是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龙江，亦即混同江，并非今天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俄国人关于黑龙江的知识，大部得自中国，因此常袭用中国的旧说，称黑龙江下游为松花江；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璦琿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松花江一名两指的情况，曲解该约第一条的文字，曾不断强行闯入松花江，并屡次向中国提出所谓松花江航行权问题。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85—86页。

的通道；在边境贸易“自由”^①的旗号下，沙俄不仅得以向我国东北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而且还为其派遣特务、刺探情报，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东北内地获得了便利条件。这样，《璦琿条约》彻底毁弃了中俄两国庄严缔结的《尼布楚条约》，使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蒙受了重大的损害，它标志着19世纪中叶后中国北部边疆危机的加深和割地狂潮的开始。随着国际资本竞争的加剧，我国东北逐渐成为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和远东一系列国际争端的温床。

《璦琿条约》的签订，使沙俄统治集团欣喜若狂。5月30日，穆拉维约夫急急忙忙地派专人前往彼得堡报功。亚历山大二世得知穆拉维约夫“不战而胜”地夺得了黑龙江以北地区，喜出望外，特地接见了信使，并且在奏稿上批示道：“谢天谢地！”^②

6月2日，穆拉维约夫为“庆祝”《璦琿条约》的签订，在海兰泡集会，悍然宣布将该地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穆拉维约夫的“积极赞助者”，披着宗教外衣为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奔走效劳的大主教英诺森特别举行感恩祈祷，吹捧穆拉维约夫为俄国“在这辽阔无垠的黑龙江流域”“开辟了远景”，“完成了不朽的业绩”；说什么“即使子孙后代有朝一日将你遗忘……我们东正教教会也会永远把你铭记心上”！^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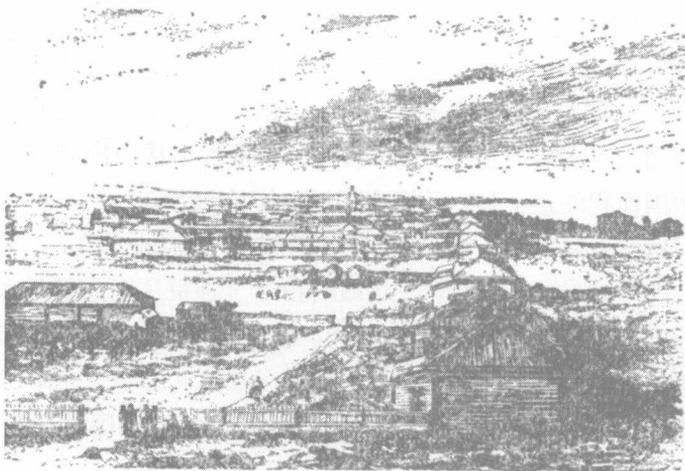
8月19日，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上奏沙皇，赞赏穆拉维约夫等“为俄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吹捧亚历山大二世“在圣朝（指罗曼诺夫王朝）史册中写下了灿烂辉煌的新篇章。”^④为了酬答穆拉维约夫侵华的“勋劳”，沙皇于9月7日破格提拔他为步兵上将，晋封伯爵，赐号“阿穆尔斯基”。

① 《璦琿条约》签订后不久，奕山曾令副都统吉拉明阿向穆拉维约夫递交了一份关于条约各款的说明书，其中包括关于中俄两国居民在黑龙江地区互市的规定，主张指定集中的贸易地点，在政府官员监督下进行交易。穆拉维约夫拒绝上述建议，坚持：“这种贸易只能自由进行，不加任何限制和监督”。俄方以“厚礼”“赠送”吉拉明阿。最后，双方同意“每隔八天轮流在海兰泡和璦琿两地组织一次为期七天的集市，而黑龙江两岸居民可以在黑龙江的任何地方自由贸易。”事见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18—519页。

②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27—128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14页。

④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7页。



沙俄占领下的海兰泡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俄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伊尔库次克、恰克图和赤塔一带的富商巨贾，从《瑷珲条约》看到了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引人入胜”的“新前景”，纷纷悬灯结彩，举行盛宴和宗教仪式，向穆拉维约夫“致敬”，称颂他“征服了黑龙江”。^①

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巴枯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1857年4月至1861年4月）与穆拉维约夫过从甚密。他对穆拉维约夫的逼签《瑷珲条约》也赞颂备至，说什么这是“伟大的爱国事业”。他情不自禁地欢呼：通过《瑷珲条约》，“中国向我们让出了整个黑龙江左岸”；“由于（占领了）黑龙江，斯拉夫的俄罗斯帝国将能在太平洋站稳脚跟”；“由于黑龙江，我们现在能够在太平洋上保有一支巨大的真正的舰队，以代替黑海和波罗的海上的那些‘玩艺儿’！”^② 这些沙文主义的叫嚣，充分暴露了巴枯宁的反动嘴脸。

正当沙俄侵略者兴高采烈地庆祝割取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的时候，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愤怒地谴责了沙俄趁火打劫、掠夺我国土地的强盗行径，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22—523、525—526页；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90页。

^② 斯杰克洛夫：《巴枯宁传》，第1卷，1926年莫斯科出版，第523页。

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又说，英国政府“逼得它（按：指清政府）不得不对俄国做某些本非情愿的让步。”^②同时，恩格斯指出：“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③

一些旧俄学者也承认：俄国利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时机，“采取了旨在获得黑龙江的南进步骤。当时，中国政府由于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和南部边疆的更切身的利益，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被迫签署了新的于己不利的条约：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条约”，“据此，俄国占有了黑龙江的整个左岸。”^④他们承认：在璦琿谈判中，俄方断定清政府“害怕我国联合英国共同反对他们”，因此，“借英国人来进行恫吓，是我国方面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⑤他们还坦白承认：“这个条约使俄国获得了五十多万平方俄里富饶的领土，打开了通往大洋的水路。”^⑥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的许多著作在评述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和中俄《璦琿条约》时，也曾强烈谴责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的罪行，公正地指出，这个条约是沙俄凭借武力强加于中国的。例如，1923年，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说过：《璦琿条约》“是在俄国远征的恐吓下订立的”；穆拉维约夫在“征服”中国黑龙江地区时，使用武力威胁，“迫使对方离开并让出他所要求的一切地方。”^⑦

1926年，《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穆拉维约夫用军队占领了黑龙江岸之后，便迫使中国人签订了璦琿条约。”又说，这个条约“是帝俄为侵占中国领土做出的第一个坚决步骤”。^⑧同年，斯杰克洛夫针对巴枯宁吹捧穆拉维约夫的谬论，援引与巴枯宁同时代的12月党人札瓦利申的话指出，穆拉维

①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5页。

②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页。

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页。

④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移民》，1911年海参崴出版，第16页。

⑤ 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第14页。

⑥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122页。

⑦ 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1923年莫斯科出版，第356页。参见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8页。

⑧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卷，1926年莫斯科出版，第756页。

约夫在黑龙江地区所作所为，绝不是什么“伟大的爱国事业”，而是“一系列欺骗、狡计和暴力”。巴枯宁使用的“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语言”。^①

1928年，罗曼诺夫在《俄国在满洲》一书中写道：“正是由英国开端的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引起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其它许多强国对中华帝国边远地区的一系列侵蚀：一八五八年，俄国侵占了黑龙江。”^②

1936年高尔基等编的《苏联国内战争史》更斩钉截铁地指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从中国夺去了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沿岸地区”。^③

事实胜于雄辩。无数的客观事实证明，《瑷珲条约》是沙俄用武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割地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开创了一个恶例。穆拉维约夫割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行动方式，立即被沙俄作为“极有教益的实例”，概括为一个侵略公式，推广运用于我国其他地方。这个“公式”就是：“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俄国外交上的要求。”^④因此，《瑷珲条约》的订立，不是沙俄侵华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瑷珲条约》的墨迹未干，穆拉维约夫便着手吞并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了。

第六节 普提雅廷的侵略使命和中俄《天津条约》的订立

穆拉维约夫逼签中俄《瑷珲条约》不久，沙俄出使中国的全权代表普提雅廷又勾结英、法联军，趁火打劫，于1858年6月13日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屈辱的中俄《天津条约》。

普提雅廷是一个侵略经验丰富的沙俄外交官、海军上将。1838—1839年曾参加兼并高加索的侵略战争；1842年出使波斯，为沙俄取得贸易、航行等重要权益；1855年他又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的俄日《下田条约》，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口通商，从而受到沙皇赏识，加封伯爵；1856—1857年任驻英、法两国海军武官。

对于侵略中国，普提雅廷向来野心勃勃。早在1843年，他就曾建议沙皇政府派遣远征队，勘察和伺机占领黑龙江口；但沙皇政府担心此举会影响

① 斯杰克洛夫：《巴枯宁传》，第1卷，第517页。

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1928年列宁格勒出版，第7页。

③ 高尔基等编：《苏联国内战争史》，第1卷，1936年莫斯科出版，第58页。

④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彼得堡出版，第250页。

恰克图贸易，没有采纳他的建议。1853年，普提雅廷乘“巴拉达”号战舰出使日本，曾到广州、上海活动，企图取得与英国相同的五口通商特权。^① 1854年夏，他竟无视我国领土主权，公然窜到庙街等地，与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依密谋侵占黑龙江。1855年普提雅廷同日本订立《下田条约》后，又闯入黑龙江下游活动，并改乘内河轮船溯江而上，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回国后，他上书海军大将康士坦丁亲王，竭力主张增拨经费，以扩大对黑龙江地区的武装殖民活动。1856年底，普提雅廷在伦敦获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连忙向康士坦丁报告。1857年1月，康士坦丁致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主张赶在英、法之前派使节前往北京，“以彻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并推荐普提雅廷充任此职，“因为他在日本显露过自己的才干，签订了一个对我国（俄国）有利的条约。”^② 同年2月，沙皇政府宣布任命普提雅廷为使华全权代表。

普提雅廷的具体使命，是向清政府勒索其他列强取得的各种侵略权益，“同时了结在黑龙江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③ 首先是要求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承认俄国有权在黑龙江自由航行。按照沙皇的命令，普提雅廷把他出使中国的具体目的及时通知了穆拉维约夫。穆拉维约夫表示愿以武力为后盾，积极支持这次“外交上的远征”。^④

普提雅廷动身来华前，沙俄外交部照会清朝理藩院，以威胁的语调说：“现因贵国内地不靖，外寇侵扰广州。……敝国君特遣亲信大臣普提雅廷为使，令其权宜办理两国交涉一切事件，用昭我国相交之道。其所派使臣，谅贵院亦无不愿之理。如迟疑不从美意，必致别生事端。”^⑤ 同时，沙皇政府又指令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以提供“援助”为饵，劝清政府允许普提雅廷进京。接着，普提雅廷不等收到清政府的复文，于1857年3月5日由彼得堡出发，从陆路前往恰克图。北京俄国东正教会训练的“中国通”——教士阿瓦库姆（又名安文公）和“医生”塔塔里诺夫（又名明常）充任使团的译员。此外，随行人员还有一等秘书毕休罗夫、二等秘书冯·奥斯登·萨根、炮兵上尉巴

①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6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83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1902年旅顺出版，第1页。这里所谓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即中俄西段边界问题。详见本书第三卷。

④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86、490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8—9页。

留捷克和工兵上尉瓦托夫斯基等人。

4月2日，普提雅廷到达伊尔库次克，和穆拉维约夫进行多次密谋，10日动身赴恰克图。离伊尔库次克前，普提雅廷曾派塔塔里诺夫赴库伦投递公文，内称：“英吉利勾结佛（法）夷，由东海前赴天津，侵占地界；我两国均有妨碍，应如何办理，是以派委使臣，会同在京之王大臣等商酌。”^① 库伦办事大臣据以上报。26日咸丰帝颁发谕旨说：“俄罗斯狡猾性成，所称英人纠约各国，欲往天津，伊欲来京密商等语，无非借端恐吓，欲于黑龙江外占据地方”，并指示库伦办事大臣，如俄使前来，“该大臣即当据理拦阻，告以已奉谕旨，不敢专擅，劝其回国。”同时，咸丰帝命令吉林、黑龙江两将军，如普提雅廷要求经东北入京，也应据理阻止。^② 库伦办事大臣遵照咸丰帝的命令，拒绝让普提雅廷经过蒙古去北京。清朝理藩院也复照沙俄政府，拒绝俄国派遣使臣来华的要求。照会中明确指出，中国“并无机密要事应与贵国商办，毋庸特派大臣来京。”至于说到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可以自行处理，“贵国可免悬念”；英、法窥伺中国，“中国自行御侮，不借外国帮助之力。”^③ 普提雅廷不等清政府答复，又行文理藩院和库伦办事大臣，强要经蒙古前往北京，并声明如在5月底以前接不到回文，即改经中国东北进入北京。^④ 清政府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由库伦办事大臣回文驳复。^⑤ 普提雅廷在恰克图遇阻后，便决定按照外交部原定方案，强行取道中国东北前往北京；同时急电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建议攻占中国的瑷珲城。”^⑥ 哥尔查科夫担心此举会招致其他列强的反对，从而使俄国“陷入非常不愉快的甚至困难的处境”，因此没有同意。^⑦

5月28日，普提雅廷与穆拉维约夫一道离恰克图，在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野战炮营护送下向东进发。临行之际，他再次行文理藩院威胁说，若是中国东北也不让行走，他将乘船出黑龙江口，由海路径赴天津。若清政府仍然拒

①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11页。

② 《清文宗实录》，第223卷，第2—4、13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17—18页。

④ 同上书，第15卷，第22页；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1968年吉隆坡出版，第75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23页。

⑥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94页。

⑦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4页。

绝，一切后果将由中国方面承担。

6月17日，普提雅廷和穆拉维约夫率俄军到达瑗珲江面，派阿瓦库姆等入城会见瑗珲副都统魁福，要求准普提雅廷一行“由满洲地方行走”。魁福根据清政府的指示予以拒绝，于是普提雅廷强行继续下驶，并由穆拉维约夫带炮艇两艘护送了一段路程。^① 到达黑龙江口时，普提雅廷借口英、美两国企图染指库页岛的煤矿，竟派遣鲁达诺夫斯基中尉带领15人赴该岛南部强行建立新哨所（位于北纬48°）。7月13日，普提雅廷在庙街登上“亚美利加”号轮船，向南直驶天津。

清政府知普提雅廷此行必有诡谋，命令署直隶总督谭廷襄，如普提雅廷到天津投书，应婉言拒绝。^②

8月5日，普提雅廷到达白河口外。他违反两国通过库伦办事大臣递送公文的规定，硬要在天津投递公文，请求入京，地方官奉命拒绝接受。但是，在这前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为专使，率领舰队东来，已于7月初到达香港。法国专使葛罗也即将率军来华。英、法联军正在酝酿夺取广州。面对着这个局面，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担心，如果对普提雅廷拒之过严，俄国可能与英、法公开勾结，则将更难对付，因此，准备在天津接待普提雅廷，并指派查河大臣文谦，会同长芦盐政乌勒洪额、直隶布政使钱忻和相机办理。文谦等即亲赴“亚美利加”号会见普提雅廷，告以此行虽属违例，但念两国“和好”，如果投文后立即启碇回航，赴恰克图或黑龙江听候回音，尚可接受。普提雅廷硬要在天津等候答复，反复辩论，相持不下。最后，清政府被迫退让，只要求普提雅廷投文后暂离天津，允许他在约定的时间内仍至天津听候回音。普提雅廷表示同意，8月24日将照会交付钱忻和转递，次日启碇出口，前往上海，住在美商旗昌洋行。照会的中心内容是要解决所谓的黑龙江“未定界址”问题，即重新划分两国东段边界，并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一面表示俄国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面恫吓清政府说，如果不满足俄国的要求，则于中国“诸多有碍”。^③ 清朝理藩院当即致文俄国枢密院，驳斥普提雅廷的无理要求说，根据《尼布楚条约》，中国东界以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为界，“当时立定界牌，永垂不朽，无可

① 《始末》，咸丰朝，第15卷，第32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496页。

② 同上书，第15卷，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16卷，第12—14页。

商议”，只有乌第河一处未曾划定，“尚可会查分界。”^①为此，清政府建议普提雅廷前往黑龙江，会同黑龙江将军奕山“将乌特河（乌第河）一处地方酌量勘定”，^②并指示奕山前往璦琿等候。

9月14日，普提雅廷乘船返回天津附近海面，天津地方官员将一件与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咨文内容相同的复文交给普提雅廷。普提雅廷拆阅后，知道待在天津无益，遂决定南下，于9月17日驶往日本，10月24日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俄日《长崎条约》。10月底，普提雅廷从长崎驶抵上海，同英国领事罗伯逊密谈很久，极力鼓吹俄、英合作侵华。他还从上海给康士坦丁亲王寄去一份报告，公然主张贿赂清朝官员，厚颜无耻地说：如果俄国政府拨款300万—500万卢布用以行贿，则此次出使必能获得完全成功。^③

11月中旬，普提雅廷从上海赶到香港，分别会见了先已到达该地的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和美国公使列卫廉，共商侵华大计。从此，英、法、俄、美四国的侵华联合战线正式形成。普提雅廷向英、法侵略者献策说：“除非对北京本身施加压力，和中国政府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同时，利用吃水浅、可以航行白河的舰只，会是使这种压力收效的最好办法。”^④特别对美使列卫廉，普提雅廷更是百般拉拢，过从甚密。列卫廉热烈称赞普提雅廷“骨子里是半个美国人”，并承认他们之间“在一切共同关心的事情上有过最坦率的交谈”。^⑤

普提雅廷勾结西方列强，完全是按照沙皇政府的意图行事的。早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伦敦、巴黎、彼得堡和华盛顿之间就为四国联合侵华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英、法方面，这是为了在列强之间取得协调，以便放手侵略，给清政府造成更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在俄、美方面，这是为了趁火打劫，便于将来分沾英、法可能得到的一切利益。首先表示愿意与英、法合作的是沙俄。1857年1月11日，沙俄政府获悉英、法准备向中国进军，就急忙指示驻法公使基谢列夫拜会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探询是

① 《始末》，咸丰朝，第16卷，第26—28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03页。

④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1859年伦敦出版，第54页。

⑤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91页。

否允许俄国参加英、法联军。^① 俄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反对正式参加联军，主张伪装中立，保持行动自由，认为这样对俄国更加有利。^② 沙俄政府经过缜密考虑，采纳了这一意见。同年五六月间，英、法两国分别正式邀请俄国参加对华交涉。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于6月13日命令基谢列夫通知法国外交部，俄国不拟公开对中国宣战，但对于“有关欧洲共同利益”的要求，愿意与英、法携手合作。^③ 同时，他训令普提雅廷，可以在“道义上”“与西方列强一起采取共同合作的行动”，“对额尔金勋爵提出的、与所有文明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关的要求”，可以“给予您力所能及的协助”。^④ 至于普提雅廷使华的主要目的，俄国政府始终对英、法秘而不宣。这一切表明，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既要同英、法紧密勾结，又想在中国面前装作与英、法有别，以便招摇撞骗；既要联合行动，与英、法坐地分赃，又想竭力防止第三国插手它的领土掠夺计划，以便实现其独吞中国大片土地的野心。这正是当时沙俄侵华政策的突出特点。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29日广州沦陷。同一天，普提雅廷致电哥尔查科夫说，俄国必须“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才能迫使清政府屈服。他认为“最有效的措施是封锁白河口，禁止中国帆船驶入，直至北京派出全权大臣赴直隶湾同我谈判，确认赠予俄国的地界并给予我国同其他国家相等的特权。”他断言俄国只要派出一中队船舰，就可以完成对白河口的封锁，从而切断北京的粮源。他还叫嚣：“一旦联军将战事北移，我们便应及时建议法英和我海军于此海域配合行动，以达到共同的和只涉及俄国一国的目的。”^⑤ 总之，普提雅廷竭力主张俄国正式参加英、法联军，对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沙俄政府接电后立即开会研究。由于担心公开对华作战会使俄国丧失陆路通商和“传教”的重大利益，会议决定一方面扩大对黑龙江左岸地区的武装占领，一面仍不抛弃“中立”的面具，继续保持同清政府的“和平关系”，并授权穆拉维约夫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改任普提雅廷为太平洋

① 《英国外交部文书》，27/1187，1188：英国驻法公使考莱致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函。转引自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65页。

②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8—189页。

③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1905年巴黎出版，第169页。

④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1、193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03—504页。

分舰队司令兼钦派大臣，继续留在中国，参与英、法同中国的“谈判”，从中上下其手，“分享中国人可能给予其他列强的各种权利”，并注意“不让上述列强中的任何一个在条约中获得占有或暂时占领我们（俄国）打算得到的地方的权利；如果中国的河流准许它们自由通航，则黑龙江不要包括在内。”^①

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决定趁势北上迫订不平等条约。额尔金事先曾就这一北侵计划同普提雅廷密商，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② 2月4日，额尔金、葛罗函请普提雅廷和列卫廉向清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要求派遣全权代表到上海谈判公使进京、增开口岸、内地传教等问题。普提雅廷立即复函支持，表示愿和英、法、美三国“一致行动”，^③ 并主动地将沙俄照会的英文本送请额尔金、葛罗和列卫廉“教正”，借以联络感情，表明心迹。^④ 但是，在照会发出之前，普提雅廷又偷偷地塞进一个“附件”，公然要求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要求“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⑤ 这些恶毒的领土要求，普提雅廷一字也不曾向英、法、美三国专使透露。^⑥

英、法、俄、美四国使臣密谋后，立即派人携带照会北上，于1858年2月26日在苏州交江苏巡抚赵德辙转递，指定清政府必须在3月底以前派遣全权代表到上海谈判，否则就要扩大战争。

上述照会发出不久，四国使臣先后离开香港、澳门前往上海。行前，普提雅廷极力煽动英、法侵略军从速北上，进攻大沽口，用武力逼迫清政府屈服。他说：“在直隶湾（渤海湾）沿岸作战的最好月份是四五月，这两个月天气大多晴朗，热度尚能忍受”，6月份很热，7月初以后雨季要持续6至7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115页；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5—196页。

② 俄理范：《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纪实（1857—1859）》，第1卷，1860年伦敦出版，第178页。

③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第280—281页；《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通信》，第186—187页。

④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4卷，1973年美国出版，第372、379页；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97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8卷，第33页。

⑥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98页。

周，“低平的地面几乎不能通行”，^①不利于英、法作战。

咸丰帝获悉四国照会后，十分愤懑，即于3月间令理藩院就普提雅廷违反旧约径往上海事向沙俄枢密院提出抗议，命两江总督何桂清分别照会四国公使，要求英、法、美三使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交涉；俄国和五口通商向无关系，俄使应去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交涉。^②

清政府的答复自然不能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形势急剧恶化。普提雅廷为了乘机大捞一把，3月29日于上海致函额尔金，宣布“帝国政府亟盼目前在中国的纠纷达到愉快而满意的结果，并且命令我对各国全权专使可能向北京朝廷提出的一切代表共同利益的要求，给予道义上的支持。”^③并再次强调，5月底以前是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好季节。^④在他的唆使下，英、法侵略者决定立即北上。

4月7日，普提雅廷从上海匆匆北上，企图抢在英、法、美前面与清政府进行交涉。接着，英、法、美使陆续北上。清政府见四国结成一气，急忙寻求对策。4月8日咸丰帝颁发谕旨说：“如先解散俄美两酋，不至助逆，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⑤就是说，为了“靖中原”，就不惜对侵略者实行“怀柔”。这一投降主义政策，使沙俄获得了伪装“调人”从中渔利的机会。

普提雅廷到达天津的次日，清政府从上述动机出发，立即派天津地方官员两名到“亚美利加”号接洽，但普提雅廷认为对清政府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尚不足以迫使清政府满足他的侵略要求，借口这些官员职位过低，拒绝接见。4月14日，额尔金抵白河口外，准备俟英国炮舰到达后即闯入白河。普提雅廷当即召见额尔金，表示他将“乐于”随英舰进入白河，并怂恿说：这一行动不会遇到中国人的抵抗。^⑥

①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4卷，第398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18卷，第33—35页；第19卷，第5页；《清文宗实录》，第245卷，第19—21页。

③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第254页。

④ 同上书，第258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19卷，第23页。

⑥ 《英国外交部文书》，17/288，额尔金致马姆斯伯里函（1858年5月19日）。转引自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105页。

4月18日，长芦盐政乌勒洪额派员会见普提雅廷。普提雅廷声称他已奉沙皇之命进京谈判，并提出致清政府的照会一件，威胁说，如不允所请，“必定日后后悔不及。”^①随后，在会见新任交涉事宜的仓场侍郎崇纶等人时，普提雅廷再次提出进京谈判的要求。^②英、法则借口崇纶等官职太小，没有全权，于24日照会清政府，要求另派全权代表，并以6日为限。26日，清政府被迫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交涉。

4月29日，普提雅廷见面谭廷襄，提出照会一件，要求俄国在通商口岸享有与英、法同等的权力，扬言不管准与不准，俄船都要进入这些口岸。照会还胡说什么将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让给俄国，俄国就不致窥伺，对中国不但无害，反而有利。如中国答应俄国要求，俄国愿意出银10万两供中国居民自黑龙江北岸迁移到南岸之用，并愿向中国提供枪械，派员教练，帮助清政府“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照会后面还附有两项条款，要求照此订立新约：

(一) 两国东界，“顺黑龙江直达乌苏里（江）口，复至乌苏里（江）上游河源，自乌苏里江附近之绥芬河源起，顺河至海”；两国西界，“沙毕奈岭（沙宾达巴哈）以西，直至伊犁”，均应“详细议定”。

(二) 均沾各国对华通商的利益。^③

这就是说，沙俄不仅要攫取与他国相等的种种侵略特权，还要强割我国东北和西部大片疆土。这一切，据说都不算侵略，而是纯粹为中国的利益着想。

在沙俄向清政府提出一连串侵略要求的同时，英、法侵略者一步步地把清政府逼到墙角。他们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全权，悍然拒绝原已约定的会谈，并加紧在渤海湾集结兵力。5月1日，英、法公使发出照会，强硬要求清政府迅速发给谭廷襄全权证书，否则“必贻后灾”。^④普提雅廷也趁机于5月6日照会谭廷襄，要求接受沙俄4月29日提出的条件，限4日内答复。^⑤日，普提雅廷写信给额尔金和葛罗煽动说：“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没有坚定

① 《始末》，咸丰朝，第20卷，第15—16页。

② 同上书，第20卷，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21卷，第5—7页。

④ 同上书，第21卷，第30—31页。

⑤ 同上书，第21卷，第29—30页。

和恐吓，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① 尽管普提雅廷浑水摸鱼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谭廷襄也认识到沙俄实与英、法“联络为一”，英、法“阳示其恶”，俄、美“阴济其奸”，沙俄“所云愿为帮助说合，断不可靠”，^② 但是，软弱的清政府在疑惧之余，仍存侥幸心理，幻想普提雅廷“肯为我用”，从中“调停”。为此，清政府表示可对沙俄的某些要求让步，允其在五口通商，“与各国一体贸易”。^③ 但普提雅廷仍然坚持要清政府接受他的全部条件，并利用清政府想用他充当“调人”的急迫心理，故意自抬身价，于5月10日宣称，如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国之事，从此不能再管”，假装拒绝“调停”，进而又“借英法以便其私，挟制危词，一日数至”。^④ 清政府依旧坚持，关于黑龙江的事，沙俄应派员去黑龙江办理。最后，普提雅廷同意“将两国边界之事，传知总理东边西伯利亚总督各省大臣”穆拉维约夫，会同中国官员办理。^⑤

这时，沙俄驻北京东正教会头子巴拉第出面大肆活动。4月下旬，普提雅廷要求清政府准许巴拉第到渤海湾与他会面。5月4日，巴拉第动身赴大沽，7日在白河口的俄船上向普提雅廷报告了大沽设防等情况。^⑥ 普提雅廷立即让巴拉第向英军将领西马糜各厘提供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北京非常缺粮；皇帝打算逃跑；京、津之间约部署了1万军队；白河有几处地方用木船和铁链阻拦，等等。^⑦ 普提雅廷还叫巴拉第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人不听“忠告”，4天内不给他答复，他就要从彼得堡调战舰来“揍他们”。^⑧ 5月9日，巴拉第将普提雅廷的警告转达清政府，随后又多次施加压力，企图逼迫清政府屈服，未有结果。

普提雅廷讹诈未遂，决心进一步借助于英、法的炮舰。5月17日，他获

①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第352页；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4卷，第498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21卷，第9—10页；第22卷，第7页。

③ 同上书，第21卷，第40页。

④ 同上书，第21卷，第49页；第22卷，第14页。

⑤ 《普提雅廷致谭廷襄照会》（1858年5月11日）。

⑥ 巴拉第：《1858年北京日记摘抄》。转引自威德默《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和中国的夷务》，载美国哈佛大学《有关中国论文集》1965年第19号。

⑦ 西马糜各厘致额尔金函（1858年5月14日），参见《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事务的通信（1858. 4—5）》，1860年2月伦敦出版，第23页；莫日侯爵：《1857—1858年葛罗男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回忆》，1860年巴黎、伦敦出版，第207—208页。

⑧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115页。

悉清政府拒绝接受英、法要求，连忙密告额尔金和葛罗，并致函列卫廉说，清政府的态度使英、法联军有了“行动自由”，要对北京朝廷产生“有效的影晌”，就必须攻打大沽。^①

5月18日，英、法联军头目集议，决定于20日进攻大沽炮台，然后进兵天津。普提雅廷获悉后立即向额尔金保证，一俟联军上溯白河，俄舰即随同前往，并给予英、法“道义上的全力支持”。^②

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侵略军给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清政府不予理会。10时，英、法侵略军向大沽发动进攻。俄、美两国船舰也驶入白河为英、法助威。中国守军英勇抵抗，但由于清政府备战不力，主持军事的大员又率先逃亡，炮台旋即失守。侵略军溯白河而上，直抵天津城下。

大沽炮台陷落，北京震动。谭廷襄惊慌失措，一心求和，多次请普提雅廷居间“调停”。普提雅廷一面伪装“公正的和事佬”，一面继续借英、法的魔影吓唬清政府，口是心非，上下其手，以便为沙俄掠取最大的好处。他照会清政府说，必须同意四国公使赴津谈判，并进京晋见皇帝；否则西方列强就要“强行闯入北京”。^③

5月26日，英、法侵略者通知清政府即派头品全权大臣二员来津谈判，否则仍欲进京，并毁灭天津。照会限2日答复。^④普提雅廷乘机火上加油，写信给葛罗说，只有“施以强大的压力和采取突然行动”，才能迫使中国人让步。^⑤他还写信给列卫廉，抱怨英、法全权代表迟迟不前往天津，并要求列卫廉劝说他们“不要丧失时机”，“这样对各国都有好处”。^⑥

5月28日，清政府在英、法的武力压迫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往天津议和。普提雅廷与英、法、美一起照会清政府，要求授予桂良、花沙纳以议和全权，否则就要以武力进入北京。

①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5卷，第8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第309页。

③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5卷，第27页。

④ 《始末》，咸丰朝，第23卷，第6页。

⑤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第378页。

⑥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5卷，第29页。

5月30日，额尔金、葛罗乘炮舰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卫廉乘俄船“亚美利加”号同至。

6月6日，普提雅廷与桂良、花沙纳举行正式会谈，同时单独会见谭廷襄。他利用清政府担心英、法攻打京、津的心理进行敲诈勒索，表示如速按俄国条款定义，即可代向英、法“说合”。清政府经不起普提雅廷的诱骗，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无耻条件。

1858年6月13日，沙俄捷足先登，抢在英、法、美前面，^①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全约共12条，内容如下：

(一) 沿海七口通商。条约规定除两国旧有的陆路通商地点外，增开7个通商口岸，即：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俄国兵船有权在各口岸停泊。（第三、第五条）

(二) 扩大陆路通商。条约规定：“嗣后陆路前定通商处所，商人数目及所带货物并本银多寡，不必示以限制。”（第四条）

(三) 片面设领与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俄国在中国通商海口设立领事官。”俄国人若与中国人发生纠葛或其他事故，应由中俄两国官员“会同办理”。在华俄国人犯罪，按俄国法律受审。（第五、第七条）

(四) 内地传教权。准许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中国方面不得“禁其传习”。（第八条）

(五) 片面最惠国待遇。今后凡中国给予别国的一切政治、贸易及其他权益，“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第十二条）

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还特别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当时，沙俄继逼签《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地区之后，正加紧侵吞乌苏里江以东和我国西部的大片领土，《天津条约》第九条，为沙俄进一步掠夺我国领土埋下了伏笔。这里所谓的“秉公查勘”边界，实际上就是肆意侵吞我国领土的同义语。当时恩格斯就尖锐地指出：俄国“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

^① 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1858年6月18日、6月26日和6月27日订立。

一块地割去”。^① 事实正如恩格斯预见的那样，1858年以后，每签一项条约，每勘一次边界，沙俄就把中国的领土割去一大块。

中俄《天津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勾结英、法联军，对清政府威胁利诱，敲诈勒索，掠取到比英、法、美更多的侵略权益。这个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沙俄侵略分子维纽科夫曾说：中俄《天津条约》“是我国（俄国）外交此后一切巨大成就的基础”；“单是该约的第十二条即最后一条，就为我们取得了中国可能给予外国人的一切政治的、贸易的和其他的权利与特权。”^②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过程有力地证明，英、法、俄、美是一伙“诡计多端、合而图我”^③ 的侵略强盗，连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世界通史》也承认，中俄《天津条约》“证明沙皇政府是伙同英、法、美三国在中国实行侵略政策的。”^④ 英、法侵略者的炮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替沙俄开辟侵略道路的破冰船。普提雅廷在条约签订后分别给额尔金和葛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供称：沙俄这次获得“如此满意和迅速的成果，全赖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巨大恩惠”，“正是这两个同盟国军事上的胜利”，迫使清政府最终接受了沙俄的要求。^⑤

另一方面，英、法、美在逼签《天津条约》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沙俄的大力帮助。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从头到尾都是侮辱”的中英《天津条约》，乃是“在彼得堡当局同意下制定出来”的，^⑥ 深刻揭露了沙俄所起的罪恶作用。

普提雅廷自1857年来华后，一直和英、法、美通力合作，为他们出谋划策，提供情报；在天津谈判期间，普提雅廷又以“调人”身份大肆活动，逼迫清政府接受列强的各项要求。为此，英、法、美侵略者对普提雅廷十分感激。6月16日，法使葛罗写信给普提雅廷致谢说，“两个同盟国的军队如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

② 维纽科夫：《俄国亚洲边区旅行记》，1868年彼得堡出版，第325—326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22卷，第20页。

④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6卷，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429页。

⑤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第332页；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第411—413页；李文沃斯：《亚罗战争》，1901年伦敦出版，第107—109页。

⑥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此顺利地取得胜利，应当归功于俄国。”^① 6月17日，英使额尔金也致函普提雅廷，对他“在共同执行困难任务中”给予的“明智的合作”，表示“感谢”。^② 沙俄的所谓助华防英论，不攻自破。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普提雅廷向清政府表示，沙俄愿“为中华出力”，“赠送”火枪1万杆、炮50尊，并派军官来华“帮助”教练作战，修筑炮台，勘探金银矿藏，“代为制备一切”。^③ 他鬼话连篇地说，俄国此举是为了使中国的防务“得收实效”。^④ 清政府原拟拒绝接受军事教官，只接受俄国武器。但普提雅廷硬要“帮助”，清政府最后还是屈从了他的侵略要求。

1858年7月11日，普提雅廷乘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前往日本；8月19日，与日本订立了不平等的《江户条约》^⑤，同月下旬离日返俄。回国后，他向外交部建议尽快派公使去中国进行新的敲诈勒索，并采取下列措施：^⑥

- (一) 赠送已经允诺的枪炮给清政府；
- (二) 派五名军官去训练中国军队；
- (三) 向太平洋派出小吨位的舰艇，以便进入中国内海。

上述建议得到了沙俄政府的批准。

普提雅廷的使命完成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却远远没有结束。

①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第413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第333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25卷，第39页；第27卷，第5页。

④ 同上书，第27卷，第23页。

⑤ 日俄《江户条约》的内容与中俄《天津条约》十分相似，主要是：(1) 增开神奈川、兵庫等口岸通商；(2) 俄国人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3) 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

⑥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5—7页。

第三章

沙俄武力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和迫订中俄《北京条约》

第一节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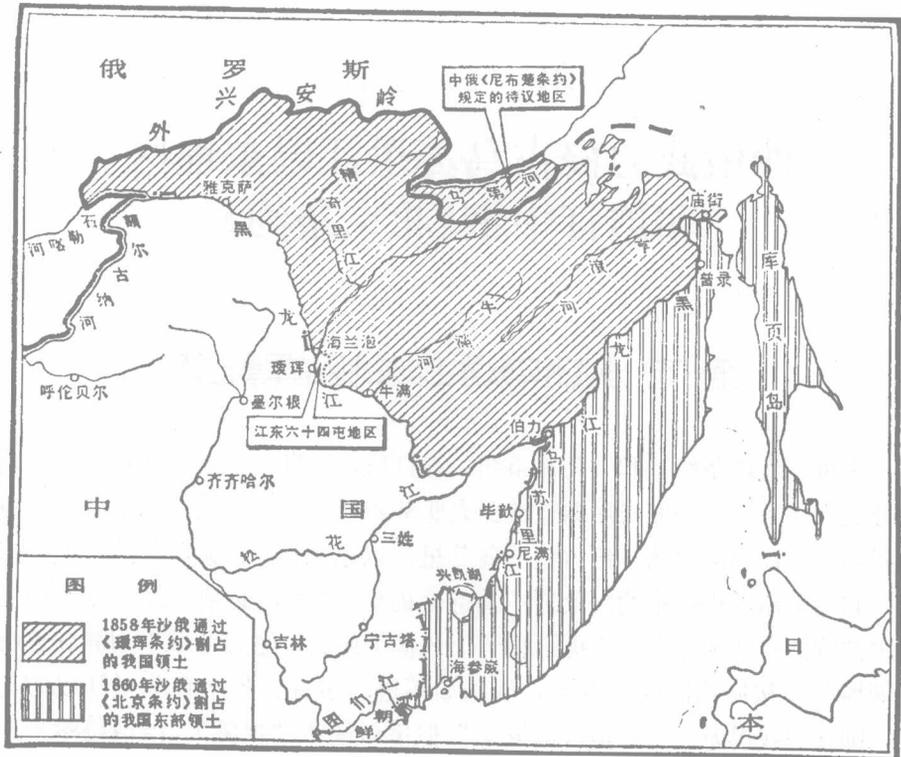
中俄《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后，沙皇政府继续使用武力侵略和外交讹诈手段，一面先后派遣彼罗夫斯基和伊格纳切夫到北京逼签新的割地条约，一面出动军队，抢占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瑷珲条约》墨迹未干，它的炮制者穆拉维约夫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必须立即控制我国同中国共管的一切地方”，^①“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在哪里划界就在哪里划界”！^②按照他的强盗逻辑，俄国如不进一步吞并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则它“在黑龙江占领地区的安全”似乎就缺少“保障”。沙俄侵略者还公然声称：“为使乌苏里江和乌苏里地区永归俄国，必须在乌苏里江采取占领黑龙江时所使用过的手法，即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③往后的历史进程证明，1858—1860年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手法，同侵占黑龙江以北地区如出一辙。

《瑷珲条约》签订以前，沙俄的侵略魔爪已经开始伸到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北部沿海和库页岛一带。不过，当时入侵者的人数还不多，占地还不广，在这个地区的南半部，还看不到俄国人的足迹。《瑷珲条约》订立后，

① 穆拉维约夫：《呈康士坦丁亲王殿下的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77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97—598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544页。



沙俄通过中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割占我国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示意图

沙俄侵略者开始向乌苏里江以东大举扩张，积极推行武装殖民，不断扩大对这一地区的非法占领。

《瑗珲条约》刚刚签订，穆拉维约夫即在东正教大主教英诺森陪同下，于1858年6月3日率领大批人船顺黑龙江下驶，以便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瑗珲条约》带来的好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广为移民”。^① 航行期间，穆拉维约夫指示他的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到处为沙俄军队选择屯营地。由于后者的积极活动，当年便在黑龙江北岸新建了32个军人村屯。6月12日，穆拉维约夫等驶抵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处的伯力，擅自将该地命名为哈巴罗夫卡^②，以纪念17世纪中叶武装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臭名昭著的沙俄殖民强盗哈巴罗夫。同时，穆拉维约夫还下令在乌苏里江东岸图勒密地方建筑炮台，架设要塞炮4门，并指定哥萨克军第十三边防营在伯力屯守，“以加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哥萨克防线”。^③ 这样，沙俄侵略者就将我国伯力地方完全变成了他们向乌苏里江流域推行武力扩张的前沿堡垒。



沙俄占领下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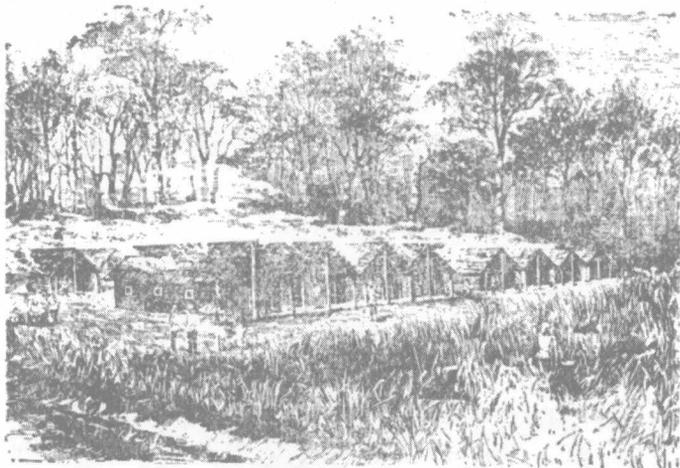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15页。

② 1893年，哈巴罗夫卡改称哈巴罗夫斯克。

③ 穆拉维约夫：《呈康士坦丁亲王殿下的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77页。

6月13日，穆拉维约夫等悍然驶入乌苏里江，擅自测量、绘图，用望远镜“四处瞭望”，观察山川形势，然后折回江口。^①15日，穆拉维约夫又派布多戈斯基率领“勘察队”溯乌苏里江上驶，“前去选择明年（1859年）屯驻一整营哥萨克的地点。”^②穆拉维约夫夫人率众顺黑龙江下驶，直抵庙街，然后又溯江而上，7月6日到达扎依（位于黑龙江右岸，在阔吞屯往上37公里处）。他选定该地为哥萨克屯营地，亲自参加当地“圣索菲亚”教堂的奠基典礼，并下令立即铺设从该地通往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的道路，为沙俄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北部的重要侵略据点索菲斯克城奠定了基础。



沙俄侵略军在伯力附近强建的营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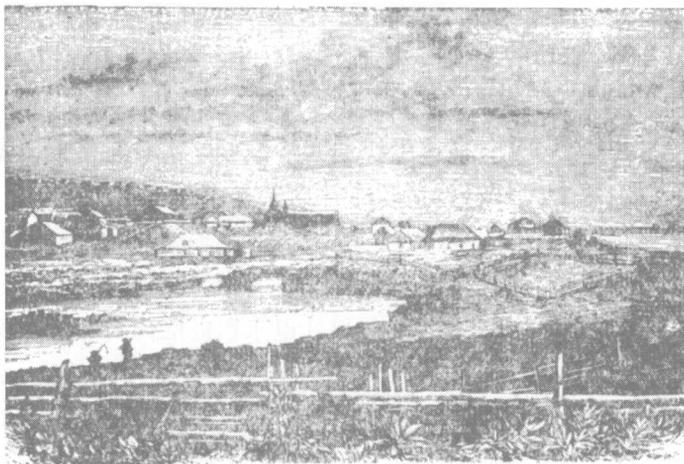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7月14日，穆拉维约夫等更进一步乘兵船强行闯入松花江。中国地方官出面阻止，穆拉维约夫气势汹汹地说：“汝能若始终拦阻，则将来英、美、法人复来入口，试看让与不让”，并要求到三姓等处贸易，随即溯江西上六十余里，测绘两岸地形。^③这一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动，为日后沙俄在松花江上行船开创了恶例。

① 《始末》，咸丰朝，第30卷，第1页。

② 穆拉维约夫：《呈康士坦丁亲王殿下的报告》。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77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30卷，第2页。



沙俄占领下的扎依（索菲斯克）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为了全面地抢占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穆拉维约夫从 1858 年便不断将大批哥萨克军队派往乌苏里江右岸，陆续强建了卡尔萨科夫村、卡札凯维奇村、涅维尔斯科依村等军人村屯。^① 同时，他还着手计划派海军侵占乌苏里地区南部的重要海港，并要求沙皇政府批准架设“沿乌苏里江直到将驻扎我国（俄国）海军主力并全年通航的日本海港口”的电报线。^② 在庫页島上，穆拉维约夫也增加了兵力。

由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沙俄侵略军数目激增，1858 年 12 月经沙皇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阿穆尔哥萨克军”。据不完全统计，1858 年底屯驻黑龙江北岸的哥萨克步、骑兵共有 4486 人；屯驻乌苏里江东岸的哥萨克有两个“乌苏里步兵营”，每营 5 个连，共为 3290 人。总计，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哥萨克兵，截至 1858 年底共有 7776 人，连同家属在内达 2 万人之多。除这支庞大的哥萨克军队之外，当时沙俄政府还在上述地区配置了 3 个

^①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3 卷，第 133 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1 卷，第 559 页。

^② 穆拉维约夫：《致亚洲司司长》。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2 卷，第 216 页。

正规的步兵边防营，每营兵员从 600—1000 人不等。^①

在增派大批占领军的同时，穆拉维约夫还千方百计地动员俄国农民移居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并在 1858 年制定《移民条例》草案，给予移入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俄国农业人口以种种优惠待遇；其中第二十四条特别规定：凡迁入这一地区的乡村居民，“可在二十年内无偿使用拨给他们的土地”，“同时永远免除在原籍应缴纳的一切赋税和应履行的义务，而历年所欠税款，均予以豁免。”^② 在沙俄殖民当局鼓励下，非法迁往我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俄罗斯农民日渐增多。

1859 年，穆拉维约夫继续在乌苏里江以东积极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尽管由于“外贝加尔省歉收，再加上没有浅水汽轮，难以将大批移民运往乌苏里江上游地区”，^③ 但这一年中仍有大批沙俄军队和移民来到乌苏里江以东，擅自建立了布谢村、上米哈依洛夫村、下米哈依洛夫村、伯爵村、亲王村等 20 座新村镇。^④ 据吉林将军特普钦报告，仅在 1859 年六七月间，即有沙俄武装“移民”若干批强行闯入乌苏里江；其中最大的一批多达 342 人，“乘船四十四只，携带吃食器械，由图勒密驶入乌苏里江上行。”他们擅自在乌苏里江东岸建立许多居民点，“相距三四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每处建房并搭盖草窝棚三五所至十余所，各居夷人男妇幼稚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不等，放牧牛马，开园垦地，各有鸟枪、农具、船只”，蓄谋久踞。^⑤ 穆拉维约夫在 10 月底奏报沙皇说：“我们的哨所和兵屯已从陆路设到兴凯湖”，并准备继续从乌苏里江上游一直设到朝鲜边界。^⑥ 这就是说，至晚在 1859 年秋季，沙俄侵略者已将沿乌苏里江东岸一带置于他们的军事占领之下。

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开始采取行动，抢占乌苏里江地区南部的重要港湾。1859 年 6 月中旬，他亲自乘军舰从庙街来到克默尔湾，“然后巡视了果尔涅特角（穆拉维约夫命名为波沃罗特内角）与图们江口（满洲与朝鲜的边界）之间的海岸。穆拉维约夫将此一百二十海里的海湾命名为大彼得湾。”^⑦ 他命令俄国船只在该湾西南的波谢特湾过冬，并在岸上修筑炮台，实行武装占领。

①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 146 页。

②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2 卷，第 194 页。

③ 同上书，第 1 卷，第 539 页。

④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 3 卷，第 140 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 40 卷，第 6—9 页。

⑥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2 卷，第 279 页。

⑦ 同上书，第 1 卷，第 55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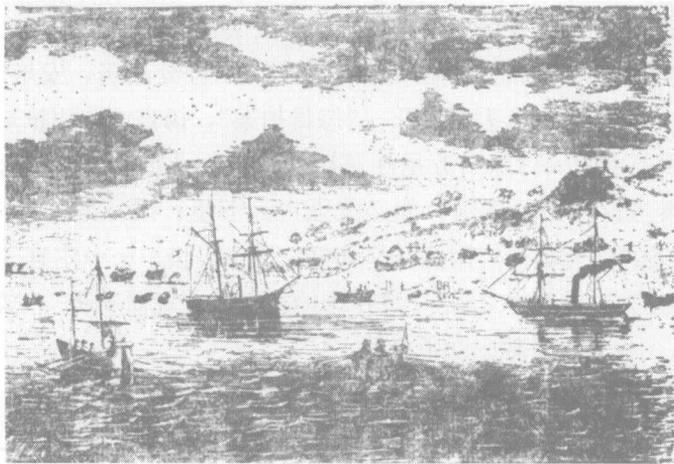
同年11月，穆拉维约夫又指示俄国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司令卡札凯维奇说：“鉴于英法正大力准备对中国发动新战争，由您统率的区舰队所有船只必须作好准备，一俟河口湾解冻，立即出海。……此次出海执行下列主要任务：

一、在大彼得湾内诺夫哥罗德港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占领两个据点，并修筑工事，派两个小队驻守；

二、在库页岛阿尼瓦湾内占领一块地方，也修筑工事，派两个连驻防；

三、沿大彼得湾巡航，并由南向北，从朝鲜国界（图们江口）起至奥尔加湾（石门湾——引者）止，将全部海岸测绘下来，力求准确。”^①

1860年6月，卡札凯维奇奉命率舰队从庙街出发，悍然侵占海参崴（俄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和诺夫哥罗德港等地，从而在日本海沿岸为沙俄夺得了优良的海军基地，并切断了吉林省通向日本海的一切出海口。至此，沙俄已在北起黑龙江口、南至图们江口附近、西沿乌苏里江、东沿日本海西岸及库页岛强行建立一系列军事据点，实际上完成了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武装占领。



沙俄占领下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① 穆拉维约夫：《致卡札凯维奇先生》。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80页。

对于沙俄非法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罪行，中国政府及黑龙江、吉林地方当局多次提出强烈抗议。

1859年4月，清政府理藩院照会沙俄枢密院说：“查乌苏里、绥芬河等处，均系吉林地方，并不与贵国连界，岂应复思侵占？贵国……不应如此违理。”^①

同年5月，乌苏里江地区清政府边防官员托克托布向俄方严正指出：“乌苏里（江）向上一带，均系我国采捕参珠貂皮禁山，不在允许之例。近来一味向内侵占，殊非和好之道，当遵前约，不可狡执展占。”^②

5月28日，清政府军机处又照会俄方说：“中国与俄国地界，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外）兴安岭为界，从无互相侵犯之事。今黑龙江将军以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许俄国人暂住，已是格外通情，岂能又占至吉林三姓地界！”^③此后，清政府对于沙俄武力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野蛮行径，又以书面和口头方式多次向俄方提出抗议，但沙俄侵略者恃强逞横，置若罔闻。穆拉维约夫甚至粗暴地将清政府理藩院致沙俄枢密院的照会退回北京，拒绝接受。^④

同年11月5日，署瑗璋副都统爱绅泰亲自赴海兰泡，会见正在该地逗留的穆拉维约夫，质问俄国为什么恣意侵占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要求俄国人从乌苏里地区撤走。穆拉维约夫大吵大嚷，说什么“不但已去者不能迁移，此后尚有续来人船，并在兴凯湖、图们山等处建房、安炮。”爱绅泰予以驳斥。穆拉维约夫竟大肆恫吓，“怒目拍案”，扬言“非用枪炮，断不迁移”，进一步要求中国拆除乌苏里江东岸的卡伦。“如不拆去，我必令人拆毁。”爱绅泰当即指出，俄国“如必欲强占乌苏里、绥芬地方，该处人民，亦不相让；若再恣意横行，因此有伤和好，岂不可惜。……尔宜三思，毋负当年旧约，方为永敦和好之道。”穆拉维约夫对此“置而不听”，“转入别屋，不复出见”，^⑤极端粗暴地中断了会谈。

事实上，穆拉维约夫这次去海兰泡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进行什么谈判，而是企图借助赤裸裸的战争恫吓，逼迫清政府屈膝投降，接受沙俄驻华

① 《始末》，咸丰朝，第36卷，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37卷，第18页。

③ 同上书，第37卷，第22—23页。

④ 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起源》，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第139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44卷，第37—39页。

代表伊格纳切夫当时在北京提出的一切苛刻要求，首先是割让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11月27日，穆拉维约夫从海兰泡致函卡尔萨科夫，毫不掩饰地说：“目前我留在这里就是对他们（指清朝官员）的示威。他们大为恐惧，信使已飞驰北京。这或许对伊格纳切夫能有所帮助……”“我必须在此再呆两周左右，好让满人相信，我正在准备打仗。”^①他命令黑龙江、乌苏里江全线的沙俄正规部队和哥萨克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到处开枪放炮，硝烟弥漫。“所有这些军事准备活动都不曾保密，相反却是公开进行的，他们有意让汉人和满人知道。”^②穆拉维约夫还向沙皇政府正式建议，如果清王朝在英、法联军的打击下一旦崩溃，俄国就应出动大军“占领库伦，并从外贝加尔省和黑龙江调遣援军进驻满洲”，^③将中国东北和蒙古全部吞并。

与进行战争威胁同时，穆拉维约夫还悍然下令“拆除乌苏里江右岸河口上的满洲哨所”，^④“将所有中国官员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撵到左岸，对抗拒者予以逮捕，并用武力押解至瑗琿。”^⑤1859年底，驻海兰泡和伯力的俄国官员奉穆拉维约夫之命，率领100余人，“各持火枪刀剑等械，随带爬犁”，武力驱逐乌苏里江口附近的中国守卡官兵，将清朝设在该地的卡伦强行占据。^⑥

沙俄就是这样以武力占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迫使清政府面对既成事实，以便于进一步逼签新的割地条约。卡巴诺夫在《黑龙江问题》一书中毫不讳言地写道：“在滨海地区南部海湾设立俄国军事哨所和哥萨克向乌苏里右岸的迁居，使俄国政府有可能在谈判乌苏里地带划界问题时，向北京声明俄国关心这个地区。”^⑦沙俄侵华手段的狠毒，由此可见一斑。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68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570页。

③ 穆拉维约夫：《条陈》。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86页。

④ 穆拉维约夫：《致伊格纳切夫少将》。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88页。

⑤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31页。

⑥ 《始末》，咸丰朝，第48卷，第5—6页。

⑦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44页。

第二节 彼罗夫斯基的敲诈勒索和布多戈斯基的 “勘界”活动

中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沙皇政府急欲抢在英、法之前完成换约手续，并诱迫清政府割让更多的领土，首先是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为了争取时间”，^① 它决定不等从彼得堡派出新公使，而指派正在伊尔库茨克准备首途来华的新任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尼·彼罗夫斯基^②立即同中国举行谈判。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指示彼罗夫斯基说，谈判时应力促清政府批准《天津条约》。^③ 同时，穆拉维约夫也就谈判内容提出指导性意见，致函彼罗夫斯基说：“《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等等。’我认为，这段话我们应做如下理解：它所指的是《璦琿条约》中规定的由双方共管的地区，即从乌苏里江至海的土地。因此，恭请阁下，根据授予您的全权，建议中国政府立即派遣委员，前往勘查自乌苏里江至诸海港之间地区，并通知中国政府，我将派出我国勘察队前往该地，会同勘查。”他通知彼罗夫斯基说，俄国“勘察队”将沿乌苏里江绘制“边界”地图，然后送往北京，以便双方据以订约划界。^④ 可见，沙俄侵略者早在着手“勘查”以前，已预定把两国边界划在乌苏里江，因而这种“勘查”纯粹是一种欺骗手段，目的是为了给沙俄侵吞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披上“合法”的外衣，将这片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由两国“共管”进一步变为沙俄独占。

彼罗夫斯基奉命以后，立即从伊尔库茨克前往恰克图，1858年8月6日离开俄境，“其隆重情况为前此的任何传教士团所无法比拟”。^⑤ 10月10日，彼罗夫斯基抵达北京。但是，他匆忙赴任，并未持有俄国政府的全权证书，也未拿到俄国政府对《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所以，到北京后头两个月，一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7页。

② 彼·尼·彼罗夫斯基原系俄国外交部五等文官，因参加璦琿谈判有“功”，升为四等文官，并获得每年1200卢布的终身年金和勋章一枚。

③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158页。

④ 穆拉维约夫：《致彼罗夫斯基的公函》。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05—206页。

⑤ 穆拉维约夫：《致科瓦列夫斯基》。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83页。

直没有向清政府说明自己来华究竟要干什么。俄国政府给清政府的咨文，有“应照现在俄国京城大臣丕业罗幅斯奇（彼罗夫斯基）商议之言”办理的话。然而，彼罗夫斯基“到京后并未声言欲办何事”，因此清政府对彼罗夫斯基的使命感到“尤不可解”。^①

1858年12月，彼罗夫斯基收到俄国政府对《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和全权证书后，于14日照会理藩院，要求换约。清政府派礼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的肃顺，理藩院尚书瑞常为代表，同他谈判。开议之初，双方对条约文本发生了争执。中俄《天津条约》有满、汉、俄三种文本，以满文本为准。但满文本有两个：一个是中方由俄文译汉，再由汉文译为满文的；另一个是俄方自译的。两个满文本的文字“间有不符”，例如，“第二条内，该国自翻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军机大臣、大学士面议’一层”，中方翻译的满文本中没有这一句。又如第十二条，中方满文本有“所议条款，俱照中国清文办理”字样，而俄方自译的满文本却少此句。^②不过，两种满文本虽有这些歧异，基本内容并无不同，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时，“普提雅廷亦经看明画押无词”，^③并未提出异议。彼罗夫斯基却坚称两个满文本不同，“不肯互换，借端欲请更正”，^④并索看中方的条约原本。清政府本来准备在上海同英、法、美、俄四国换约，条约原本已由桂良、花沙纳带往上海。彼罗夫斯基提出阅看原本的要求后，清政府立即行文上海调取。彼罗夫斯基仍不满意，多次行文军机处，指责肃顺等“办理不正”，甚至扬言要停止谈判，纠缠了4个多月，直到1859年4月24日才完成换约手续。从两国互换的《天津条约》约文可以看出，清政府实际上被迫同意以俄方自译的满文本作为惟一的正式文本，在这一问题上对沙俄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但是，沙俄政府决不以互换《天津条约》为满足。早在3月20日，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即已训令彼罗夫斯基要求清政府另订新约，蓄谋割占整个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中国西部边境大片土地，并扩大陆路通商的特权。^⑤不过，狡猾的彼罗夫斯基在《天津条约》互换以前，并未吐露还有其他意图，避免清政府对他产生怀疑，影响换约任务的完成。因此，当4月间穆拉

① 《始末》，咸丰朝，第33卷，第26—27页。

② 同上书，第33卷，第47—48页。

③ 同上书，第33卷，第47页。

④ 同上。

⑤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167页。

维约夫的翻译官希什马廖夫对瑗珲副都统吉拉明阿说，彼罗夫斯基负有解决绥芬、乌苏里“划界”问题的任务时，清政府颇感意外，还认为“断不可信”呢！^①然而这却是事实。

中俄《天津条约》互换后，彼罗夫斯基立即按照哥尔查科夫的上述训令采取行动。5月4日，他突然以书面形式提出所谓《补续和约》八条，要求清政府接受。八条中涉及边界的有两条，即第一条和第三条。

第一条说，为补充中俄《瑗珲条约》第一条和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两国东边界址，应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再“由兴凯湖至珲春河，顺河至图们江，顺图们江（至）海口为界”。

第三条说，中俄西界“自沙斌岭（沙宾达巴哈）卡伦至额尔齐斯河、斋桑湖，又自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地方，至阿拉塔乌山考康（浩罕）边为界”。

此外，还有订立陆路贸易章程，准许俄人由陆路进入中国内地贸易，以及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等地设立俄国领事官等。^②

如果将这八条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它正是该约的蓝本。

《补续和约》八条的提出，进一步暴露了沙俄侵略者永不满足的贪欲。5月15日，彼罗夫斯基再次照会军机处，硬要照八条订立新约，并强调“第一条因特故应急速立定”。^③清政府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加以抵制。5月25日，军机处复照彼罗夫斯基，对八条逐一进行驳斥，强调指出：“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外）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外）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关于划分中俄西段边界问题，清政府指出：中国在该处“有向来定界，应毋庸议”。

此外，对于扩大陆路贸易和设立领事等无理要求，清政府也断然拒绝。^④5月28日，彼罗夫斯基又照会军机处进行纠缠，强要“以乌苏里江立为两国

① 《始末》，咸丰朝，第36卷，第5、8页。

② 《丕业罗幅斯奇（彼罗夫斯基）提交军机处八条章程》（1859年5月4日）。

③ 《丕业罗幅斯奇（彼罗夫斯基）致军机处照会》（1859年5月15日）。

④ 《始末》，咸丰朝，第37卷，第15—17页。

之交界”。军机处再次行文予以驳斥，并指出“此次贵使臣来京，专为互换和约，尚书肃、瑞亦只专办此事”，现在《天津条约》已换，“京中实无可办之事”，而且条约中也没有准许俄使常驻北京的规定。^①这实际上就是暗示他不受欢迎，要求他离开中国。但彼罗夫斯基继续赖在中国不走，6月11日，他又行文声明，他来北京，不只负有换约任务，而且经沙皇授权就边界和通商等问题进行谈判，要求清政府明确回答他的八条，“不搀旁事无关系之言”。军机处再次驳斥说，“本处细阅贵使臣所提八条，前已逐条咨复，又由尚书肃、瑞当面与说明，迄今半月之久，何以复提此事，殊不可解！”^②

彼罗夫斯基使华几个月，除了交换《天津条约》以外，没有捞到更多东西。1859年6月末，彼罗夫斯基奉调回国，行前通知军机处说，俄国政府所派新使臣伊格纳切夫已经到京，今后将由他同清政府继续“商议八条之事”。

当彼罗夫斯基在北京敲诈勒索的时候，穆拉维约夫也按原定计划在乌苏里江以东积极进行“勘界”活动，同彼罗夫斯基紧密配合，双管齐下。1858年8月，穆拉维约夫派人通知瑗琿副都统吉拉明阿，告以俄国已派布多戈斯基等人勘察乌苏里江至海一带地方，将于明年（1859年）赴兴凯湖，会同中国官员勘分边界。吉拉明阿畏俄如虎，含糊其词地答以“莫若冰泮船行，较为妥善”，并转报黑龙江将军奕山。^③奕山又将此事报告清廷，说吉拉明阿的答复是为了“推缓夷官”。^④

咸丰帝对吉拉明阿擅许会勘乌苏里江至海一带非常愤怒，接连颁发谕旨说，绥芬河、乌苏里江既不与俄国接壤，当时即应拒绝，何以含糊推诿，致令借口，“上年奕山允许该夷居住黑龙江左岸，办理已属太易；复经许赴绥芬、乌苏里会勘地界，致夷首借词狡赖。若不严行拒绝，吉林一带地方，又为该夷占踞，无厌之求，尚复何所底止？”^⑤他下令将吉拉明阿立即撤职（后改为革职留任），对奕山传旨严行申饬。

1859年1月下旬，穆拉维约夫派布多戈斯基和希什马廖夫率“勘察队”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前往乌苏里江“勘界”，并授予他们“竖立界标的全

① 《始末》，咸丰朝，第37卷，第22—23页。

② 同上书，第38卷，第9—10页。

③ 同上书，第35卷，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35卷，第27页。

⑤ 同上书，第35卷，第28页；第36卷，第8页。

权”。^① 4月，布多戈斯基等抵达瑗琿，声称奉穆拉维约夫之命，前往乌苏里、绥芬等处勘定地界。吉拉明阿奉命阻止。布多戈斯基置之不理，径行前往，并要求迅速通知吉林将军派员会办。^② 同月23日，布多戈斯基等到达乌苏里江口，又对当地中国守卡官员声称，请中国派员同往会勘，否则“我等自行去占”。^③ 清政府获悉后，即向俄国枢密院提出抗议，明确指出：乌苏里江、绥芬河等处均系中国内地，俄国政府应“将石沙木勒幅（希什马廖夫）等人船撤回。除黑龙江左岸空旷处所，已让令居住外，其余概不得游行占住。”^④

眼看沙俄不断扩大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清政府日益深切地认识到《瑗琿条约》的严重性，于1859年6月16日由咸丰帝颁发谕旨，将这一卖国条约的签订者奕山革职留任（不久调回北京），将吉拉明阿拏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谕旨中说，沙俄侵占乌苏里、绥芬地区，“此事贻误根由，总由奕山、吉拉明阿于两国公同管理一语，不能立时剖辩，致令有所借口。”^⑤ 清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向俄国表明，它决不承认沙俄武力逼签的《瑗琿条约》，更不能容忍沙俄进一步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但是，侵略成性的沙俄扩张主义者哪管你这一套，他们继续咄咄逼人地向乌苏里地区推进。就在咸丰帝颁发上述谕旨的时候，布多戈斯基一伙不顾中国巡防官兵的劝阻，已经沿乌苏里江窜到上游，然后取旱路向海边进发，于6月末到达图们江口附近的波谢特湾，强行在“罕奇地方支搭帐房四架”，“竖立旗帜”。当地清朝边防官员骁骑校博兴前往查巡，但是，这一伙沙俄入侵者无视中国主权，竟然“不容查看”。^⑥ 根据“勘查”的结果，他们绘制了一张从乌苏里江至海的所谓“边界图”，竟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土地擅自全部划入俄国版图。

7月初，穆拉维约夫亲自乘“亚美利加”号兵船赶来，把布多戈斯基接上船去，一同前往渤海湾。同月14日，“亚美利加”号驶至白河口，穆拉维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42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36卷，第4—6页。

③ 同上书，第37卷，第18页。

④ 同上书，第36卷，第9—10页。

⑤ 同上书，第38卷，第11—12页。

⑥ 同上书，第40卷，第6—7页。

约夫派布多戈斯基将这张“边界图”亲自送往北京，以便强迫清政府照图订约。

第三节 伊格纳切夫使华及其与肃顺的交涉

彼罗夫斯基的使华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就在彼罗夫斯基抵达北京后不久，沙皇政府已根据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的推荐，确定了一个他认为更适当的使华人选——少壮派军人尼·巴·伊格纳切夫上校。他从1856年起即进入外交界，曾任俄国驻英陆军武官。1858年他以特别军事考察团团长的身份，前往希瓦和布哈拉汗国执行一项重要的侵略使命。1858年末，伊格纳切夫奉命从布哈拉赶回彼得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见，提升他为侍从少将，并按照普提雅廷关于向清政府赠送枪炮和派遣教官的建议，指派伊格纳切夫率领“军事援助团”前往中国，同时执行外交代表的职务。事实上，伊格纳切夫的主要使命，仍然是为了逼迫清政府割让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①

伊格纳切夫所率“军事援助团”的军火共有来复枪1万支，大炮50门，由380辆大车载运，并有军事教官多名随同。此外，沙俄政府还拨款50万卢布作为训练费用，准备在逼签新的割地条约同时，重新“组织中国全部军队”，并预定由巴留捷克负责训练炮兵，泽福尔特负责训练步兵，泽伊姆负责训练工兵，利申负责射击训练，什姆科维奇负责地形测绘工作，以全面控制中国的武装力量。^②“军援团”于1859年3月18日从彼得堡出发。4月16日伊格纳切夫抵达伊尔库茨克，与穆拉维约夫共商侵华大计，两人十分相投。穆拉维约夫对伊格纳切夫赞扬备至，说：“伊格纳切夫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的学识、才干、经验和充沛的精力，保证能完成他所担负的使命。”^③4月27日，穆拉维约夫亲自陪同伊格纳切夫前往边境。

5月12日，伊格纳切夫在恰克图接到彼罗夫斯基来信，获悉肃顺因俄方利用“军援”进行勒索，已明确表示拒绝沙俄的“无私援助”。由于事态出现了这一转折，这个“军事援助团”只得宣告解散。伊格纳切夫本无任何外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50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7—8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55页。

交职衔，中国方面拒绝接受军械，使伊格纳切夫陷入尴尬的处境。他立即请示沙俄外交部，以何种名义前往中国为宜。但直到1860年1月末，沙俄外交部才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公使；又经过3个多月，即到1860年5月，他才接到授予公使头衔的训令。^①

当时清政府不知道伊格纳切夫并无外交职衔，把他当做“公使”认真接待。5月14日，清廷谕知库伦办事大臣，准许伊格纳切夫来京。6月5日，伊格纳切夫率领上尉副官巴留捷克、书记官沃利夫、汉语译员塔塔里诺夫、蒙语译员瓦姆布耶夫少尉及5名哥萨克骑兵离开恰克图。沙俄地方当局在边界上“以最隆重的方式”为他举行了欢送仪式和阅兵，以显示“俄国代表的力量、权势和地位”。^②伊格纳切夫一行沿途经库伦、张家口等地，于6月27日到达北京。入城时，伊格纳切夫神气活现地端坐在绿呢官轿中，由乘高头大马的随员和哥萨克士兵簇拥前行，并有多名俄国东正教教士陪同。第二天，彼罗夫斯基行文军机处说，伊格纳切夫是来继续商议《补续和约》八条的，希望清政府满足俄国的要求，否则就是违背“两国交好之道”。

伊格纳切夫一伙的到来，引起中国人民的普遍憎恶。他在7月8日家信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所有的中国人都仇视我们。……甚至在商店里，中国人也不愿出售任何东西给俄国人，我们必须通过仆役（多数是阿尔巴津人）或使团的为数很少的经常供应者购买必需品。”^③这一抵制行动，有力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坚强意志。

7月9日，咸丰帝再次指定肃顺、瑞常与伊格纳切夫谈判。10日，双方在俄罗斯南馆举行第一次会议。肃顺表示，《天津条约》已经批准，“北京已无未了之俄国事务”，并声明《瑷珲条约》完全无效，因为签订条约的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奕山和他的助手恣意妄为，已受到皇上的惩罚。伊格纳切夫辩称，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他毫不相干，但俄国政府绝不能容忍中国否认《瑷珲条约》的“合法性”。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伊格纳切夫最后凶相毕露地说：俄中接壤达7000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

① 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起源》，第142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11—12页。

③ 《伊格纳切夫使华资料》，第51页。转引自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06页。

国都更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有力的打击”^①，公然在谈判桌上进行武力恫吓，妄图迫使清政府代表屈服。由于伊格纳切夫的狂妄态度，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7月11日，伊格纳切夫以书面方式提出《补续和约》六条，它实际上是彼罗夫斯基八条的翻版，不过比后者更加具体。

第一条说，本约补充《璦琿条约》第一条和《天津条约》第九条，“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上流至兴凯湖及琿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第二条说，新疆应顺山岭大河，“由早年和约所定之地方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第四条规定，俄商“或由恰克图，或由别处，随该商人之意，往库伦、张家口、北京及中国内地诸城贸易”。

第五条规定，俄国“可于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及在中国别处酌量设立领事官”。^②

六条中没有提到黑龙江以北的领土问题，显然伊格纳切夫是在肯定黑龙江以北土地已属俄国的前提下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对此六条要求，俄方在谈判中准备“就次要问题做出让步，而保留实质性部分”。^③

六条之外，伊格纳切夫还附有一份妙不可言的《补续和约条目详解》。其中第一段说：“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界绵长，战法各处皆不能敌，惟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俄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

按照这个《详解》的逻辑，清政府若把乌苏里江以东让给沙俄，实在“明有益处”。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17—20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39卷，第27—29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3页。

第一，这片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既“于中国实无用处”，割给俄国正可化无用为有用。

第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濒临大洋，难保英、法不来侵占；割让给俄国后，就可免除被英、法占据的危险，使这一地区的“安全”获得保证。因此，不是俄国侵略中国，相反地倒是中国从俄国得到了莫大“帮助”。

《详解》还说，关于中俄东、西段分界事宜，“倘中国仍不商办，本国即不论中国愿意否，仍然自己定界立牌。”^①换句话说，无论如何，俄国也要贯彻自己的意图，“帮助”中国到底。

这时正值英、法联军再次侵犯大沽口遭到惨败后不久。1859年6月25日，英、法侵略军集中大批兵船，以武装护送公使进京为名，向大沽炮台守军发起猖狂进攻。中国守军在人民的支持下，发扬了英勇杀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决抗击侵略者的进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沉、击伤英、法军舰十余艘，打死、打伤侵略军464人，英国舰队司令也被打伤。^②大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清政府抵抗外国侵略的勇气。

7月12日，肃顺等逐条驳斥了伊格纳切夫的六条和《详解》。关于东界，肃顺等强调应以《尼布楚条约》为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不与俄国连属”，谈不到立界。如他国侵占中国地方，中国自有办法，无劳俄国过虑。关于西界，“照旧定交界办理”。至于通商，《天津条约》没有规定的地方，不可前往；所有不通商的地方，没有必要设立领事官。^③

7月27日，伊格纳切夫又提出照会说，布多戈斯基已将乌苏里地区“查明”，绘制的地图也已带来北京，“即可照依此图办理，方妥。不然，难免侵吞扰乱。”^④

7月31日，肃顺再复伊格纳切夫，严正指出：来照中“即照贵国‘地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吞扰乱’之语，甚属非是。……贵大臣出此无理之言，形诸笔墨，殊多不合，岂是诚心和好之道？”然后强硬声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断不能借”，“不必言及立界”；若俄国欺人太甚，必要时我们将“宣示

① 《始末》，咸丰朝，第39卷，第30—33页。

② 《远东国际关系史》，第76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39卷，第33—34页。

④ 同上书，第40卷，第29—30页。

中外，使各国闻之，共知贵国之非是，然后闭关停市。”^①

8月31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议。会上“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执”。伊格纳切夫拿着《瑗珲条约》进行讹诈，随心所欲地曲解约文，硬要清朝大臣接受他的全部要求。肃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并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瑗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顿时起立，大吵大闹，指责肃顺“蔑视国际文件”，扬言将要求清政府“另派知礼的全权大臣”，接着便悍然退出会议。^②第二天，他行文军机处，指控肃顺拒绝俄国的要求，“不合和好之道”，要求军机处另派大员与议。^③

9月5日，军机处复照伊格纳切夫说，肃顺、瑞常均为皇帝亲信大臣，“断无不诚心相待之理，其每次与贵大臣照会，及面议言语，皆系据理直言，本处均已知悉。”然后指出，乌苏里江、绥芬河一带，根本不与俄国毗连，中国决不同意以乌苏里江为界的要求。“贵大臣必欲将所求之事，件件允准，方为和好，有是理乎？”^④

此后，伊格纳切夫继续纠缠，晓晓不休地强要以乌苏里江为界，都被清政府拒绝。从9月下旬起，他为了等候沙皇政府的新训令，决定暂停谈判。在这次交涉中，伊格纳切夫因为没有捞到东西而特别气恼。他在给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的报告中承认：“关于划定沿乌苏里江直到朝鲜土地的边界问题，关于批准我们绘制的边界地图问题，他们（指中国方面）根本不想听。”^⑤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十分重视伊格纳切夫的使命。当伊格纳切夫的要求遭到中国拒绝时，亚历山大二世立即指示他留在北京，并专门派遣一艘军舰停泊于白河口，听他调遣；同时命令穆拉维约夫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以应付紧急情况和意外事变。随后，沙俄政府又派信使给穆拉维约夫送去御批的指令说，假如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肯接受俄国的划界方案，就立即派兵占领乌苏里江右岸，并在季节允许时派船占据满洲各港。^⑥事实上，穆拉维约夫这时

① 《始末》，咸丰朝，第41卷，第1—3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38—39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42卷，第14—18页。

④ 同上书，第42卷，第26—27页。

⑤ 俄国《海军档案》。转引自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47页。

⑥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568—569页。

早已完成了对乌苏里江东岸的武装占领，他在1860年1月24日得意洋洋地致函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说：“彼得堡终于命令我占领乌苏里江右岸，我非常高兴，可惜现在已无须去执行，因为早在一年之前我已经占领了该地。”^①沙皇政府的指令不过是对这一领土侵略行径的追认和批准而已。

1859年12月23日，伊格纳切夫行文军机处，声称奉到本国政府命令，有要事相商，请清政府另派大学士同他会谈。清政府拒绝另派大员，仍指定肃顺、瑞常负责谈判。^②1860年1月5日，伊格纳切夫再度照会军机处，继续坚持“以乌苏里江为两国交界”，并威胁清政府说，英、法已集中兵力数万，正在来华途中。“中国愿图太平，止有一法，务思交良友于本国”，“让小事以免将来益生凶迹为善。”^③1月8日军机处复照伊格纳切夫，重申乌苏里江以东是吉林将军辖区，决不能“借与外国”。北京已收到吉林军民的呈文，坚决反对俄国人侵入乌苏里地区，如俄国强行侵占，当地中国人民“断不容留”，“众怒难犯，大皇帝亦不能强为抑制”。^④伊格纳切夫威胁不成，又行利诱，再次照会军机处说，中国若“允准分界等事，我国情愿帮助，劝令英国兵船回国，不致扰乱天津等处，息静干戈，实为两幸”；并厚颜无耻地说，乌苏里江以东广大领土，对于中国“不过弹丸不毛之所，毫无伤损”，对于俄国“通商行走，稍涉便宜”。因此，应把这片地方让与俄国，“以期永远和好”。^⑤

伊格纳切夫为侵占中国领土“屡次行文，晓谕不已”，^⑥使清政府深感不安。1月15日，军机处派肃顺、瑞常至俄罗斯馆，再次声明《瑷珲条约》系奕山“擅行允许”，既未绘图呈报，也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因而无效。伊格纳切夫仍不死心，又于1月20日向军机处提出长篇照会，声称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如“不思早为办结，难保不启争端”；如愿了结，俄国已绘好地图，清政府即可“画押用印”，“看来最易办理”。照会最后扬言：“本大臣奉本国皇帝之命，转告贵处大臣，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将所借之地，本国坚守，永不复还。”^⑦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87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45卷，第38页；第46卷，第7页。

③ 同上书，第46卷，第13—17页。

④ 同上书，第46卷，第23页。

⑤ 同上书，第46卷，第27—28页。

⑥ 同上书，第47卷，第9页。

⑦ 同上书，第46卷，第40—45页。

对伊格纳切夫的讹诈，军机处再次坚决驳斥，指出，乌苏里江右岸“系中国地方”，决不许俄国侵占。^①

为了给伊格纳切夫以支持，沙俄“阿穆尔委员会”于1860年1月24日通过决议，在天津附近海面集中部分俄国舰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委员会还建议伊格纳切夫暂离北京，到停在北塘的俄国船上去，和英、法采取一致步调。^②伊格纳切夫在北京使尽各种花招，“一无所获”，终于决定“只候最高指令和俄国船只抵达直隶湾的消息一到，便离开北京。”^③

5月19日，伊格纳切夫收到了俄国外交部的训令。训令中赞扬了他在北京的一切活动，建议他暂时离京，同时通知他，业已组成一支特种分舰队派往中国水域，由他指挥。沙俄外交部还指示伊格纳切夫，应在英、法侵华战争中“竭力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以便从中渔利；同时应注意不使清王朝彻底覆灭，因为“用汉王朝来代替满王朝对我们（指俄国）是极为不利的。中国政府一旦将其统治重心由北京移到南方，势必摆脱俄国的影响，而落入海上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控制之中。”^④这一段话，充分暴露了沙俄企图利用清政府充当驯服工具以确立其在华支配地位的阴谋。

5月20日伊格纳切夫得知俄国分舰队已经到达天津附近海面，立即向军机处发出最后通牒，强硬声明：中国政府如按照俄国的条件办理东界事宜，交换并确认布多戈斯基绘制的“边界地图”，他愿意继续会商，这样可“免诸将出师之患难”；若仍犹豫迁延，不愿意接受俄国的条件，那么他继续留京“互相无益”，将于5月28日离京前往北塘俄国舰队。本通牒限3日答复。^⑤军机处坚决拒绝了伊格纳切夫的要求，指出，东北各地人民屡次报告政府，中国土地“万不能让与他人”，中国政府也“断不能驱逐百姓，令贵国之人借住”。^⑥随后，清政府又照会伊格纳切夫，同意他离开北京。

伊格纳切夫离京前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交给东正教修士大司祭固礼一份详细的指令，告以今后在北京应如何行事。伊格纳切夫说：“我的意图是坚持向中国政府提出的那些要求，你是知道的。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则是

① 《始末》，咸丰朝，第47卷，第1—2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47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46页。

④ 同上书，第50—51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51卷，第1—2页；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54—55页。

⑥ 《始末》，咸丰朝，第51卷，第2—3页。

尽快结束边界问题并交换边界地图，我也提请你特别注意此事。”伊格纳切夫指示固礼应切实做到以下几点：

(一) 密切注视与俄国以及西方列强有关的一切情况，“尽量搜集关于时局的情报”。

(二) 向中国人说明，俄国将保持“中立地位”，尽力抵制英、法的影响。

(三) “竭力传播对我们有利的传闻和消息，并尽可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解释。”

(四) “经常向彼得堡、东西伯利亚总督和我，发送有关时局的报告；如遇重要情况，可……从教会中派一人来向我报告。”^①

伊格纳切夫的这个指令再一次证明，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会纯粹是一个受沙皇政府直接指挥的特务机关。

5月27日，伊格纳切夫在离京前夕再次威胁清政府说，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俄国人将按照自己对《瑷珲条约》的理解行事，如果清政府接受俄国的条件，在中国与外国的交涉中，俄国愿向中国提供“友好的协作”；如果清政府中断与俄国的贸易关系，就将“被视作对俄国的宣战”。^② 28日，伊格纳切夫离开北京前往北塘，与沙俄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利哈乔夫会面，随即登上“德日基特”号军舰，直驶上海，去执行勾结英、法联合侵华的阴谋计划。

第四节 伊格纳切夫与英、法、美的勾结和 中俄《北京条约》的缔结

英、法侵略者为了报复大沽的惨败和掠夺更多权益，再度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专使，并以克林顿和孟斗班为两国侵华军总司令，准备发动新的对华战争。1860年春，英军1.8万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到达中国。新的战火处于一触即发之中。

在远东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伊格纳切夫于1860年6月15日匆忙赶到上海，住在美国驻沪领事艾伯特·赫尔德寓所。美国公使华若翰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59—60页。

^② 同上书，第57页。

已先期到达。俄、美两国侵华利益的一致，处境的相似，促使他们建立起极密切的关系。早在1860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向美国驻俄大使皮肯斯表示，希望华若翰和伊格纳切夫在中国携手合作。^①6月18日，伊格纳切夫致函华若翰说，他奉命在英、法对华战争中“严守中立”，担任“调人”，希望俄、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②华若翰接信后立即声明，美国决定和俄国政府“采取相同的方针”。^③

伊格纳切夫特别希望同英、法公使卜鲁斯、布尔布隆加紧勾结（此时英、法专使额尔金和葛罗尚未到达）。伊格纳切夫到上海的第二天，布尔布隆派秘书哥士耆和他联络。伊格纳切夫对哥士耆说，他是为了向清政府表明俄国同英、法等“所有海上列强”团结一致，才决定离开北京的；并建议英、法海军北上攻打大沽，担保此举将产生对英、法“有益的效果”。^④6月26日，伊格纳切夫致函布尔布隆，极力鼓吹对清政府使用武力，并表示俄国愿向英、法联军提供“外交上的援助”。^⑤同一天，他又向各国公使发出通告说：“我当竭尽全力……劝导中国政府履行它对英国、法国和合众国所承担的义务。”“长期的经验使我们确信，欧洲列强只有不顾各自情况的本来区别，而用一项共同的保证彼此结成休戚与共的关系，才能使中国政府认真履行条约义务。基于这一点，我才奉命离开北京，来到上海会见联军，从而使中国政府不致将俄国遵守中立误认为是赞同该政府的行为。……联军给予中国军队的严重教训，终将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⑥这一番自我表白，大大增进了英、法公使对他的好感。

6月28—29日，葛罗和额尔金相继到达上海后，伊格纳切夫愈加卖劲地向他们表示“团结友好”，并将关于白河下游清军防务和北京城防的“准确有用的”“详细军事情报”，密告英、法联军。^⑦他还力图使英、法侵略者相

① 美国国务院档案：《皮肯斯致国务卿报告》（1860年1月24日）。转引自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37页。

②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16卷，第289页。

③ 同上书，第1辑，第16卷，第291—292页。

④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43页。

⑤ 曼考尔：《伊格纳切夫少将的出使北京（1859—1860）》，载哈佛大学《有关中国论文集》，1956年，第10号。

⑥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72—73页。

⑦ 加迪：《法国在东亚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1954年纽约出版，第259页。

信，“肃顺是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以防止肃顺参加日后可能恢复的谈判。^①

在英、法联军发动的这次侵华战争中，伊格纳切夫实际上起着谋士的作用，充当了英、法侵略者“不可缺少的顾问和中国事务专家”，^②清朝政府和地方官吏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在奏章中指出：伊格纳切夫到达上海后，“极力怂恿英、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凿凿。淳告普（卜）鲁斯、布尔布隆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而普（卜）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愈坚，有不候额尔金、葛罗到来，即行北驶之议，俄酋又许其同去。”今“美酋甫到，俄酋旋即踵至”，额尔金、葛罗不日可到，“是该酋等明系相约而来，互通消息，狼狈为奸。”^③又说：“俄夷又来沪播弄。目前上海夷情，较前更为桀骜。”^④

7月初，英、法侵略军纷纷北上，预定月底在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然后占领天津。7月3日，美使华若翰离开上海去渤海湾，第二天伊格纳切夫也启碇前往日本转渤海湾，并先派译员塔塔里诺夫去北塘投递致军机处照会，表示“英法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另附送美国公使华若翰致军机处照会，也表示愿居间调停。清政府担心俄、美借口调停“肆行要挟”，加以拒绝。军机处答复伊格纳切夫的照会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未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⑤同时指出，美国照会按旧例应由上海投递，方能接收。

7月15日，伊格纳切夫率领兵船八艘到达北塘。北京俄国东正教修士大司祭固礼闻讯，赶忙派人送来情报，并建议伊格纳切夫说：“务请大力说服英国人从速前来北京，中国现已极度虚弱。”^⑥7月19日，伊格纳切夫乘舰至烟台，向额尔金和葛罗提供大量有关天津口岸的情报，并说，英、法联军登陆以后，6天内即可解决战事。^⑦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76页。

②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49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52卷，第43—44页。

④ 同上书，第53卷，第19页。

⑤ 同上书，第54卷，第13—14页。

⑥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82页。

⑦ 瓦尔朗编：《额尔金伯爵的书信和日记》，1872年伦敦出版，第336页；加迪：《法国在东亚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第248—249页附注。

7月下旬，英、法两国舰队齐集大沽口外。当时负责天津海口防务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尽撤北塘防务，专守大沽。这一情报为俄人探悉，伊格纳切夫立即密告葛罗，“在北塘看不到障碍物，一点阻拦也没有”，尽可进攻。^①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艘，开到北塘河口，未遇抵抗，就占领了北塘镇。僧格林沁报告，当时英、法联军登陆北塘，“系俄夷引路”，8月3日发生战斗，“俄人亦曾协助兵力”。他指出，在这次列强侵华战争中，“俄夷尤堪痛恨。”^②

英、法侵略军大举北犯，使咸丰帝感到十分恐慌。清政府于8月3日照会美使，表示同意其调停之请。华若翰虽企图利用“调停”的机会从中渔利，但因和额尔金、葛罗不睦，最后只得声明兵端已开，无能为力，^③不久即返回美国。另一个“调停人”伊格纳切夫则深为清政府所疑惧，认为“俄夷播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因此，它宁可与英、法直接交涉，而不愿俄国介入。^④

8月12日，英、法侵略军1万多人分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中国骑兵3000余名勇敢迎敌，给来犯者以沉重的打击，但终因众寡不敌，几乎全部阵亡，新河、军粮城失陷。14日，塘沽失陷。21日，大沽也落入敌人手中。腐朽的清王朝面对张牙舞爪的侵略者，慌了手脚，竟然下令撤走天津的所有军队，僧格林沁本人也逃到通州。8月24日，英、法军侵入天津，并提出开天津为商埠，增加赔款至800万两，公使各带卫队1000人进京换约，以及常驻北京等条件，强迫清政府接受。同一天，咸丰帝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交涉。随后又加派武备院卿恒祺为帮办大臣，协助办理。葛罗、额尔金于8月25日、26日先后进入天津，桂良则于31日到达。次日，开始了中国和英、法联军的天津谈判。

对清政府和英、法联军的直接谈判，伊格纳切夫深感不安。他担心如果谈判没有俄国“协助”就顺利成功，那末清政府便会拒绝承认《瑷珲条约》，当然更谈不到接受《补续和约》。因此，伊格纳切夫一方面极尽挑拨之能事，另一方面又竭力两面讨好，要求充当“调停人”。

8月26日，伊格纳切夫急派塔塔里诺夫前往天津，28日，向恒福投递

① 高第：《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1906年巴黎出版，第246—247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55卷，第29—30页。

③ 同上书，第55卷，第13—15页。

④ 同上书，第55卷，第30—31页。

致军机处咨文一件，表示愿从中斡旋。^① 29日，伊格纳切夫本人也匆忙赶到天津，9月4日，再致军机处咨文，拟以调停人的身份进京，要求清政府派员迎接。军机处拒绝说，过去与彼罗夫斯基议定，海口无事，方可前来。今既值有事之秋，而中俄《天津条约》又已互换，暂可不必进京。^②

伊格纳切夫未遂所愿，于是极力挑动英、法向北京进军。9月5日，伊格纳切夫向额尔金表示，俄国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的商业权益感到高兴，自然不会妨碍这种贸易。俄国关心的是“国界”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或其它列强来说，均无任何意义。因此，英、俄的利益没有冲突，也就没有妨碍两国团结一致的理由。

9月7日，伊格纳切夫在与葛罗的交谈中再次表示，他将“始终对联军给予道义上的帮助”。同时，他怂恿英、法侵略军“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指僧格林沁——引者）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北京俄国东正教会首领固礼派波波夫到天津送信，报告伊格纳切夫说，清政府“正在通州集结重兵，皇帝的全部重炮队已从北京调往通州，而在京城和京、津之间的道路上则布置了大量的步兵”。^③ 伊格纳切夫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通知了葛罗和额尔金，并把俄国人私自测绘的北京平面图和从北塘至北京的路线图给法军司令阅看。此后，联军经常就各种军事和政治问题，征询伊格纳切夫的意见。^④ 当时，天津居民对英、法侵略军展开了广泛的反抗运动，甚至“罢市停业”，拒绝向侵略军供应食品。伊格纳切夫为了讨好英、法，竟公然建议侵略军采取“强硬手段”，对中国人民实行镇压。^⑤ 事实就是这样，伊格纳切夫口头上尽管表示“严守中立”，实际上却站在英、法侵略军一边，干尽了为虎作伥的坏事。

天津谈判由于英、法的要求极端苛刻，没有得到结果。9月9日和10日，英、法侵略军相继从天津出动，进犯通州，准备进攻北京。清政府惊慌失措，一面急忙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赶赴通州议和；一面指示恒福请伊格纳切夫出任调停。恒福托伊格纳切夫转告联军在津再停

^① 《伊格纳切夫使华资料》，第303—306页。转引自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52—253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58卷，第2页；第59卷，第14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119—121页。

^④ 同上书，第123—124页。

^⑤ 同上书，第136页。

留3天，以便转圜。但是，狡诈的伊格纳切夫却企图利用英、法联军对清政府施以更沉重的打击，等时机成熟时再插手“调停”，以便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因此，他断然拒绝恒福的建议，说事已到此，必须由军机处以书面形式，正式向他提出请求，并须首先满足俄国的各项要求；唯有这样，他才能同意出面斡旋。^①

9月14日，载垣在通州与英、法代表谈判中，完全接受了侵略军的各项条件，只要求他们到达河西务就停止前进，并同意额尔金和葛罗各率卫队到通州会谈，确定条约细节。17日，额尔金等人又节外生枝，要求增加向咸丰帝亲递国书一项，并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遭到载垣等拒绝。18日，英、法侵略军突然袭击张家湾的守军。中国士兵英勇抵抗，但终因清廷腐败，指挥无能，让英、法侵略军占领了通州。伊格纳切夫闻讯后立即离开天津，“以极快的速度”向通州进发。

9月22日，咸丰帝从北京逃往热河，同时任命恭亲王奕訢为全权钦差大臣，留守北京，准备向侵略者投降。英、法侵略军正好利用清政府求和的机会，补充给养和武器。在新的谈判中，联军硬要先释放被清军俘虏的巴夏礼等人，奕訢则表示，英、法兵船退出大沽后才能释放。额尔金、葛罗不容分说，限奕訢3天内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立即进攻北京城。

9月26日，伊格纳切夫又主动向葛罗和额尔金进一步提供有关北京城防的详细情报，密告他们说，北京的城墙“也许可以攻破，但是要花费时间和弹药。用地雷把它炸垮，或许更简单些”。又说，清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点”，因此英、法联军首先应攻取北城。^②伊格纳切夫还“慷慨应允”英军将领们的要求，将俄国人绘制的北京平面图供他们复制了若干份。当时英国军官奥勒古写道：“俄使伊格纳切夫将军正在我们的营帐中。他已将一份我从未见过的最好的北京地图借给我们。这张地图比我们的更好、更详尽，他把所能提供的有关北京的全部情报给了我们。”^③

此外，伊格纳切夫亲口承认，他还向英军提供了“地形和统计情报”，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129—131页。

② 诺利斯：《1860年对华战争》，1875年爱丁堡、伦敦出版，第135—136页。

③ 奥勒古：《1860年对华战争：书信和杂记》，1901年伦敦出版，第54页。英军司令克灵顿也写道，伊格纳切夫曾“把一张极好的北京地图拿给我们看，这张地图是他派人绘制的，图中标示了每一条重要街道和每一座重要房屋。他把这张平面图欣然借给我们复制，仅仅要求不要发表，因为这张平面图尚未呈送圣彼得堡。我将这张地图请贝托先生拍了照片。……我还从这位俄国人得到其他一些关于北京地形的颇有价值的情报。”参见诺利斯《1860年对华战争》，第120—121页。

包括许多张京、津道路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① 额尔金对伊格纳切夫提供的一切情报和建议，表示深切的感谢，并再三表示愿同俄国人协同动作。

10月4日，额尔金通知伊格纳切夫说，联军主力将于次日向北京推进。额尔金和英军司令克林顿都邀请伊格纳切夫和他们同行。葛罗也请伊格纳切夫随同联军行动，并协助联军与中国缔结和约。疯狂的英、法侵略军进逼北京，并绕过北京城的东北郊，到圆明园等地大肆抢劫，把园内金银珠宝以及各种艺术珍品掠夺一空。在侵略军的逼迫下，奕訢无耻地答应了联军占领北京一个城门的要求。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占领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当法军司令孟斗班命令联军值勤部队占领安定门时，俄国使团的巴留捷克带领哥萨克骑兵2人也参加了这个部队。这就是说，俄国人不仅在“道义上”支持英、法侵略者，而且实际参与了对北京的武装占领。

10月15日，葛罗托巴留捷克转告伊格纳切夫说，“我们全都恳切地请他离开通州前来此地协助我们缔结和约。”当天，伊格纳切夫应邀由通州赶到安定门外，会见额尔金和葛罗，参与了英、法致清政府最后通牒文稿的研究。^② 16日，伊格纳切夫进入北京，驻扎俄罗斯南馆。奕訢闻讯，即派员往见固礼，转请俄使出面调停。固礼故意刁难，要他们直接向伊格纳切夫提出请求，并须先行承认俄国以前所提的全部要求。奕訢求降心切，第二天遂派恒祺等人面见伊格纳切夫，请求他协助缔结和约。伊格纳切夫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现在出面，既能得到英、法的充分支持，又能逼迫清政府答应其领土要求。于是，他对清朝大臣们肆无忌惮地训斥和恫吓说：“俄国对贵国一向深表同情，曾不止一次地向贵国提出忠告，指出如何方能摆脱贵国近年来所处的困境，但是贵政府非但不顾这些劝告，反而听信肃顺之流那些不中用人的主张。我在北京虚度了十一个月之久，虽曾屡次提出显然是偏向于贵国的建议，然而贵大臣对此不予重视，而且可能竟未将这些建议向皇帝具奏。……俄国可以因你们不履行其合法的要求对你们进行残酷无情的惩罚，也可以因你们怠慢其代表而进行报复。对俄国来说，如果要在—万俄里的中俄两国边境线上对你方任何一地发动一次无法抵抗的打击，那是轻而易举

① 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57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190、193—195页。

的。你们知道俄国有多少陆军，知道直隶湾停泊着俄国的分舰队。”伊格纳切夫最后敲诈说，如果要他出面调停，就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一、必须由奕訢本人以书面方式提出请求；

二、清政府和英、法谈判时，必须就谈判的全部内容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不得稍有隐瞒；

三、在领土问题上，清政府必须同意他前此提出的各项要求。^①

正如一位西方的历史学者所说，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就意味着伊格纳切夫完全控制谈判的一方——清朝，意味着满洲人屈从俄国原先提出的全部要求。”^②

对于伊格纳切夫的恐吓、要挟和侮辱，躲在北京城外的奕訢非但不敢有一字抗议，反而于次日（10月18日）晨派员前往俄罗斯馆投递照会，表示“感到欣慰”。他还摇尾乞怜地恳请伊格纳切夫相信，有关俄国的事宜“一切当照他的要求办理”，惟希望伊格纳切夫先帮助清政府同英、法议和。^③当天伊格纳切夫函告葛罗：他已使恭亲王和其他大臣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危险，并“说服”他们以“迄今未有的诚意同英、法谈判”，“立即签订和约”，批准互换。^④

这样，伊格纳切夫在北京实际上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走投无路的奕訢已接受他的三项条件，听其任意摆布而不敢违拗；另一方面，额尔金和葛罗也对他的“调停”活动表示赞赏，并欢迎他继续为联军出力。

就在奕訢提出上述照会的同一天，葛罗和额尔金分别致函伊格纳切夫，请他将英、法致清政府的最后通牒转交奕訢，限于10月20日上午10时以前无条件接受联军的要求，否则将北京夷为平地。^⑤奕訢等人接到通牒后向伊格纳切夫表示，英、法两国的要求过分苛刻，清政府不能接受。伊格纳切夫大肆威胁说：“在当前情况下要提出异议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只能劝说英、法在次要问题上做些“让步”，“不管清政府是否愿意，对英、法提出的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05—207页。

② 曼考尔：《伊格纳切夫少将的出使北京（1859—1860）》，载哈佛大学《有关中国论文集》，1956年，第10号。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08—209页。

④ 高第：《中国对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0）》，第1卷，1901年巴黎出版，第94—95页。

⑤ 曼考尔：《伊格纳切夫少将的出使北京（1859—1860）》，载哈佛大学《有关中国论文集》，1956年，第10号；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264页。

大部分要求都必须接受。”^①伊格纳切夫还说，如果不赶紧同英、法缔和，如果中国的军民继续抵抗，那末联军入城时“就将不可避免地接着发生激烈的巷战，北京城就会因此而毁灭”，化为“废墟”，清政府就将“彻底崩溃”。^②与伊格纳切夫的逼降活动相配合，英、法侵略军也在10月18日、19日采取最野蛮的恫吓手段，纵火将圆明园全部焚毁。奕訢等惊慌万状，完全屈服。20日凌晨，他们起草了致联军的复照，表示接受英、法的要求，并送请伊格纳切夫过目。伊格纳切夫认为措词含糊，逼使重写，于是奕訢等又按照伊格纳切夫的意见修改了复照，然后请他转交额尔金和葛罗。10月20日晨，英、法专使收到奕訢接受最后通牒的复照。于是，清政府与联军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了。“每逢在谈判各方之间出现误会或争执时，双方总是去征求俄国公使的意见”，“这就使他完全可以左右谈判的全部进程。”^③在伊格纳切夫的“调停”下，奕訢终于在1860年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当时，法国人坦白承认：“我们全靠伊格纳切夫将军的斡旋，才使恭亲王迅速地作出决定。”^④1860年10月26日葛罗函告法国外交大臣说，他对伊格纳切夫“所给予的真诚帮助”深为感谢。^⑤额尔金也在条约订立的次日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说，他对伊格纳切夫怀着深切的谢意。^⑥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一签订，伊格纳切夫立即索取进行“斡旋”的“报酬”，照会奕訢说：“英、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清政府明知伊格纳切夫“心殊叵测”，但又怕“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接近，万一衅启边隅，尤属不易措手”，^⑦因此，不敢拒绝他的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11页。

② 《伊格纳切夫侍从将军关于1860年使华期间外交往来呈送亚洲司的报告书》，1895年彼得堡出版，第254页。转引自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52页。

③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18页。

④ 易理逊：《一个译员在中国的日记》，1886年巴黎出版，第380—381页。转引自加迪：《法国在东亚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第260页。

⑤ 高第：《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第444页。

⑥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中国事务的通信（1859—1860）》，1861年伦敦出版，第210页。1861年1月2日，罗素训令额尔金转告伊格纳切夫：英国政府为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采取的“行动路线”，向他表示感谢。同时，英国女王也命令驻俄大使，为伊格纳切夫的“友好而体贴的行为”代表她本人向俄皇致谢。同上书，第251页。

⑦ 《始末》，咸丰朝，第67卷，第8—9页。

勒索，决定派尚书瑞常、侍郎宝璽、麟魁、成琦等前往俄罗斯馆谈判。

伊格纳切夫做贼心虚，要求中俄交涉秘密进行，以防英、法探知谈判的内容后出面干预，妨碍沙俄放手勒索。他威胁清政府说：“联军对我方与俄国之间的事情毫无所知，所以他们完全相信，全部滨海地区久已归属于俄国，而现在如果他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那末由于对我方嫉妬和不甘落后，他们会不顾业已签订的条约，而向你方提出新的要求。”^① 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经不起伊格纳切夫百般恫吓，只得同意。

10月27日，瑞常等赴俄罗斯馆与伊格纳切夫举行秘密谈判，表示愿意研究俄国公使提出的一切问题。伊格纳切夫当场交给瑞常三个文件：

- (一) 阐明俄国要求的实质的简明纪要；
- (二) 布多戈斯基私自测绘的所谓中俄东界地图；
- (三) 续约草案十五条。这些文件都译成了汉文和满文。^②

续约草案的主要内容为：

- (一) 划定乌苏里江、兴凯湖、绥芬河、图们江一带的中俄东部“边界”；
- (二) 中俄西界由沙宾达巴哈往西至斋桑湖，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 (三) 互派大臣前往，会同勘界立牌，以为凭据；
- (四) 开北京、张家口、库伦、齐齐哈尔、喀什噶尔五处为商埠，并在该地设立领事官等。^③

这个包括十五条的条约草案比伊格纳切夫前次提出的六条更广泛，更恶毒，而重点仍然是中俄东界问题。谈判开始前，昏庸的咸丰帝指示：“著即令瑞常等告以绥芬、乌苏里等处均照畸喆（奇集）、阔吞之例，借与该夷居住，此外俱不必提及，以杜其得步进步。”^④ 他虽未明言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仅说允许“借住”，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奕訢更是明目张胆地主张投降，认为“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⑤

为了严密封锁消息，俄方指定以固礼的房间为谈判地点，不许清朝大臣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23—224页。

② 同上书，第224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67卷，第55—56页。

④ 同上书，第67卷，第12页。

⑤ 同上书，第67卷，第56页。

去伊格纳切夫住所，因为那里常有第三国人来访。大部分谈判均由固礼和塔塔里诺夫出面，伊格纳切夫则在幕后操纵一切。以“恩人”自居的沙俄侵略者在谈判中穷凶极恶，“狡执异常，几于一字不能更易。”^① 瑞常等受尽种种屈辱，完全处于听人宰割的地位。他们不敢对俄方的主要要求提出异议，仅在个别次要问题上表示一些不同意见，企图维持清政府的“体面”。

11月上旬，英、法侵略军由于严冬将至，开始分批从北京撤退，这时伊格纳切夫急于结束谈判，又向瑞常等进一步施加压力。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清王朝的保护人，恬不知耻地宣称：“正是他而不是别人说服了联军将军队撤回天津”；一面大肆恫吓说，如果清政府不接受俄国的全部要求，他就要把英、法联军“召回北京”，这“对他说来也是最容易不过的；只需致函两国公使，说他们和中国签订的条约靠不住，需要修改，此事即可办到。”^②

为了促使清政府早日签约，伊格纳切夫同时还假惺惺地做了一些“让步”姿态，表示不再坚持开放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三处通商和在张家口设领事官，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居民仍准“留住原地”。在伊格纳切夫威胁讹诈、软硬兼施下，清政府走投无路，终于完全屈服。奕訢明明看出此约割地丧权，“貽患将来，何可胜言”；但他又说：“该酋以英、法之换约，攘为己功，设或迁延不定，恐致另生枝节。而英夷兵既未撤，法夷兵亦未尽回津。该夷等狼狽为奸，尤属变生意外。”倘若“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但于目前之患较少，不得不委屈允从，以便催令英酋退兵，俾京城根本，人心安定，以全大局。”^③ 这一饮鸩止渴的主张得到了咸丰帝的同意，11月8日颁发谕旨说：“事势至此，不得不委曲将就，免致（俄、英、法）狼狽为奸”，^④ 并准许奕訢签字画押。

1860年11月14日，奕訢赴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本约有俄、汉两种文本，汉文本系根据俄文本译出。全约共15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俄两国东部疆界，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到该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位于黑瞎子岛即抚远三角洲东北面的伯力城下）。黑龙江以北土地归俄国，以南到乌苏里江口的土地属中国。

① 《始末》，咸丰朝，第68卷，第14页。

②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30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68卷，第14页。

④ 同上书，第68卷，第17页。

然后，从乌苏里江口往南至兴凯湖，边界线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河东之地归俄国，河西之地属中国。又从松阿察河河源跨兴凯湖到白棱河，从该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布图河口，再从此沿琿春河和海之间的诸山到图们江口。此处仍是以东归俄国，以西属中国。边界线的终点在图们江入海处以上20华里紧靠图们江的地方。

上述划归俄国的地方系指空旷之地。如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处和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留住原地，照常渔猎。

(二) 中俄两国未经划定的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国常驻卡伦^①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往西直到斋桑湖，再由此往西南到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

(三) 由两国政府派出大员，会勘中俄东段和西段边界，然后交换地图和关于边界线的详细记文。同时应拟定议定书，作为本约的补充条款。

(四) 重申俄国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并规定两国边民免税自由贸易，中国增开陆路商埠喀什噶尔，准许俄国商人在库伦、张家口零星贸易，俄国得在库伦、喀什噶尔等处增设领事等。

这样，穷凶极恶的沙俄扩张主义者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事实上认可了它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瑗珲条约》；而且还将《瑗珲条约》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改为划归俄国，强行夺取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侵略者通过《北京条约》，还把擅自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强加于中国，把清政府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硬指为分界标志，把当时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沙皇俄国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条约中关于在库伦和喀什噶尔通商设领的规定，使沙俄得以将它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中国蒙古地区和新疆南部。

此外，这个条约还使沙俄获得了更广泛的陆路通商特权。当时有个旅居中国的英国人米琪（旧译立嘉），在评论中俄《北京条约》时指出：“中国的极端窘困就是俄国的机会。俄国外交的阴险狡诈，从未像这一次表现得如此充分。俄国公使一度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政府假装温情脉脉，并主动提出在日

^① 据条约俄文本，这里是“中国现有卡伦”字样，可是，俄国人从俄文译为汉文以后，这几个字却变成了“中国常驻卡伦”。“现有”和“常驻”一词之差，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详见本书第三卷。

益迫近的对外战争中给它以间接援助。可是，当他发现中国政府已经丧魂落魄时，就突然猛扑过来，向它提出种种的无耻要求，其中包括将全部满洲海岸和乌苏里江、黑龙江到日本海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中国人（指清朝政府——引者）无力反抗。为了帮助他们早作决定，俄国公使又‘温和地’通知说，如若不从，沙皇的报复将比他们正在受到的惩罚更加可怕。于是条约就签订了，俄国胜利了。”^① 米琪的评述，如实地描绘了沙俄威胁恫吓、强迫订立割地条约的情景。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大大小小的沙俄扩张主义分子眉飞色舞。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俄国代表巴布科夫高兴地说，《北京条约》“就其成果的重要性而言，就我国公使（他在极短时期内大大增强了俄国在华的作用）所采取的卓越行动方式而言，可以说是我国与中国皇帝政府外交史上空前的范例”。^② 穆拉维约夫更加抑制不住强盗的兴奋说：《北京条约》的签订是俄国的一大“政治胜利”、“喜讯”和“更为重要的新成就”，其收获“超乎我们期望之外”。伊格纳切夫为俄国“立下卓越功绩”。通过他强迫清政府缔结的新约，俄国“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深远影响”，“《璦琿条约》与《天津条约》业已得到确认，所有不足之处均得到补充，一切疑虑烟消云散——现在我国合法地占有了富饶的乌苏里地区及南部港口，取得了由恰克图进行陆路贸易（原文如此——引者）和在库伦与喀什噶尔设立领事官的权利。俄国人滴血未流，仅凭我国公使的外交才干，坚持不让……便取得了这一胜利。”^③ 沙俄军官布克斯盖夫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写道，伊格纳切夫的侵略使命“完成得非常出色”。清政府通过该约“承认阿穆尔边区和乌苏里边区，也即以乌苏里江、兴凯湖、绥芬、图们两河直到海边为界的广大土地全部为俄国所有，而……这片土地我们实际上是根本无权过问的。”^④ 沙俄御用学者巴尔苏科夫也情不自禁地欢呼：通过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中国彻底承认俄国占有通往东洋的康庄大道——黑龙江，以及辽阔富饶的乌苏里边区（它激起了人们对未来的无限美好的希望）的权利。……这样，俄国从开阔的黑龙江口一跃而至朝鲜半岛，并一举逼近了中国海。”^⑤ 这些沙俄侵略分

① 米琪：《从北京经西伯利亚到彼得堡的陆上路线》，1864年伦敦出版，第360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72页。

③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314—317页。

④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235页。

⑤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609—610页。

子和反动文人的自白，充分说明了中俄《北京条约》的强盗性质。

关于中俄《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苏联的出版物也早有明确结论。1950年版的《外交辞典》（维辛斯基主编）承认，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是由于1859—1860年英、法同中国的战争而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①就连1961年版、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②

中俄《北京条约》签字时，伊格纳切夫还拿出布多戈斯基私自测绘的地图一份，图上标明从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的两国“分界线”，要求奕訢一并画押。奕訢对此没有同意，他说：“此事不能凭尔国之图为据，既系两国分界之事，应于明春恭候大皇帝所派大员，携带地图，互相履勘明白。”^③

1860年11月17日，即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第三天，伊格纳切夫派巴留捷克携带条约正本，星夜赶回彼得堡报功。11月22日，伊格纳切夫也从北京动身，经库伦返回俄国。

第五节 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和《珲春东界约》的订立

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关于查勘中俄东界，双方代表应于1861年4月在乌苏里江口会齐办理。1860年12月9日，奕訢奏请简派大员前往查勘。同月末，咸丰帝指派仓场侍郎成琦为钦差大臣，于明春前往吉林，会同吉林将军景淳，办理乌苏里江分界事宜。^④

1861年2月2日，吉林将军景淳奏称，中俄东界，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一段界限分明，易于勘办，其余陆路交界部分，即从兴凯湖至图们江一段，情形复杂，山河交错，是这次“分界要地”，钦差大臣应亲自往勘。这一建议为咸丰帝所采纳。同日，咸丰帝指示成琦及早“亲至兴凯湖、图们江一带，与俄国使臣查明交界地方，不可落后。”^⑤

4月4日，成琦奉命从北京出发。11日，清政府以成琦、景淳的名义照

① 维辛斯基主编：《外交辞典》，第2卷，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344页。

② 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辞典》，第2卷，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498—499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69卷，第21—22页。

④ 同上书，第71卷，第5—6页。

⑤ 同上书，第72卷，第26页。

会俄国滨海省当局说：“分界要地，全在兴凯湖至图们江，其乌苏里河口，拟即责成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前往会办。本钦差大臣、钦差将军亲至兴凯湖一带候同俄国办理分界大员，秉公勘办。”^①

5月5日，成琦抵达吉林省城，与景淳会晤；6月7日，抵达兴凯湖西北，下营驻扎。11日，俄国全权代表滨海省省长卡札凯维奇、副代表布多戈斯基也来到兴凯湖西北，在土尔河口扎营，距中方代表住处三十余里，并“于湖岸安设大炮一尊，火枪三十余杆，随来俄兵不知确数”，^②蓄意用武装占领“表明所占据的地点是在（俄国）国界线内”。^③成琦等多次抗议，要求俄方离去，都被拒绝。双方原先约定6月15日在达连泡（距俄营10里）举行会议。但届时俄国代表托故不到，有意刁难。18日，成琦等被迫赴俄方营地，与卡札凯维奇等会见，开始了1861年的中俄兴凯湖会议。

谈判一开始，双方便在白棱河的方向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两国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河源跨兴凯湖至白棱河河口，再由该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因此，必须确定白棱河口的方位，才能解决中俄在兴凯湖和瑚布图河以北这两段边界线的具体分界问题。但是，成琦等遍查吉林所绘各图及早年所存吉林地图，只有白珍河，并无白棱河，即使依据伊格纳切夫交给奕訢的地图，也无白棱河，只有白志河。清朝代表认为白棱河即兴凯湖西南的白珍河。卡札凯维奇等奉行以实际占领支持外交要求的侵略方针，一口咬定位于兴凯湖西北、已被俄军强占的土尔河口就是白棱河口，蓄谋在松阿察河河源和土尔河口之间划一直线，以此线作为两国国界，从而将兴凯湖的大半圈入俄国版图。他们表面上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前来查勘分界，实际上却凭借武力，恣意勒索，企图割占更多的中国领土。

19日，卡札凯维奇派沙俄总参谋部军官图尔宾携带照会前来中方营地，又无理要求将松阿察河以西很远的穆棱河流域（即使按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它也完全在中国境内）作为“公共之地”，“意图展占”。成琦等指出，这一要求显与《北京条约》相悖，也不符合俄国自绘地图中所标示的分界线，俄方不应于条约之外，妄生枝节。图尔宾竟然声称：“和约、地图，

①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近代史研究所晒蓝本，第4册，上，第711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9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76页。

均可不必照依行事”，^①赤裸裸地暴露了俄方借口“勘界”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

21日，成琦派属员丁寿祺等赴俄营，与俄使约期相会。卡札凯维奇竟“按佩刀直视，意在以兵相胁”，随即声称，“明日来营与钦使、将军当面商议，自有道理”。^②22日下午，卡札凯维奇气势汹汹，带兵数十名至中方代表驻地继续谈判，“将枪兵向营门排立，按刀而入”。开议后，他又悍然要求“于琿春东岸设卡盖房，将琿春作为公共之地”。^③中方代表当即予以拒绝，“驳诘两时之久”，卡札凯维奇理屈辞穷，“无隙可乘”，才表示不再坚持将穆稜河和琿春地区作为两国“共管”。随后他再次提出白稜河问题，强要中方承认该河即土尔河。双方辩论很久，没有结果，卡札凯维奇竟采取威胁手段，“决定停止谈判，并从桌旁站立起来，准备退席。”^④成琦等面临土尔河口已被俄军侵占的既成事实，惧怕一旦谈判破裂，俄方将采取进一步的武力侵略行动，终于被迫让步，接受了卡札凯维奇的要求。

22日会议上，卡札凯维奇还借口兴凯湖以南“荒僻危险”，“实难行走”，提议“在兴凯湖行营，照依和约，将地图内未分之界用红色画断作记，绘图钤印。应立界牌，各差小官竖立。”成琦畏惧旅途艰苦，竟对这一别有用心“建议”欣然表示同意。他奏报咸丰帝说：“今核与该使所言，尚属符合。若强约该使前往，设道途阻滞，粮运不济，转致迁延时日，于事无益。……只得从权允于兴凯湖行营，照依该使所言办理。”^⑤这样，在中俄兴凯湖会议上，未经实地履勘就决定按照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地图即《北京条约》附图定议。

1861年6月28日，双方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同时签署、交换了《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规定自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设立“耶”（Е）、“亦”（И）、“喀”（К）、“拉”（Л）、“那”（Н）、“倭”（О）、“帕”（П）、“土”（Т）等界牌，并且未经履勘就预先确定设牌地点。这一文件完全由俄方一手炮制，成琦等只不过“照依誊写”、“画

① 《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10、13页。

② 丁寿祺：《海隅从事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3帙，第296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13—14页。

④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77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15页。

押铃印”而已。^①此外，双方还签署、交换了布多戈斯基炮制的《北京条约》附图。附图的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图上画了一条红线，粗略地标示两国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为界，并没有标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中俄兴凯湖会议前后开了10天，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在互换图约的次日，成琦即离开兴凯湖返京。设置界牌的工作，除土尔河（即俄方所指的白棱河）口的“喀”字界牌于6月27日由卡札凯维奇、成琦亲自竖立，乌苏里江口的“耶”字界牌于7月19日俄官吉成克会同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竖立以外，全由沙俄军官图尔宾等会同成琦指派的地方官员办理。总计从乌苏里江江口到图们江，共设置了8个极简陋的木制界牌，饰以油漆，牌上一面书写汉字，一面书写俄文。事后，俄方就立牌情况写了一份文件，名为《中俄设立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国界牌博记》，作为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的附件。

中俄兴凯湖会议是一次没有进行勘界的“勘界会议”，它使中国蒙受了更多的领土损失。在这次会议上，清朝官员在俄方的武力胁迫下承认白棱河即土尔河，从而使兴凯湖大半为沙俄所据有，兴凯湖西南岸的土地也相应划归俄国。设置界牌全凭俄人一纸《记文》和地图，具体勘界、立牌也全由俄人主持，名为两国共同办理，实由沙俄一手包办。参加这次勘界立牌工作的主要清朝官员吉勒图堪“由于鸦片烟瘾很重”，中途“精疲力尽”，竟然擅自离去，并按照图尔宾的荒诞要求预先具结，“声明一切界牌都是根据国界记录设置在各该地点的”，^②因而使俄方愈加为所欲为。以图们江一处为例，1861年《勘分东界约记》的附件《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具体规定，在“距图们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设置“土”字界牌。根据这一规定，沙俄从中国抢走了图们江出海口。但沙俄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上述议定书墨迹未干，他们又得寸进尺，竟在立牌时背信弃义地将“土”字界牌强行设置在距图们江口22俄里（约合46华里）的朝鲜城镇边梁子村对面，^③从而侵占了更多中国领土。

1861年以后，沙俄侵略者继续在乌苏里江一带进行扩张。他们卑鄙无耻地把界牌向中国一方挪动，“暗窃潜移”，不断蚕食我国土地，当地群众形象

① 《始末》，咸丰朝，第80卷，第7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80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地把这一侵略行径称做“马驮界碑”。^①例如，“拉”字界牌，原立于兴凯湖及穆稜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的平坡上，在薛家房子附近，后竟被俄人移到大顶子南岗二里处，距原地点北移 18 里余。其他界牌，也有被俄方擅自移动的情况。1881 年，吉林地方当局派员赴土尔河以南调查，发现边界线附近的宽阔平坦地面均被沙俄窃据，或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不等，强设兵营，拨兵驻守。1883 年，“俄人侵占珲春边界，将图们江东岸沿江百余里‘误’为俄国所辖之地，并于黑顶子地方安设俄卡。……珲春城与朝鲜毗连之地，大半为俄人窃据。”^②1883 年 4 月，沙俄侵略者进而在兴凯湖地区“越界设卡”。这一系列领土侵略活动，不能不引起清政府注意。1885 年 4 月 28 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奏称：中俄东界牌博“年深月久，形迹无存”，“界址湮失”，请速派大员往勘。^③同日，光绪帝（1875—1908 年）颁发谕旨，派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前往办理。同年秋，沙俄东西伯利亚当局照会吉林将军，同意重勘中俄东界，并约定于明年春季前往会勘。

1886 年 4 月 5 日，吴大澂自天津到达珲春，7 日照会俄国勘界委员会主席、滨海省省长兼司令巴拉诺夫，建议迅速开议。5 月 18 日巴拉诺夫带领勘界委员会委员舒利金、克拉多、马丘宁等人抵岩杵河（珲春城东面 60 多里处，在俄境内）。25 日，双方在岩杵河正式开始谈判。

这次会议，中方着重要求解决补立“土”字界牌和归还黑顶子问题。关于“土”字界牌，中方要求按照 1861 年条约，立于距图们江口 20 华里的地方。巴拉诺夫强词夺理，胡说“海口 20 里海水灌入之地，当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才算图们江口”，^④妄图把“土”字界牌立于距江口 40 里处。吴大澂驳斥说，海口即江口，指海滩尽处而言，“土”字界牌应按海滩尽处（即江口）向内 20 里处设立。对此问题，巴拉诺夫要求请示俄国政府后决定。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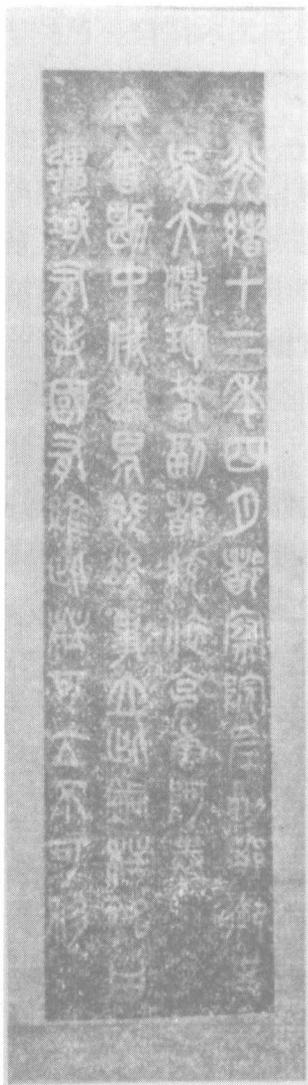
5 月 29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经过再三辩驳，双方达成妥协，决定将黑顶子归还中国，“土”字界牌设于沙草峰以南越岭而下之平冈尽处，从界牌顺图们江到海 30 华里，径直至海口 27 华里。新设界牌虽然比旧界牌距江口稍

① 魏声和：《鸡林旧闻录》，1913 年吉长日报社出版，第 1 册，第 3 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 57 卷，第 7 页。

③ 同上书，第 57 卷，第 9 页。

④ 吴大澂：《皇华纪程》，第 19 页。



吴大澂等会勘中俄
边界铜柱铭文

近，但与《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的规定比较，中国仍然蒙受了损失。

6月19日，吴大澂、巴拉诺夫等同赴沙草峰南麓十余里处，为竖立“土”字界牌掘土奠基。随后吴大澂并在长岭子中俄交界处添立铜柱，上面铭刻：“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①这两句铭文，反映了吴大澂对沙俄随意移动界标、蚕食中国领土的忧虑心理。

1886年7月4日，吴大澂和巴拉诺夫分别在中俄《珲春东界约》上画押钤印，彼此互换。随后，双方代表又考察了土尔河口以南的中俄边界，增立“啦”（P）字、“萨”（C）字和“玛”（M）字界牌，并于7—10月就这段边界线先后签订6个勘界议定书，总称《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此外，在中俄岩杵河会议期间，吴大澂鉴于图们江口已被沙俄占据，曾要求俄方允许中国船只自由出入江口。巴拉诺夫表示可以考虑，但此事须请示本国政府才能决定。后经双方商定于《珲春东界约》中写明：关于中国船只自由通过图们江口问题，“巴拉诺夫少将已将此点提交俄国外交部审理，待得到答复后，对本议定书再行补充。”不久俄国外交部电告巴拉诺夫：“图们江口中国船只出入，俄国必不拦阻”^②，并于同年10月12日由俄国地方当局正式向中国地方政府递交内容如上的照会，作为《珲春东界约》

^① 梅文昭：《宁安县志》第1卷，第40页；徐宗伟：《珲春乡土志》，1935年抄本，上编，第39—43页。铜柱铭文拓本高4.15公尺，宽1.03公尺。此铜柱在1900年竟为俄人“碎为两段”，移至伯力，公然陈列于博物馆中。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69卷，第15页。

的附件。

这次重勘中俄东界，至此全部结束。总的来说，“此次界务交涉，不过奉行成案”，^①进一步肯定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东界约记》而已。当时英国强占了朝鲜南部的巨文岛，英、俄之间因争夺朝鲜形成很尖锐的对立。沙俄企图利用清政府对抗英国，因此才在归还黑顶子、图们江口行船等问题上，对中国做了一些微小的“让步”。

第六节 沙俄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殖民统治和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

列宁指出：“俄国即使在平时时期，在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基础上也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②“沙皇政府比任何专制魔王更厉害地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③沙俄武力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国土后，疯狂地推行民族压迫、殖民掠夺直至灭绝居民的罪恶政策，将这个地区变为无比黑暗的殖民地。

沙俄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统治，是赤裸裸的军事殖民统治。旧俄学者亚德连采夫供认：“在征服异族人之后”，沙皇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平定他们的暴动”，“进行强制的管理”，^④即实行公开的武力镇压。沙皇政府继续不断地向这个地区派遣大批武装哥萨克，到处建立军人村屯和军事据点，在战略要地如海兰泡、伯力、庙街、阔吞屯、海参崴、双城子（尼古拉斯克，现称乌苏里斯克）、苏城、克默尔湾（迭卡斯特里湾）、兴凯湖西面的红土崖等地驻兵，^⑤建立和强化军事占领体制。沙俄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各级殖民政权实行军政合一制。例如，1884年成立的阿穆尔总督辖区（下辖外贝加尔省、阿穆尔省、滨海省和库页岛，首府设在伯力），首任总督科尔弗就是一个

① 刘爽：《吉林新志》，1931年辽东编译社出版，上编，第6页。

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4页。

③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8页。

④ 亚德连采夫：《西伯利亚殖民地三百周年纪念：它的现状、需求、过去和未来》，1882年彼得堡出版，第87页。

⑤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1900年彼得堡出版，第250页。

职业军人。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当地人民实行最野蛮的统治和镇压。往下的各级殖民政权，都照此模式办理，形成了一整套压在当地居民头上的军事官僚殖民机构。

在沙俄的军事殖民暴政下，俄国殖民者疯狂推行“边区俄罗斯化”的政策。强制同化和军事镇压，是这根棍子的两端。俄国殖民政权一方面迫使当地居民改用俄罗斯姓名，用俄罗斯语言，穿俄式服装，改奉俄国东正教，同时使用种种残暴手段，对当地居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整肃”，^①许多当地居民遭到非法逮捕，解送僻远地区服苦役，驱逐和“劫杀华民之案，层见叠出”。例如，1881年，沙俄无故“逐去石头河民数十家”，“焚烧房屋，蹂躏田禾”；并在秦孟河一带“驱逐沟民”；在八道河，俄军十余人野蛮地残杀当地居民8名，“焚烧房屋，抢掠财物粮石”。同年，沙俄在昂邦毕拉地方强抓华民68名，“痛行鞭打，迫赴萨噶林（库页岛）”挖煤，“华人抵死不前”，有的人竟被沙俄殖民者“用棉包指，蘸油烧死”。^②1884—1885年，沙俄殖民者又在秦孟河、苏城沟、海参崴等地“驱逐华民”，“火其庐舍，收其田里，迁俄民安受其成”。^③华民不堪其虐，“散处他处”。^④1886年，沙俄殖民当局又悍然禁止汉、满居民在边境区50俄里内居住。上述种种措施，目的都在于在这一地区人为地“增加俄罗斯族居民，减少黄种居民”，^⑤使这个地区“具有纯俄国的面貌”。^⑥

在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沙俄军事殖民当局不顾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关于“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的规定，大肆掠夺当地居民的土地，无偿地赏赐给哥萨克官兵、新来的俄罗斯“移民”和东正教会，借以在该地建立保障沙

① 纳达罗夫：《北乌苏里地区》，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第27册，1887年彼得堡出版，第125、135页。

② 李金镛：《瑛牍偶存》，《浙学庐丛书》本，第2、4、7、8、13、14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57卷，第9页；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1、38页。

④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28页。

⑤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第309页。沙俄学者承认：1885年后，乌苏里地区的“蛮子”人数开始“急剧地下降和明显地减少”。见什列伊杰尔：《我们的远东（乌苏里边区三年）》，1897年彼得堡出版，第54页。

⑥ 纳达罗夫：《乌苏里地区的异族居民》，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第26册，1887年彼得堡出版，第144页。

俄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这是推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又一重要内容。按照沙皇政府的规定，哥萨克军的校官每人可占地 400 俄亩，尉官 200 俄亩，士兵 30 俄亩，神职人员 99 俄亩。^① 在可耕地不足之处，3 俄亩森林折合 1 俄亩耕地。^② 每个“移民”占地不少于 15 俄亩。^③ 实际上，俄国哥萨克和“移民”掠夺的土地远远超过此数。例如，1894 年阿穆尔哥萨克每个男子平均获得 860 公顷的可耕地、牧场和森林。^④ 据统计，1865 年，仅阿穆尔哥萨克军的占地即达 475170 俄亩，^⑤ 1894 年跃增至 14827800 俄亩。^⑥ 这样，当地居民的大量耕地、牧场和森林被沙俄殖民者强占。1882 年 2 月，俄国殖民当局颁布经沙皇批准的殖民条例，进一步规定非经总督批准，“异族人”无权在阿穆尔省、滨海省获得土地。^⑦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千方百计地鼓励俄罗斯移民前来屯垦，并于 1882 年 6 月决定，自 1883 年起，凡从欧俄经海路到滨海省的移民，除照旧拨给每人 15 俄亩耕地（每户 100 俄亩）外，可免除欠缴的一切税款，5 年内免缴赋税，并由国库无偿地拨给迁移费和安置费。^⑧ 结果，移民人数由 1859—1882 年的平均每年 601 人，剧增到 1883—1899 年的平均每年 4076 人。^⑨ 俄国殖民者足迹所至，到处肆虐，“并占熟地，不准耕种”，^⑩ 迫使当地居民四处流亡。这些俄罗斯移民越多，当地居民被剥夺的土地就越广。就连沙俄侵略分子阿尔谢尼耶夫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向乌苏里边疆移民的巨浪，排挤了汉人、朝鲜

① 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编：《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哥萨克部队土地和经济条例资料》，1902 年彼得堡出版，第 1 册，第 68 页；第 2 册，第 1、3 页。按：1 俄亩=1.09 公顷。

② 同上书，第 2 册，第 10 页。

③ 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编：《西伯利亚的殖民与一般移民问题》，1900 年彼得堡出版，第 185—187 页。

④ 里亚鲍夫、斯坦因：《俄国远东史纲》，1958 年伯力出版，第 126 页。

⑤ 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编：《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哥萨克部队土地和经济条例资料》，第 2 册，第 59 页。

⑥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 87 页；里亚鲍夫、斯坦因：《俄国远东史纲》，第 126 页。

⑦ 沙霍夫斯科依：《南乌苏里地区的私有地产》，1899 年彼得堡出版，第 6、9 页；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 116 页。

⑧ 罗佐夫：《环球旅行：从莫斯科到黑龙江和西伯利亚》，1889 年莫斯科出版，第 203—204 页；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编：《西伯利亚的殖民与一般移民问题》，第 185—187 页。

⑨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 95 页。

⑩ 李金镛：《琿族偶存》，《浙学庐丛书》本，第 15 页。

人和异族人”。^①

沙俄军事殖民当局还向当地居民强征名目繁多的捐税，主要是“人头税”和毛皮实物税。最初，“人头税”的征收范围限于城镇居民，以后逐步扩大，到1888年6月，俄国枢密院批准科尔弗的建议，进一步对当地汉、满居民普遍地强征“人头税”。^②毛皮实物税的数额，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每户每年至少得向殖民当局缴纳貂皮两张；黑龙江以北地区每户每年缴纳数约合15—40卢布，“不但数额过高，而且无章可循”，漫无限制，以致纳税者被迫举债，年长日久，无法清偿，渐渐沦为俄国人的债务奴隶。^③沙俄学者格鲁兹捷夫正确地指出：哥萨克带给当地居民“一个令他们痛恨的字眼：‘实物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把土著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④“正税”之外，沙俄殖民当局还巧立名目，肆意强征各种杂税。这些杂税比正税更加残酷无情，不容拖欠，而且任意追加税额，结果不能不破坏居民的生活。^⑤就连有些苏联著作也承认：在沙俄殖民统治下，俄国的“官长、总督、警官、警察、村长，以及各种捐税，像雨前突然出现的蚋群一样纷至沓来，使人不堪重负！贫穷与苛税，一开始就来到黑龙江人间！”^⑥

自诩为“文明传播者”的沙俄殖民者，还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梅毒、天花等“文明”的传染病。当地人“由于天花而极快地灭绝。有的村落在几昼夜间死得一个不剩。在俄国人到来以前，鄂伦春人并没有这种病。”“同鄂伦春人一样，乌苏里的赫哲人也几次染上了大规模的流行病。”由于得不到任何治疗，“这些病使他们骇人地大批死亡。”^⑦此外，在北部地区瘟疫也“夺去了大批人的生命”，“由俄国人带来远东的梅毒”，更“加速了异族人的退

①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33页。又：翁特贝尔格也承认，俄国移民“一旦定居下来，总是用各种办法占据中国人的已耕地”。被排挤的中国人“或逃过边界，更常见的是逃往其他更远的地方，主要是逃往苏城河以北，流入鞑靼海峡的诸河流一带。”参见《滨海省（1856—1898）》，第86—87页。

②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1958年加利福尼亚出版，第25—26页。

③ 《阿穆尔省的居民》，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第327—328页。

④ 格鲁兹捷夫：《阿穆尔》，第120页。

⑤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158—159页。

⑥ 索尔恩采娃：《乌苏里的曙光》，载《阿穆尔——功勋之河》，1970年伯力出版，第388页。纳罗奇尼茨基也承认：“黑龙江地区的居民，深受渗入该地的俄国商人、富农和沙皇官吏的剥削。”参见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128页。

⑦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34页。

化”。^① 俄国殖民者还采用西方殖民者对付美洲印第安人的经验，用酒精来进行不见血的谋杀。格鲁兹捷夫指出：“整个黑龙江的异族人面临着悲惨的未来：他们注定要被消灭。在那些与（俄罗斯）文明接触的地区，他们灭绝的过程特别迅速。这种文明以其坏的一面对他们施加有害的影响。最致命的是伏特加酒。各色唯利是图的商人，先用它毒害贫穷的异族人，然后，由俄国人带来的疾病又摧残他们。”^② 旧俄学者布图尔林也说：俄国殖民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所传播的“文明”，“不过是烈酒、梅毒和贸易上的欺骗而已”。^③

由于沙俄当局系统地推行空前残酷的民族压迫、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政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当地各族居民人数逐年减少，有的民族甚至濒于灭绝，^④ 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⑤

19世纪到过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等地的俄国作家契诃夫写道：俄国滨海省以及整个俄国东海岸都是“令人可怕的贫困”，“陷入绝境”；黑龙江上下一片凄凉，人们“开始了呻吟”。^⑥ 这是对沙俄殖民政策的有力控诉。

然而，被压迫与被损害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当地居民不只是“呻吟”而已，他们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沙俄殖民暴政的英勇斗争，予沙皇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这一斗争，从沙俄殖民者侵入这片中国领土之日起，事实上就已经开始了。

早在1852年初，黑龙江口一带的费雅喀族和满族人民，就准备进行武装反抗，消灭涅维尔斯科依一伙入侵之敌。虽然这次反抗活动因事机不密，被扼杀于酝酿之中，但当地人民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使沙俄侵略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得不层层设防，以“防范基立亚克人的袭击”。旧俄学者巴尔苏科夫供认，当时侵入这一地区的沙俄强盗“都害怕基立亚克

①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第199—200页。

② 格鲁兹捷夫：《阿穆尔》，第118页。

③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38页。

④ 索利亚尔斯基：《阿穆尔地区异族目前的法律和文化经济地位》，1916年伯力出版，第169—170页；希姆克维奇：《阿穆尔省和亨滚河流域异族人现状》，载《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会员著作集》，1895年出版，第3页。

⑤ 远东革命委员会土著管理分局编印：《远东土著问题资料》，第1集《远东土著民族现状》，1924年赤塔出版，第14页。

⑥ 《契诃夫文集》，第11卷，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482—483页。参见《阿穆尔——功勋之河》，第30、513页。

人（费雅喀）”。^①

1854年沙俄侵略军大举入侵黑龙江时，由于“不悉路径”，强迫赫哲族渔民引路，遭到坚决拒绝。^②

1857年10月，俄军200余人乘船溯黑龙江入松花江口，沿江上犯。吉林将军景淳派兵驾船迎阻，紧追60余里；赫哲族居民闻讯后，速驾桦皮小舟前来拒敌，赤手空拳与俄军搏斗。清政府官员乘势登上俄船，提出强烈抗议，并将其布蓬扯落。俄军“俯首无词”，被迫折回。^③

在沙俄武装侵占黑龙江以北的整个过程中，当地各族人民或断然拒绝向俄军交售粮食、牲畜，或协同清军守卫卡伦，“拦阻外夷侵占内地”^④，或志愿帮助侦察敌情，传送消息，表现了坚强的反侵略决心。

沙俄侵略军侵入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东北边疆人民对敌人的“凶焰横恣”无比愤怒，“志切同仇”，纷纷组织起来捍卫祖国领土。吉林地区“各处城乡，按牌团练，精壮丁夫，自固闾阎……众志成城”，反侵略热情无比高涨。^⑤

1859年冬，分布在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刨夫”，见“俄夷前往履勘地势，插立标杆”，任意占我领土“是欲绝我生路”。他们“同仇敌忾”，自动组织抗俄武装，至1860年春聚集了万余人，于小绥芬及琿春以东近海的玛延河、苏城等处设营150余座，星罗棋布，随时准备抗击俄军。^⑥

同年，清军中的爱国官兵把沙俄在兴凯湖西岸、北岸擅自修建的房舍和牧草数千堆全数焚毁；^⑦并向俄国侵略军发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撤离该地”，否则将“成为饿殍”，或“亡于利剑之下”。^⑧

中国广大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使沙俄十分恐惧。1860年6月，穆拉维约夫悍然下令对“敌视俄国”、“有不轨行为”者，采取“武力手段与严厉措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302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8卷，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7卷，第7—8页。

④ 同上书，第52卷，第7—8页；第45卷，第15—16页。

⑤ 同上书，第44卷，第2—3页。

⑥ 《清文宗实录》，第307卷，第13页；《始末》，咸丰朝，第48卷，第4页；第50卷，第11—12页。

⑦ 《始末》，咸丰朝，第52卷，第10页。

⑧ 穆拉维约夫：《致哥尔查科夫公爵》，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95页。

施”，并“派遣兵船沿乌苏里江直至兴凯湖一带巡航”，^①蓄意将当地人民投入血泊之中。

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后，当地人民不愿做沙俄殖民者的奴隶，大批返回祖国内地。例如，黑龙江北岸的赫哲族居民 269 人，“始终不忘根本”，“不肯甘从外夷”，于 1860 年自动迁回松花江一带居住。^②同年，原住乌苏里江以东苏城一带以渔猎为生的恰喀拉族居民数百人，因“俄夷骚扰，日不安身”，也迁到珲春居住。^③汉族居民迁回祖国内地的人数也很多。俄国学者不得不承认：“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对祖国的热爱”，不少人自动迁徙到乌苏里江西岸。^④

留居被割占地区的各族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向沙俄殖民政权进行猛烈的反击。1868 年乌苏里江以东中国居民抗击沙俄殖民者的斗争，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次武装抗俄斗争是由沙俄殖民者迫害和驱逐青岛（阿斯科尔德岛）淘金工人引起的。青岛位于海参崴东南约 100 里的海上，出产金砂，当地中国居民主要以淘金为生。沙俄侵占海参崴后，对岛上砂金十分眼红，竟不顾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俄国不得侵占中国人住处的规定，于 1867 年冬从海参崴派军强行登岛，驱逐中国居民。岛上居民被迫抵抗，击退了全副武装的沙俄殖民强盗。

1868 年 5 月 1 日，海参崴殖民当局再次派海军大尉埃托林率水兵乘“阿留申人”号兵船在青岛强行登陆。岛上居民早已严阵以待。敌人刚爬上岸，突闻枪声四起，弹石横飞，埋伏的群众数百人一齐冲杀出来，聚歼来犯之敌，当场打死打伤敌人过半。^⑤沙俄殖民强盗遭受重创后，急忙从海参崴等地调来兵船支援，围攻青岛。淘金工人们顽强战斗，终因力量悬殊，被迫转移。

青岛起义者到达大陆后，主动出击，“将黄岛、石庙子、蛤蚂塘一带俄

① 穆拉维约夫：《致阿穆尔省驻军司令先生》，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 2 卷，第 292 页。

② 《清文宗实录》，第 318 卷，第 11 页；《始末》，咸丰朝，第 52 卷，第 9 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 50 卷，第 12 页。

④ 布谢：《乌苏里地区》，载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 12 卷，第 2 分册，第 413 页。

⑤ 马特维耶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1910 年海参崴出版，第 30 页。

卡焚毁”，将守卡俄军杀死，^①并联合苏城等地人民，扩大抗俄武装，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了二三千人，计划直捣沙俄在乌苏里江以东的殖民巢穴海参崴，“将俄人逐出边区”。^②沙俄殖民者闻风丧胆，一面逮捕中国渔民数十人，诬指为“匪”；一面火速驰报东西伯利亚总督求援，并照会清政府，要求出兵会同“剿办”。五月中旬，沙俄绥芬地区与海参崴驻军分别发布命令，悍然宣布“处于战争状态”，要求当地所有俄国殖民者闻讯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待命。^③不久，沙俄占领军向双城子附近近千名起义者发动猖狂进攻，起义群众被迫转移到中俄边境地区。^④6月上旬，东西伯利亚总督又宣布全乌苏里驻军处于“战争状态”，随后，沙俄滨海省省长下令在海参崴组织特种法庭，非法审讯被捕的起义者。^⑤

这时，清政府继续奉行投降媚外政策。它害怕“启衅邻封，致滋借口”，竟接受俄方要求，以“绥靖边境”为名，命令吉林将军富明阿将转移到珲春境内的抗俄义士“尽数剿除”。^⑥富明阿派遣宁古塔副都统乌勒兴阿“过界亲赴摩阔崴；找向俄酋，和衷议办”，并向俄方保证“所有被击逃出者，我兵务必截杀净尽”。^⑦这样，沙俄殖民者和清朝统治者，由于反人民的共同阶级本质，相互携起手来，使起义队伍腹背受敌，陷入重围。7月，宁古塔地区清兵奉命出动，血腥屠杀进入国境的抗俄群众。这一轰轰烈烈的抗俄斗争，终于被中外反革命联合绞杀了。

沙皇政府的屠刀可以消灭起义志士的肉体，但是无法扑灭人民仇恨和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的烈火。起义失败后，当地居民继续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在沙俄殖民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中国居民自行组织起来进行管理，公推沟

① 《始末》，同治朝，第58卷，第27页。据俄籍记载，在秦孟河、绥芬河下游一带被起义者焚毁的俄国殖民据点有尼古拉斯克、绥芬斯克、什科托沃等处。参见普尔热瓦斯基《乌苏里地区旅行记（1867—1869）》，1937年莫斯科出版，第79页；什列伊杰尔：《我们的远东（乌苏里边区三年）》，第358页。

②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第190页。

③ 马特维耶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第32页。

④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第190页。

⑤ 马特维耶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第33页。据同书记载，9月初，该法庭宣判将15名被捕的起义者押往库页岛作苦役，另将43名嫌疑者押送出境。另据什列伊杰尔《我们的远东》一书载，有18名起义者被沙俄海参崴当局处决，参见该书第358页。

⑥ 《清穆宗实录》，第232卷，第4—5页。

⑦ 《始末》，同治朝，第60卷，第21页。

长，负责行政、司法事务，议定物价，裁决内部纠纷和各种刑事案件。^① 阿尔谢尼耶夫承认：在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很久以后，许多中国居民仍旧“依照自己的法律，过着独立的生活……”。^② 19世纪80年代到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考察”过的沙俄军官纳达罗夫也说，乌苏里江以东的华民“全都不服从俄国政权”。^③ 1885年曾到过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政府官员曹廷杰也证实：伯力、乌苏里江以东的各族居民向往祖国，“恶俄甚严”，“无愿随俄者”。^④

被侵占地区的中国居民坚决抵制沙俄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使用中国历法，并开办学校，教授中国历史等课程，^⑤ 表现了对祖国的无比热爱。

从19世纪80年代起，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人民的抗俄斗争又出现新的高涨。1880年，海参崴以东的苏城、秦孟河、大小乌湖、苏子河等地的中国居民，因沙俄无理搜缴枪械，“聚集至五六千人，意图与俄抵抗”；沙俄当局竟将商民财物枪支“一概查搜羁禁为质”，并添兵守卡，将华民逐出。^⑥ 1882年沙俄实行新的移民条例后，苏城一带居民，为保卫家园，同大批涌入的沙俄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流血斗争。^⑦ 1888年，双城子附近的中国居民，为反对沙俄强行征收人头税，再次奋起反抗，捣毁了一些俄国殖民村屯。^⑧ 事实证明：直到很晚的时候，沙俄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殖民统治还是很不稳固，殖民者仍然处于不屈从于沙皇政府的广大居民的包围之中。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各族人民，为了捍卫祖国领土，反对沙俄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坚韧不拔，不畏强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同万恶的沙俄殖民强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抗俄事迹，永远受到人们的纪念。

① 普尔热瓦斯基：《乌苏里地区旅行记（1867—1869）》，第74页；纳达罗夫：《北乌苏里地区的异族居民》，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第26册，第137—138页。

②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84页。

③ 纳达罗夫：《北乌苏里地区》，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第27册，第129页。

④ 曹廷杰：《西伯利亚偏纪要》，《辽海丛书》本，第36页。

⑤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第90—91页。

⑥ 《清德宗实录》，第112卷，第7页。

⑦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第86页。

⑧ 叶利谢夫：《沿南乌苏里边区》。转引自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1881—1904）》，第26页。

第四章

沙俄镇压太平天国 革命的罪恶活动

1851—1864年，中国人民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①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在华侵略势力。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最高峰，也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太平军出广西，经湖南，1853年1月攻克武昌，随即誓师东下，向长江下游进军。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感到他们的侵略利益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开始策划实行武装干涉，准备对太平天国革命下毒手。但是，太平军3月19日占领南京的巨大胜利和清朝统治在长江流域的土崩瓦解，迫使外国侵略者不得不改变策略。1853年4月以后，英、法、美三国先后宣布所谓“中立”。正如毛主席所说：“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②外国侵略者虚伪地宣布“中立”，其目的正是为了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这时，沙皇俄国正积极推行武力侵华政策，不断吞噬中国东北、西北领土。它从仇视国内外一切革命的反动阶级本性出发，一开始就蓄谋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并乘机控制清政府，巩固和扩大沙俄在华的侵略权益。1851年10—11月，当太平军尚未打出广西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就迫不及待地两次向沙皇政府表示：“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对我国贸易以及我国全部对华关系都

^①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402页。

^②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081页。

有害无利，因此我衷心祝愿中国皇帝迅速平息骚乱，恢复秩序”，^① 并建议“根据俄国一贯支持他国合法政府平定叛乱的对外政策”，给清政府以必要的“援助”。^② 1852年3月，他根据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提供的情报，又向沙皇建议，应利用“中国皇帝的困难处境”，致书清政府“表示乐于援助”，以便诱使“中国皇帝在逃亡时请求俄国庇护”。^③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革命几有直取北京、席卷全国之势。沙俄担心中国革命危及对华贸易，并引起贝加尔湖地区各族人民举行抗俄起义，立即于1853年6月间照会理藩院，对中国的局势公开表示“不安”，切望清政府“疆域肃清，中外并受其福”，同时威胁说：“在骚乱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假如蒙古真的发生某种动乱，我们由于同该地毗邻，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漠然置之”。^④ 同年12月，沙俄外交大臣指示西西伯利亚总督密切注视中国西部各省事态的发展，准备把喀什噶尔、伊犁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⑤ 次年1月，沙皇政府决定大举武装入侵黑龙江。显然，沙皇政府企图以帮助“平叛”、防止“骚乱”扩大为由，来实现其宰割中国的野心。

为了绞杀中国革命和乘机掠夺中国土地，沙俄外交部曾于1853年5月密谋策划，考虑派遣军队“取道”蒙古、满洲，或由海路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可能性。^⑥ 1854年1月，穆拉维约夫也向沙皇提出“出兵协助”清廷、迫使它接受“俄国保护”的主张。^⑦ 同年5月，他指示前往北京递送照会的札博林斯基上校：到达北京后，应向清政府说明，关于“参加军事平叛”问题，俄国认为：“由松花江经满洲是实行这一支援的最近便的道路”。^⑧

沙俄的诡谋，立即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注意。1853年7月10日，美国驻

①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1卷，第298页。

② 同上书，第295页。

③ 穆拉维约夫：《上皇帝疏》，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90页。

④ 《始末》，咸丰朝，第6卷，第32页；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5页。

⑤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5—186页。

⑥ 同上书，第183—184页。

⑦ 穆拉维约夫：《根据政府意图改进同中国交涉办法条陈》。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112—113页。

⑧ 《俄国旧事》，1883年6月，第640页。转引自胡世泽《近代中俄关系的条约根据》，第246—247页。

华代表马沙利向国务卿马西报告：“俄国在俄中两帝国的边境配置着大量部队，它能够轻而易举地开进中国；正在香港的一支俄国舰队……可以毫无困难地采取有利于皇帝的行动”，“它的帮助结果可能使中国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并使俄国的边界扩展到黄河或长江口”。^①次年1月，法国外交部也训令驻华代表布尔布隆注意俄国在华的动向。3月8日，布尔布隆从澳门向法国外交部报告说，他深信俄国政府将乘清帝国之危，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如果欧洲局势允许，俄国将“通过（进行）有利于清王朝的干涉行动，在那里谋得决定性的影响”。^②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初期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迫使沙俄未敢贸然实行武装干涉。它甚至一度考虑在清政府被革命人民推翻的情况下，派员“同中国新政府进行一些会谈”，诱使太平天国承认它在华的既得权益，“并取得某些新的权利”，让俄国的势力伸入中国沿海各口。^③另一方面，当时沙俄正忙于侵占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同时在西方与英、法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因此也只好暂时采取“中立”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一齐加速了侵华步伐。当时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下，危机四伏。西方侵略者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企图用武力逼迫清政府屈服，并在此基础上与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沙俄对清政府也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一面趁火打劫，大肆掠夺领土，一面以提供“援助”为饵，诱使清政府上钩。

还在1856年2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指示穆拉维约夫，如清政府满足俄国的领土要求，可给予若干大炮。^④同年12月，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奏请沙皇批准，决定派遣两名军官来华，帮助清政府“加固首都工事”，“击退叛乱者”。^⑤接着，1857年3月，沙皇政府于派遣普提雅廷出使中国前夕，指令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向理藩院表示：值此清政府“内忧”外患期间，俄国

①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0—1862）》，第1辑，第4卷，第68—69页。

② 高第：《第一个法日条约》，载法文《通报》杂志，1912年（第13卷），第217—218页。转引自胡世泽《近代中俄关系的条约根据》，第245—246页。

③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6页。

④ 塔吉谢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传》，第1卷，1911年彼得堡第2版，第252页。

⑤ 哥尔查科夫奏稿（1856年12月20日）。转引自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从十六世纪末至一九一七年）》，第1卷，1973年莫斯科出版，第97页。

在派遣使团来华的同时，“准备给以援助，既有道义上的援助，也有部分包括武器和炮弹在内用来对付国内敌人的物质援助”。^① 随后，沙俄外交大臣又指示普提雅廷必须履行已向清政府许下的诺言，“帮助”组织、武装和训练清朝军队。8月间，普提雅廷到达天津，立即向清政府赤裸裸地表示，他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欲迅速代平叛逆”。^② 这表明，沙皇政府已准备撕下“不干涉内政”的伪装，公开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了。

这时清政府对于沙俄主动提供“军援”、“代平叛乱”一事，还有疑虑。一些高级官吏援引历史上引狼入室的惨痛教训，认为接受沙俄的“援助”必将导致丧失独立和清廷倾覆，竭力反对。^③ 咸丰帝当时也不赞成借助外力镇压太平天国。^④ 因此清政府复照俄国，婉言谢绝。

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普提雅廷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援助”军火和派遣教官的建议。同年底，沙俄政府决定派以伊格纳切夫为首的“军援团”运送大批军火来华。在1859年2月沙俄外交部给伊格纳切夫的训令中强调：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交战双方互有胜负”，王朝更替仍有可能。“问题在于，从前的（明朝的）或新的中国王朝当权对我们更为有利呢，还是由满人保持王位更为有利”。“所有的条约，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起的某些外交往来，直至最近的两项条约，都使我们要感谢现在的王朝”。所以，“最好是让现在的满人保持中国的王位”。但不论如何，“应当努力”对满洲、蒙古、新疆“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以便在时机成熟时，使它们“脱离中国”，“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⑤ 这就是说，伊格纳切夫受权贯彻普提雅廷的计划，积极干预中国内政，站在清政府方面，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伺机吞并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的辽阔土地。

清政府原先不知道此项“援助”附有交换条件，曾表示可以接受，但是不久获悉俄方提出以批准《瑗珲条约》和签订新的割地条约作为“赠送”枪

^① 1857年2月9日俄国亚洲司司长给驻北京传教士团首领的公函。转引自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1页。

^② 《始末》，咸丰朝，第16卷，第13页。

^③ 巴拉第致穆拉维约夫函（1857年10月27日）。转引自《远东国际关系（从十六世纪末至一九一七年）》，第1卷，第98页。

^④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第168页。

^⑤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8—199页。

炮的条件，即于1859年4月予以拒绝^①。沙俄方面鉴于中国正在与英、法作战，生怕清政府利用俄国的“军援”对抗英、法，以致影响俄国与英、法的关系，也决定将正在运送途中的武器弹药留在东西伯利亚，交沙俄侵略军使用。所以，当穆拉维约夫听到西方误传1859年6月英、法联军大沽口的惨败，是俄国援助清政府的结果时，立即指出：“这种说法显然荒谬已极”，并建议俄国亚洲司司长在报纸上辟谣。^②直到1862年4月，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还向英国外交人员作证：“这些武器仅和镇压叛乱有关”；^③“当交付武器的时间来到时（指1859年），中国与英、法的战争正迫在眉睫，俄国政府不认为这是向中国运送武器的适当时机，因此将它们扣留至今。”^④这就有力地说明了俄国向清政府提供军援的真实用心。

随着1860年《北京条约》的订立，投降派在清政府中越来越占据上风。他们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决心借助外力帮助来消灭人民革命，并提出“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⑤的卖国方针。在侵略者方面，为了巩固和扩大侵略权益，也纷纷撕下“中立”的面纱，公开从军事上支持清朝政权，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样，双方的共同利益使它们有了进一步勾结的可能。

中法《北京条约》签字后，法国专使葛罗首先向奕訢表示：“愿为中国助剿发逆”。^⑥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不甘落后，于中俄《北京条约》签字当天，面告奕訢：“中国发捻横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并要求将1858年原定“馈送”清政府的枪炮送来。^⑦11月19日，他向奕訢辞行时正式提出“助剿”计划，说：“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同时提议由俄、美两国帮助清政府把江南漕粮用船运往北京（用俄、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9—10页。

② 穆拉维约夫：《致科瓦列夫斯基》，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第275页。

③ 米琪：《阿礼国传》，第1卷，1900年伦敦出版，第3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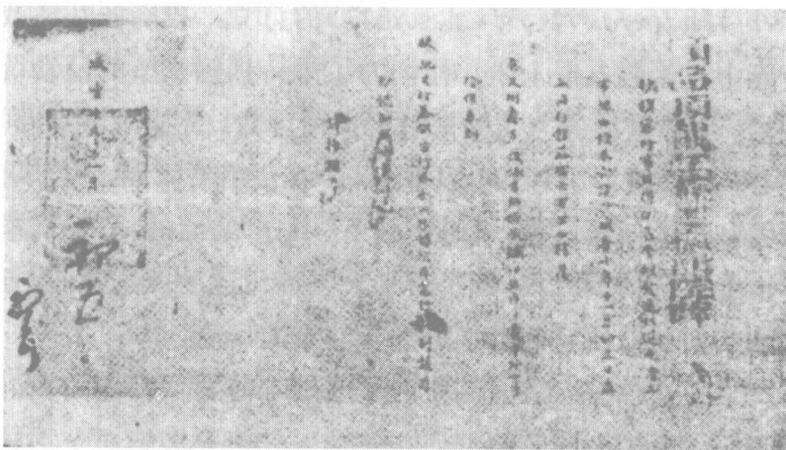
④ 芮尼：《北京和北京人》，第2卷，1865年伦敦出版，第319页。

⑤ 《始末》，咸丰朝，第79卷，第17页。

⑥ 夏燮：《中西纪事》，第20卷。

⑦ 《始末》，咸丰朝，第69卷，第22页。

美旗帜)。^①后又诡秘地说:可“于江面协同剿贼,惟不可令英、法知之”。^②但是,风声还是传到了英国人耳中。为了防止沙俄在这桩有利可图的交易中跑在前头,英国决定出面干涉。1861年1月,英驻华使馆人员威妥玛威胁奕訢说:“剿贼本系中国应办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于彼何利?非独俄佛(法)克复城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必不据为已有。”^③同时咸丰帝也认为:俄国“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④由于这些原因,沙俄出兵“助剿”的计划暂时没有实现。



薛焕为沙俄“会剿”太平军、“代运南漕”
知照吴煦的密札(1860年12月16日)

但是,沙皇政府继续坚持武装干涉的反动立场,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1861年2月,沙俄决定将原定“赠送”的枪炮移交清政府。随后,它又决定任命海军上将阿·波波夫(颇颇福)率舰队到太平洋巡航,待机驶入长江,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⑤1861年8月后,俄国的枪炮陆续经由恰克

① 《始末》，咸丰朝，第69卷，第32页；夏燮：《中西纪事》，第20卷。

② 同上书，第42页。

③ 《始末》，咸丰朝，第72卷，第4—5页。参见威妥玛给英使普（卜）鲁斯的报告（1861年1月20日），译文参见《历史教学》杂志，1952年4月号。

④ 《始末》，咸丰朝，第69卷，第32页。

⑤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126页。

图、库伦运至北京、天津。沙俄政府并派军官泽福尔特和斐利偏廓到恰克图附近“教演”，同时向清政府重申，这是为了“与贵国和好，特摺真诚，设策平贼”。^①清政府用这批武器装备“神机营”和“天津洋枪队”。后来正是这些使用俄国枪炮的反动军队，镇压了山东、直隶和东北等地的农民起义军。

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年仅6岁的同治帝（1862—1874年）即位。11月，发生宫廷政变，同治帝生母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宣布垂帘



“中外会防公所”吴云等人为英、法、俄侵略军“出队攻打王家寺”给吴煦的情报（1862年4月4日）

听政，任命奕訢为议政王。经过这次政变，“洋务派”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一上台，立即决定“借师助剿”，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军阀也认为“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②外国侵略者通过奕訢等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终于酝酿成熟，他们把枪口一致对准了太平天国革命。

1861年12月，太平军占领宁波，攻克杭州；次年初，乘胜攻入奉贤、南汇、川沙，分途进逼上海。外国侵略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加紧拼凑中外反革命联合武装力量，抗拒太平军的攻势。1862年1月间，太平军前锋部队直逼吴淞。该处法军悍然

① 《始末》，同治朝，第3卷，第23页。

② 曾国藩：《遵旨通筹全局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5卷。

③ “吴煦档案”：“中外会防公所”潘曾玮等致吴煦函（1862年1月20日）。转引自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从“吴煦档案”看太平天国时期老沙皇的丑恶面目》，载《文物》杂志1976年第5期。

“常胜军”共2000余人，又“约同新到之俄国兵数十名”，携带大小车炮，配合清政府反革命武装，由上海开赴七宝，向驻守沪西王家寺的太平军发起猖狂进攻。太平军寡不敌众，相继放弃王家寺、龙珠庵，上海因此解严。^①4月中旬，大批侵略军侵占浦东南汇县的战略要地周浦镇。25日，太平军进行反击，当地的地主团练闻风北逃。这时窃据浦西天主堂的“俄兵四十名”，立即伙同洋枪队40名、团勇200名，赶到周浦，进行反扑，太平军被迫向东南撤退。^②5月6日，又有“英吉利、佛（法）兰西、俄罗斯三国兵三千余人”，会同清军数千，由松江进犯青浦，“西兵专攻南门”。12日城陷，守城太平军全部惨遭杀害。^③这是沙俄和英、法、美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自卫战中，太平军革命战士英勇抗敌，不避炮火，给中外反革命联军以沉重的打击。4月，在王家寺击伤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5月，在奉贤南桥镇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接着，又收复嘉定、青浦，挺进松江，进抵沪郊。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④显示了农民阶级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

不久，曾国藩的反革命湘军水陆并进，直逼天京；太平军西线告急，东线主力应召回师西援。在上海的中外反革命势力获得了喘息和整顿的机会，很快又向太平军扑来。^⑤正当天京被围，太平天国腹背受敌的时候，沙俄再次阴谋增派海军来华，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为此，沙俄驻华使馆的成员彼奇罗夫奉命于1862年秋到上海与清廷地方当局进行了多次密谈，并亲自向正在日本待命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波波夫做了报告。^⑥同时，俄国驻华公

① 董恂：《洋兵纪略》。参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第540—541页。另据“吴煦档案”所载“中外会防公所”吴云等人当时给吴煦的情报，这次“出队攻打王家寺”的俄国兵为44人。见《文物》杂志1976年第5期。

② “吴煦档案”：“中外会防公所”给吴煦的“浦东探报”（1862年4月25日）。参见《文物》杂志1976年第5期。

③ 姚济：《小沧桑记》。参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第496—497页；程其珏：《娄县续志》，1879年出版，第13卷，“兵事志”。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95页。

⑤ 1862年7月21日，奕訢在致卜鲁斯的照会中说，正是由于英、法、俄等国军队的“合作”，才使上海解围，并重新攻占宁波。见《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叛乱的后续文书》，1863年伦敦出版，第68页。

⑥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叛乱的后续文书》，1863年伦敦出版，第121页。

使巴留捷克照会清政府：沙皇“欲贵国复回太平”，已决定派遣波波夫“带领兵船，前赴中国；如果贼匪扰乱紧要海口，本地方官独力难支，该提督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①巴留捷克还向奕訢声明：波波夫到上海后，可令其与当地统兵官一起，“察看何处情形吃重”，就到那里“会剿”，“冬初（可在南省各口相助）。他甚至表示“不肯收受雇价”，“专为和好，并无他意”。^②清政府当即表示“准其带兵前来助剿”，并密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通商大臣薛焕、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等届时与波波夫“当面商定，妥速办理”。^③



沙俄公使巴留捷克为波波夫带领兵船来华镇压
太平军致清政府的照会（1862年10月11日）

12月7日，波波夫率领兵船三艘，驶抵上海。9日，会见李鸿章，宣称沙皇与中国皇帝“实心和好，闻海口不靖，派令前来帮同堵剿。现带到兵船三只，余船分布东洋，自日本以至黑龙江，所在皆有，听调即来”。^④李鸿章本来打算请波波夫“在上海、宁波与英、法二国合力办理”。^⑤但当时英、法已把江浙一带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沙俄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插足。在

① 《东华续录》，同治朝，第13卷，第51页；《始末》，同治朝，第9卷，第48页。

② 《始末》，同治朝，第9卷，第50页。

③ 《清穆宗实录》，第41卷，第56—59页；《始末》，同治朝，第9卷，第52页。

④ 董恂：《洋兵纪略》。参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第550页。

⑤ 《始末》，同治朝，第10卷，第48页。

波波夫来沪前，何伯曾多次诘问李鸿章：“俄国因何派兵来此”，扬言“有他即用不着我”；在宁波的英、法侵略者也通过宁绍台道史致谔向李鸿章声明：“不愿俄兵在彼泊防”。^①李鸿章虽觉波波夫“词气礼节，较之英、法兵官更为逊顺”，但因害怕得罪英、法，不敢将俄兵“轻调入江”，或“派防别口”，只好“令该兵船暂驻上海”。^②不久，沙俄为了集中力量镇压行将来临的1863年波兰起义，对付在欧洲日益加剧的俄、英矛盾，也不得不放弃原定的“助剿”计划。^③1863年四五月间，沙俄海军大臣根据外交部的意见，命令波波夫率舰队驶离中国海面。^④尽管如此，沙俄派遣海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了。

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坚持斗争十余年、几乎席卷全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于在1864年失败了。外国侵略者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太平天国革命烈士、干王洪仁玕在英勇就义时，曾痛切地感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⑤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更着重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⑥这个血的教训，每个革命者都应牢牢记住。

① 《始末》，同治朝，第11卷，第10页；李鸿章：《（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上曾相（国藩）》，参见《朋僚函稿》，第3卷。

② 董恂：《洋兵纪略》。参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第550页。参见李鸿章《（同治元年）十月二十日上曾相（国藩）》，参见《朋僚函稿》，第3卷。

③ 1863年2月4日沙俄外交大臣通知英国驻俄大使说：“由于俄国在中国海面兵力有限，帝国政府不能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十分有效的援助来对付叛乱者。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帝国政府与法、英两国政府的观点是相同的。”参见《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叛乱的后续文书》，1863年伦敦出版，第155页。

④ 马尔金：《沙皇俄国与美国内战》，1939年列宁格勒出版，第246页；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126页。

⑤ 《洪仁玕自述》。参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第853页。

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40页。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 马齐等编：《清圣祖实录》，300卷。
- 鄂尔泰等编：《清世宗实录》，159卷。
- 庆桂等编：《清高宗实录》，1500卷。
- 曹振鏞等编：《清仁宗实录》，374卷。
- 文庆等编：《清宣宗实录》，476卷。
- 贾桢等编：《清文宗实录》，356卷。
- 宝璽等编：《清穆宗实录》，374卷。
- 世续等编：《清德宗实录》，579卷。
-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乾隆朝，120卷。
-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50卷。
-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道光朝，60卷。
- 潘颐福编：《东华续录》，咸丰朝，69卷。
-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同治朝，100卷。
- 和坤等撰：乾隆《大清一统志》，424卷。
- 穆彰阿等撰：嘉庆《大清一统志》，560卷。
-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80卷。
-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事例》，920卷。
- 柯劭忞等撰：《清史稿》，534卷。
- 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20卷。
- 鄂尔泰等撰：《八旗通志》，初集，250卷。
- 不著撰人名氏：《八旗通志》，二集，354卷。
- 董诰等撰：《皇清职贡图》，8卷。

- 嵇璜等撰：《清朝文献通考》，300卷。
- 魏枢等撰：《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版，48卷。
- 阿桂等撰：《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版，130卷。
- 西清撰：《黑龙江外记》，8卷。
- 张伯英等撰：《黑龙江志稿》，62卷。
- 萨英额撰：《吉林外纪》，10卷。
- 李桂林等撰：《吉林通志》，122卷。
- 杨宾撰：《柳边纪略》，5卷。
- 图理琛撰：《异域录》，2卷。
- 方式济撰：《龙沙纪略》，1卷。
- 吴振臣撰：《宁古塔纪略》，1卷。
- 英和撰：《卜魁纪略》，1卷。
- 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8卷。
- 魏源撰：《圣武记》，14卷。
- 何秋涛撰：《朔方备乘》，81卷。
- 曹廷杰撰：《东北边防辑要》，2卷。
- 曹廷杰撰：《东三省舆地图说》，1卷。
- 曹廷杰撰：《西伯利东偏纪要》，1卷。
- 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6卷。
- 石荣璋著：《库页岛纪略》，4卷。
- 孙容图等撰：《瑗珲县志》，14卷。
- 郭克兴编：《黑龙江乡土录》，1册。
-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80卷。
-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80卷。
- 宝璽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218卷。
- 吴大澂撰：《皇华纪程》，1卷。
- 顾廷龙编：《吴憲斋先生年谱》，1935年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 刘爽著：《吉林新志》，1931年辽东编译社出版。
- 夏燮撰：《中西纪事》，24卷。
- 李金镛撰：《珲陵偶存》，载《渐学庐丛书》。
- 丁寿祺撰：《海隅丛事录》，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第3帙。

魏声和著：《鸡林旧闻录》，2册，1913年吉长日报社出版。

董恂编：《洋兵纪略》。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

姚济撰：《小沧桑记》。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

静吾等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195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北京出版。

康熙时编绘：《皇舆全览图》，36幅。

阿桂等绘：《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25幅。

邹世诒等绘：《大清一统舆图》，31卷。

崔祥奎等绘：《黑龙江舆地图》，61幅。

附录二

俄文参考书目

Алексеев А. И.

Амур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1849—1855 гг. М., 1974. (阿列克谢耶夫：
《1849—1855年阿穆尔勘察队》，1974年莫斯科出版。)

Амур—река подвигв. Хабаровск, 1970. (《阿穆尔——功勋之河》(文集)，
1970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版。)

Андреев А. И.

Рус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и Се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е в
XVIII веке. М., 1948. (安德列耶夫：《十八世纪俄国在太平洋和北美
洲的发现》，1948年莫斯科出版。)

Арсеньев В. К.

В дел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М., 1951.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
区丛林中》，1951年莫斯科出版。)

Арсеньев В. К.

Китайц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Хабаровск, 1914.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
里地区的中国人》，1914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版。)

Бабков И.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службе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859—1875 г. СПб.,
1912.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彼
得堡出版。)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 1882年喀山出版。)

Барсуков Иван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кн. I—II, М., 1891.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 1891年莫斯科出版。)

Бартольд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 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

Бендер Н. А.

Имена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на карте мира. М., 1948. (宾杰尔:《世界地图上的俄国人名》, 1948年莫斯科出版。)

Берг Л. С.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62. (勒·别尔格:《俄国地理发现史》, 1962年莫斯科出版。)

Берг Л. 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2-е издани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Л., 1949. (勒·别尔格:《俄国地理发现史纲》, 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Буксгевден А.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й. Очерк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1. Пек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860 г. Порт-Артур, 1902.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 1902年旅顺出版。)

Васильев А. П.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т. II—III, Чита, 1916—1918.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 第2—3卷, 1916—1918年赤塔出版。)

Венюков М.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Приамурью, Китаю и Японии. Хабаровск, 1952. (维纽科夫:《阿穆尔地区、中国和日本之行》, 1952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版。)

Венюков М.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окраинам русской Азии и записки о них. СПб., 1868.
(维纽科夫:《俄国亚洲边区旅行记》, 1868年彼得堡出版。)

Винокуров И. и флоричФ.

Подвиг адмирала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М., 1951. (维诺库罗夫、弗洛里奇:
《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将的功勋》, 1951年莫斯科出版。)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ерия I, т. 1—4, 6; Серия
II, т. 1, М., 1960—1972.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俄
国外交部文件集), 第1—2集, 1960—1972年莫斯科出版。)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 (гл. ред.)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2, М., 1948—1950. (维辛斯基主编:
《外交辞典》, 1948—1950年莫斯科出版。)

Гонсович Е. В.

Истор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14. (冈索维奇:《阿穆尔边
区史》, 1914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Грачев В. 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к России (1850—1860г.)
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ий, 1920. (格拉切夫:《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
1920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出版。)

Гре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1725—1765
гг. М., 1960. (葛列科夫:《1725—1765年俄国地理发现史概要》, 1960年
莫斯科出版。)

Громько А. А. (гл. ред.)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3, М., 1960—1964. (葛罗米柯主编:
《外交辞典》, 1960—1964年莫斯科出版。)

Груздев Ф.

Амур (природа и люди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Пб., 1900. (格鲁兹捷夫:
《阿穆尔》, 1900年彼得堡出版。)

Давидов Д. А.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1. (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 1911年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出版。)

Доклады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кружной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алаты по вопросам эконом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2. (《滨海区工商厅关于俄国远东经济问题的报告》，192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Ефимов И. В.

Заметки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Граф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пред судом профессора. П. Н. Буцинского. СПб., 1896. (伊·叶菲莫夫：《布钦斯基教授对穆拉维约夫伯爵的评论和回忆》，1896年彼得堡出版。)

Ефимов А. В.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ека. М., 1948. (叶菲莫夫：《俄国考察太平洋史片断(十八世纪上半叶)》，1948年莫斯科出版。)

Ефимов А. В.

Из истории великих рус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49. (叶菲莫夫：《伟大的俄国地理发现史片断》，1949年莫斯科出版。)

Жданко М.

Роль моряк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0. (日丹科：《水兵在俄国远东的作用》，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Жданко М.

Памяти адмирала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г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3. (日丹科：《纪念海军上将格·伊·涅维尔斯科依》，191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Кабанов П. И.

Аму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9.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1959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Каманин Л. Г.

Пер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51. (卡马宁：《最初的远东考察者》，1951年莫斯科出版。)

Канцелярия Комит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Материал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земельн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и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азачьих войск. выпуск I—II. СПб., 1902. (大臣委员会办公厅编:《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哥萨克部队土地和经济条例资料》, 1902年彼得堡出版。)

Кириллов А. В.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в Амурскую Область.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 Р. Г. О.» 1895. (基利洛夫:《阿穆尔省的移民》, 载《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分会会员著作集》, 1895年出版。)

Корсак А. Ф.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 1857年喀山出版。)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П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данным. СПб., 1892. (《阿穆尔边区概述》(据官方材料编著), 1892年彼得堡出版。)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 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 и 1806 годах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М., 1950. (克鲁逊什特恩:《1803—1806年环球航行记》, 1950年莫斯科出版。)

Лебедев Д. М.

Плавание А. И. Чирикова на пакетботе “Св. Павел” к побережьям Америки. М., 1951. (列别杰夫:《契里科夫乘“保罗”号邮船到美洲沿岸航行记》, 1951年莫斯科出版。)

Левин К. Н.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 другие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СПб., 1907—1910. (列文、波克罗夫斯基等著:《十九世纪俄国史》(丛书), 1907—1910年彼得堡出版。)

Лисянский Ю. 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е” в 1803—1806 годах. М., 1947. (李祥斯基:《“涅瓦”号环球游历记(1803—1806)》, 1947年莫斯科出版。)

Лященко П. И.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т. I и II. М., 1947—1948.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 第1—2卷, 1947—1948年莫斯科出版。)

Маак Р. К.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мур. СПб., 1859.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 1859年彼得堡出版。)

Магидович И. П.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ий. М., 1967. (马基多维奇:《地理发现史纲》, 1967年莫斯科出版。)

Мартенс Ф. Ф.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Пб., 1881.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 1881年彼得堡出版。)

Матвиев К.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0. (马特维耶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城简史》, 1910年海参崴出版。)

Мичи 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Амуру и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СПб.-М., 1868. (米琪:《沿黑龙江和东西伯利亚旅行记》, 1868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

Надаров И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зучению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выпуск XXVI. СПб., 1887. (纳达罗夫:《乌苏里地区研究资料》, 载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编:《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 第26册, 1887年彼得堡出版。)

Надаров Ив.

Север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выпуск XXVII, СПб., 1887. (纳达罗夫:《北乌苏里地区》, 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 第27册, 1887年彼得堡出版。)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1895. М., 1956.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 1956年莫斯科出版。)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и друг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с конца XVI в. до 1917г. М., 1973. (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从十六

世纪末至一九一七年)》，第1卷，1973年莫斯科出版。）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849—1855. М., 1947. (涅维尔斯科依：《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9—1855)》，1947年莫斯科出版。)

Невский В.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под русским флагом, первое кругосвет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русских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 в 1803—1806 годах. М. Л., 1953. (涅夫斯基：《在俄国旗帜下的环球航行：俄国人乘坐“希望”号和“涅瓦”号船只首次环球航行记(1803—1806)》，1953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Невский В.

Перв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россиян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М., 1951. (涅夫斯基：《俄国人首次环球航行记》，1951年莫斯科出版。)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Из Амурской летописи (1689—1858 гг.). 《Записки Амурск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музея краевед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а краеведения》，т. IV,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8. (诺维科夫-达翰尔斯基：《阿穆尔大事记(1689—1858)》，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4册，1958年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2-й: Сибирь в составе феодальной России. Л., 1968. (奥克拉德尼科夫主编：《西伯利亚史》，第2卷，1968年列宁格勒出版。)

Пежемский П. И. и Кротов В. А.

Иркут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Иркутск, 1911. (佩热姆斯基、克罗托夫合编：《伊尔库茨克编年史》，1911年伊尔库茨克出版。)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т. I. СПб., 1914. (俄国土地规则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俄国亚洲部分》，第1卷，1914年彼得堡出版。)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войны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XIX столет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23. (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 1923年莫斯科出版。)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н. 1—3, М., 1966—1967. (波克罗夫斯基:《波克罗夫斯基选集》, 1966—1967年莫斯科出版。)

Попов А. А.

Цар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эпоху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21. 1927. (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 载苏联《红档》杂志 1927年第21卷。)

Потемкин В.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т. I. М., 1941. (波爵姆金等编:《外交史》, 第1卷, 1941年莫斯科出版。)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1867—1869. М., 1937. (普尔热瓦尔斯基:《乌苏里地区旅行记(1867—1869)》, 1937年莫斯科出版。)

Прохоров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М., 1975.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 1975年莫斯科出版。)

Рожкова М.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а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 втор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и рус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М., -Л., 1949.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 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Розов А. И.

Кругосветным путем из Москвы на Амур и по Сибири. М., 1889. (罗佐夫:《环球旅行:从莫斯科到黑龙江和西伯利亚》, 1889年莫斯科出版。)

Романов Б. А.

Росс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2—1906). Л., 1928.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 1928年列宁格勒出版。)

Рябов Н. И. и Штейн М. Г.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XVII—начало XX века. Хабаровск, 1958. (里亚鲍夫、斯坦因:《俄国远东史纲》, 1958年哈巴罗夫

斯克（伯力）出版。）

Саввин В. 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619—1927. М. - Л., 1930. (萨文：《沙俄及苏联与中国的相互关系（1619—1927）》，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Семенов П. П.

Живописная Россия. т. XII,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СПб.-М., 1895.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2卷，第2分册，1895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

Рус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СПб., 1883. (斯卡列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贸易》，1883年彼得堡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1917 г.). М., 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1974年莫斯科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1957.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1957年莫斯科出版。)

Смирнов Е. Т.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на Амурско-Приморской выставке 1899 г. в гор. Хабаровске. Хабаровск, 1899. (斯米尔诺夫：《在1899年哈巴罗夫斯克举办的阿穆尔—滨海地区展览会上的阿穆尔边区》，1899年伯力出版。)

Солярский 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равовое и культур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нородцев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Хабаровск, 1916. (索利亚尔斯基：《阿穆尔地区异族目前的法律和经济文化地位》，1916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出版。)

Сотрудники Общезем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иамурье. М., 1909. (帝俄地方自治会编：《黑龙江地区》，1909年莫斯科出版。)

Стеклов Ю.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его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1814—1816.

т. I, М., 1926. (斯杰克洛夫:《巴枯宁传》,第1卷,1926年莫斯科出版。)

Татишев С. С.

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 его жизнь 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СПб., 1911. (塔吉谢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传》,1911年彼得堡第2版。)

Тихомиров М. Н. и Дмитриев С. С.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т. I.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1861Года) М., 1948. (季霍米罗夫、德米特里耶夫编:《苏联通史》,第1卷,1948年莫斯科出版。)

Тренев В. К.

Г. И. Невельской (1813—1876) . М., 1950. (特列涅夫:《格·伊·涅维尔斯科依传》,1950年莫斯科出版。)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ека) . М., 1882.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1882年莫斯科出版。)

Туземный Подотдел Отдел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Д. Р. К.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туземн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ыпуск I, Чита, 1924. (远东革命委员会土著管理分局编印:《远东土著问题资料》,第1集,1924年赤塔出版。)

Унтербергер П. Ф.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856—1898гг. Очерк. СПб., 1900. (翁特贝格尔:《滨海省(1856—1898)》,1900年彼得堡出版。)

Файнберг Э. Я.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697—1875 гг. М., 1960. (法因别尔格:《俄日关系(1697—1875)》,1960年莫斯科出版。)

Ходоров А. Е.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и изуч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М., № 25, 1929. (霍多罗夫:《波克罗夫斯基与远东研究》,载苏联《新东方》杂志,莫斯科出版,1929年第25期。)

Хохлов А. Н.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Китаю в конце 50-х-начале 60-х годов XIX в.

《Стран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 1967. (霍赫洛夫：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俄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载《远东和东南
亚各国》，1967年莫斯科出版。)

Шрейдер Д. И.

Наш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три года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СПб., 1897.
(什列伊杰尔：《我们的远东（乌苏里边区三年）》，1897年彼得堡出版。)

Ядринцев Н. М.

Сибирь как колония, к юбилею трехсотле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ибири: Ея нужды и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Еяпрошлое и будущее. СПб., 1882.
(亚德连采夫：《西伯利亚殖民地三百周年纪念：它的现状、需求、过去和未
来》，1882年彼得堡出版。)

附录三

西文参考书目

Allgood, G.

China War 1860: Letters and Journal, London, 1901. (奥勒古:《1860年对华战争:书信和杂记》,1901年伦敦出版。)

Atkinson, T. W.

Travels in the Region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Amoor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s on the confines of India and China, London, 1860. (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的旅行》,1860年伦敦出版。)

Banno, Masataka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起源》,1964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

Bonner-Smith, D. and Lumby, E. W. R., ed.

The Second China War 1856—1860, England, 1954. (邦纳—史密斯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1954年英国出版。)

British Government Documents, Parliamentary Papers (Blue Books):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通信》。)

——,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 (《英国议会文书》,《有关中国事务的通信(1859—1860)》。)

——,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 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国叛乱的文书》。)

——,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 (《英国议会文书》, 《关于中国叛乱的后续文书》。)

Cady, John F.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Ithaca, N. Y., 1954, (加迪:《法国在东亚帝国主义扩张的根源》, 1954年纽约出版。)

Chen, Agnes Fang-Chih

“Chinese Frontier Diplomacy: The Eclipse of Manchuria 1858—1860”,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V, No. I, July 1950. (陈芳芝:《中国边疆外交——东北的侵蚀(1858—1860)》, 载《燕京社会科学学报》, 第5卷第1期, 1950年7月。)

Cluhb O. E.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London, 1971. (克拉布:《中国和俄国》, 1971年纽约、伦敦出版。)

Clyde, P. H.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in Manchuria 1689—1922,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28. (克莱德:《满洲的国际竞争(1689—1922)》, 1928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

Cordier, Henri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3 vols., Paris, 1901—1902. (高第:《中国对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0)》, 1901—1902年巴黎出版。)

——,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57—1858: Histoire diploma-*

tique, notes et documents, Paris, 1905. (高第:《1857—1858年对中国的远征》, 1905年巴黎出版。)

——, *L'expédition de Chine de 1860: Histoire diplomatique, notes et documents*, Paris, 1906. (高第:《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 1906年巴黎出版。)

Costin, W. C.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1937. (柯斯廷:《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 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

Coxe, W.

Account of the Russian discoveries between Asia and America, London, 1787. (考克斯:《俄国人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发现记述》, 1787年伦敦出

版。)

Dauids, Jules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ies I, 1842—1860, U. S. A., 1973. (戴维兹编:《美国外交与政府文件:美国与中国(1842—1860)》,第1辑,1973年美国出版。)

Foust, Clifford M.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U. S. A., 1969. (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1969年美国出版。)

Gibson, James R.

Feeding the Russian Fur Trade, Provisionment of the Okhotsk Seaboard and the Kamchatka Peninsula, 1639—1856, London, 1969. (吉布森:《俄国的毛皮贸易与粮食供应(1639—1856)》,1969年伦敦出版。)

Golder, F. A.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1914年美国克利夫兰出版。)

Hoo Chi-tsai

Les bases conventionnelles des relations modernes entre la Chine et la Russie, Paris, 1918. (胡世泽:《近代中俄关系的条约根据》,1918年巴黎出版。)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2 vols. Washington, 1943, 1944.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1943—1944年华盛顿出版。)

Kerner, R. J.

The Urge to the Sea. 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 Berkeley, 1942. (克纳:《向海洋的推进》,1942年伯克利出版。)

Knollys, Henry

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Compiled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s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 Commander of the English Expedition. Edinburgh and London, 1875. (诺利斯:《1860年对华战争》,1875年爱丁堡、伦敦出版。)

Krausse, A. S.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 1558—1899, London, 1900.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1558—1899)》,1900年伦敦出版。)

Leavenworth, Ch. S.

The Arrow war with China, London, 1901. (李文沃斯:《亚罗战争》,1901年伦敦出版。)

Lensen, G. A.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N. Y., 1971. (伦森:《俄国向日本的推进:俄日关系(1697—1875)》,1971年纽约出版。)

Lin, T. C.

“The Amur Frontier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34, Vol. 3. (林同济:《中俄黑龙江边界问题》,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34年第3卷。)

Lobanov-Rostovsky, A.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1933.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1933年纽约出版。)

Malozemoff, A.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195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Mancall, Mark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Papers on China, vol. 10, Harvard University, 1956. (曼考尔:《伊格纳切夫少将的出使北京(1859—1860)》,载美国哈佛大学《有关中国论文集》,1956年第10号。)

Michie, Alexander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2 vols., London, 1900. (米琪(立嘉、宓吉):《阿礼国传》,1900年伦敦出版。)

Michie, Alexander

The Siberian overland route 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 London, 1864. (米琪:《从北京经西伯利亚到彼得堡的陆上路线》,1864年伦敦出版。)

Mitchell, M.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Russia 848—1948, N. Y., 1969. (米切尔:《俄国海事史(848—1948)》, 1969年纽约出版。)

Moges, Marquis de

Recollections of Baron Gros's Embassy to China and Japan in 1857—1858, Paris, London, 1860. (莫日侯爵:《1857—1858年葛罗男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的回忆》, 1860年巴黎、伦敦出版。)

Okun, S. B.

The Russian-American Company, translated by Carl Ginsburg, Mass., 1951. (奥孔:《俄美公司》, 1951年美国马萨诸塞出版。)

Oliphant, Laurence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1858, 1859, 2 vols., London, 1860. (俄理范:《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和日本纪实(1857—1859)》, 1860年伦敦出版。)

Pavlovsky, M. N.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 Y., 1949. (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 1949年纽约出版。)

Pokrovsky, M. N.

Brief History of Russia, 2 vols., London, 1933.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 1933年伦敦出版。)

Putnam, Weale, B. L.

Manchu and Muscovite, N. Y., 1907. (普特南·魏尔(辛博森):《满洲人和俄国人》, 1907年纽约出版。)

Quested, R. K. I.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Kuala Lumpur, 1968. (奎斯特德:《俄国在亚洲的扩张(1857—1860)》, 1968年吉隆坡出版。)

Ravenstein, E. G.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London, 1861. (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 1861年伦敦出版。)

Rennie, D. F.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Peking, 2 vols., London, 1865. (芮尼:《北京和北京人》, 1865年伦敦出版。)

Semyonov, Yuri

The Conquest of Siberia, London, 1994.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征服记》,1944年伦敦出版。)

Semyonov, Yuri

Siberia, Its Conquest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63. (尤里·谢缅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和发展》,1963年伦敦出版。)

Stephan, John J.

Sakhalin, A History. London, 1971. (斯蒂芬:《库页岛史》,1971年伦敦出版。)

Vernadsky, G.

Political & Diplomatic History of Russia. Boston. 1936. (弗纳德斯基:《俄国政治和外交史》,1936年波士顿出版。)

Vevier, Charles, ed.

Siberian Journey: Down 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 A New Edition of A Voyage Down the Amoor by Perry McDonough Collin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弗维尔编,柯林斯著:《西伯利亚纪行——从黑龙江到太平洋(1856—1857)》,1962年威斯康星大学出版。)

Vladimir (Volpicelli, Zenone)

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 London, 1899, (弗拉基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与西伯利亚铁路》,1899年伦敦出版。)

Walrond, Theodore, e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London, 1872. (瓦尔朗编:《额尔金伯爵的书信和日记》,1872年伦敦出版。)

Widmer, Eric G.

“Archimandrite Palladius and Chinese Control of Barbarians in 1858,” Papers on China, Vol. 19,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威德默:《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和中国的夷务》,载美国哈佛大学《有关中国论文集》,1965年第19号。)

Wright, G. F.

Asiatic Russia, 2 vols. N. Y., 1902. (赖特:《俄属亚洲》,1902年出版。)

附录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А

Аввакум 阿瓦库姆 (安文公)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еев А. И.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塞·米
哈伊洛维奇
Андреев А. И. 安德列耶夫
Арсеньев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
Ахте 阿赫杰

Б

Бабков И. Ф. 巴布科夫
Бакунин М. А. 巴枯宁
Баллюзек Л. Ф. 巴留捷克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班蒂什-卡缅斯基
Баранов И. Г. 巴拉诺夫
Барсуков Иван 巴尔苏科夫
Бартольд В. 巴托尔德
Баснин 巴斯宁
Безбородко А. А. 别兹鲍罗德科
Бендер Н. А. 宾杰尔

Берг 别尔格

Берг Л. С. 勒·别尔格
Беринг В. 白令
Бошняк Н. К. 博什尼亚克
Братищев В. Ф. 布拉吉谢夫
Брюс Я. В. 勃柳斯
Будогосский. 布多戈斯基
Буссе Н. В. 尼·布谢
Буссе Ф. 布谢
Бутурлин С. А. 布图尔林
Буцинский П. Н. 布钦斯基

В

Ваганов В. В. 瓦加诺夫
Вамбуев 瓦姆布耶夫
Васильев А. П. 瓦西里耶夫
Ватовский 瓦托夫斯基
Венюков М. И. 维纽科夫
Винокуров И. 维诺库罗夫
Волконский М. С. 沃尔康斯基
Вольф 沃利夫
Воронцов А. Р. 沃隆佐夫
Врангель Ф. П. 符兰格尔

Вронченко Ф. П. 符隆钦科
Вьшинский А. Я. 维辛斯基

Г

Гаврилов А. М. 加夫利洛夫
Гагарин С. Н. 加加林
Гвоздев М. С. 格沃兹杰夫
Гмелин И. Г. 格麦林
Головкин Ю. А. 戈洛夫金
Гонсович Е. В. 冈索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 М. 哥尔查科夫
Горький М. 高尔基
Греков В. И. 葛列科夫
Громько А. А. 葛罗米柯
Грот Э. В. 格罗特
Груздев Ф. 格鲁兹捷夫
Гурий 固礼 (固里)

Д

Давидов Д. А. 达维多夫
Давыдов Г. И. 格·达维多夫
Дмитриев С. С. 德米特里耶夫

Е

Екатерина I 叶卡捷琳娜一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лисеев А. В. 叶利谢夫
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伊丽莎白·彼得
洛夫娜
Ефимов А. В. 叶菲莫夫
Ефимов И. В. 伊·叶菲莫夫

Ж

Жданко М. 日丹科
Жуков Е. М. 茹科夫

З

Заборинский А. И. 札博林斯基
Завалишин Д. И. 札瓦利申
Завойко В. С. 札沃依科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П. А. 札依翁契可夫
斯基
Зейм 泽伊姆
Зейфорт И. А. 泽福尔特

И

Игнатьев Н. П. 尼·巴·伊格纳切
夫 (伊格那提业幅)
Избрант Идес 义杰斯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

К

Кабанов П. И. 卡巴诺夫
Казакевич П. В. 卡札凯维奇
Каманин Л. Г. 卡马宁
Канкрин 坎克林
Карсаков М. С. 卡尔萨科夫
Кириллов А. В. 基利洛夫
Киселев П. Д. 基谢列夫
Кладо 克拉多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 П. 科瓦列夫斯基
Козьмин П. Т. 库兹明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康士坦丁·
尼古拉耶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А. М. 柯尔尼洛夫
Корсак А. 柯尔萨克
Корф А. Н. 科尔弗
Кропотов 克罗波托夫
Кротов В. А. 克罗托夫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 Ф. 克鲁逊什特恩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Л

Лаба 拉巴

Лавинский А. С. 拉文斯基

Ладьженский 拉狄仁斯基

Ланг Лоренц 郎克

Лебедев Д. М. 列别杰夫

Левин К. Н. 列文

Лисянский Ю. Ф. 李祥斯基

Лихачев 利哈乔夫

Лишин 利申

Лященко П. И. 梁士琴科

М

Маак Р. 马克

Магидович И. П. 马基多维奇

Марголин А. Б. 马尔戈林

Мартенс Ф. Ф. 马尔坚斯

Матвиев К. 马特维耶夫

Матюнин Н. 马丘宁

Меньшиков А. Д. 阿·缅施科夫

Меньшиков А. С. 阿·斯·缅施科
夫

Мессершмидт Д. Г. 麦谢尔什米特

Миддендорф А. Ф. 米登多尔夫

Миллер Г. Ф. 米勒尔

Мичи А. 米琪

Муловский Г. И. 穆洛夫斯基

Муравьев Н. Н. 穆拉维约夫 (木哩
斐岳幅)

Мятлев В. А. 米亚特列夫

Н

Надаров Ив. 纳达罗夫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纳罗奇尼茨基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涅维尔斯科依

Невский В. В. 涅夫斯基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 В. 涅谢尔迭迭

Нечкина М. В. 涅奇金娜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Новиков-Даурский Г. С. 诺维科夫-
达斡尔斯基

О

Д'Овре 奥夫莱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Окунь С. Б. 奥孔

Орлов Д. И. 奥尔洛夫

Фон Остен-Сакен 冯·奥斯登·萨根

П

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 П. И.) 巴拉第
(卡法罗夫)

Паллас П. С. 帕拉斯

Пежемский П. И. 佩热姆斯基

Перовский Л. А. 勒·阿·彼罗夫斯
基Перовский П. Н. 彼·尼·彼罗夫斯
基 (丕业罗幅斯奇)

Петр I 彼得一世

Пещуров А. М. 毕休罗夫

Подушкин 波杜什金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

Попов А. А. 阿·波波夫 (颇颇福)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темкин В. П. 波爵姆金

Потемкин Г. А. 格·波爵姆金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普尔热瓦尔

斯基

Прохоров А. 普罗霍罗夫
Путятин Е. В. 普提雅廷 (布恬廷)

Р

Резанов Н. П. 列札诺夫
Родофиникин 罗多菲尼金
Рожков Н. А. 罗日科夫
Рожкова М. К. 罗日科娃
Розов А. И. 罗佐夫
Романов Б. А. 罗曼诺夫
Рудановский Н. В. 鲁达诺夫斯基
Румянцев Н. П. 鲁缅采夫
Руперт В. Я. 卢彼尔特
Рябов Н. И. 里亚鲍夫

С

Саввин В. П. 萨文
Салтыков Ф. С. 沙尔铁科夫
Свербеев Н. Д. 斯韦尔别耶夫
Сгибнев А. С. 斯基勃涅夫
Семенов П. П. 谢苗诺夫
Сенявин Л. Г. 谢尼亚文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 斯卡列科夫斯基
Скобельцын П. 斯科别里琴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
Смирнов Е. Т. 斯米尔诺夫
Соловьев С. Ф. 索洛维约夫
Соймонов П. А. 巴·索依莫诺夫
Соймонов Ф. И. 弗·索依莫诺夫
Солнцева В. 索尔恩采娃
Солярский В. В. 索利亚尔斯基
Сперанский М. М. 斯佩兰斯基
Стеклов Ю. 斯杰克洛夫

Стеклов Ю. 斯杰克洛夫

Струве Б. В. 司徒卢威
Сухожанет Н. О. 苏霍札涅特

Т

Татаринов 塔塔里诺夫 (明常)
Татищев С. С. 塔吉谢夫
Тевяшев 捷维雅舍夫
Тихомиров М. И. 季霍米罗夫
Тренев В. К. 特列涅夫
Трескин Н. И. 特列斯金
Трусевич Х. 特鲁塞维奇
Турбин 图尔宾
Турчанинов Н. С. 图尔查尼诺夫

У

Унтербергер П. Ф. 翁特贝格尔

Ф

Файнберг Э. Я. 法因别尔格
Филипенко И. И. 斐利偏廓
Флорич Ф. 弗洛里奇

Х

Хвостов Н. А. 赫沃斯托夫
Хилковский 希尔科夫斯基
Ходоров А. Е. 霍多罗夫
Хохлов А. Н. 霍赫洛夫

Ч

Чехов А. П. 契诃夫
Чернишев А. И. 车尔尼雪夫
Чириков А. И. 契里科夫

Ш

Шаховской Н. 沙霍夫斯科依
Шелихов Г. И. 谢里霍夫
Шельтинг А. Е. 谢利金

Шемелин Ф. 谢麦林

Шестаков И. 舍斯塔科夫

Шетилов В. 舍其洛夫

Шимкевич П. П. 希姆克维奇

Шимкович 什姆科维奇

Шипелев 什别列夫

Шишмарев Я. П. 希什马廖夫

Шлямин Б. 什利亚明

Шрейдер Д. И. 什列伊杰尔

Штейн М. Г. 斯坦因

Шtrandман Г. 斯特兰德曼

Шульгин 舒利金

Э

Этолин 埃托林

Я

Ядринцев Н. М. 亚德连采夫

Языков 亚兹科夫

Якобий В. В. 弗·雅科比

Якобий Иван 伊万·雅科比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А

Азовское море 亚速海

Айгунь 瑗珲

Албазин 阿尔巴津 (雅克萨)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пост 亚历山大哨所

Алеутские острова 阿留申群岛

Аляска 阿拉斯加

Амгунь, р. 阿姆贡河 (亨滚河)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 (黑龙江)

Анива, зал. 阿尼瓦湾

Анива, мыс 阿尼瓦角

Ануй, р. 阿纽依河 (顿顿河)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河

Аскольд, о. 阿斯科尔德岛 (青岛)

Аян 阿扬

Б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柏海儿湖)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 (海兰泡)

Булава 布拉瓦 (普禄)

Бурея, р. 布列亚河 (牛满河)

Бурея, хр. 布列亚山

Буссе, станица 布谢村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Бянкино 边金诺

В

Верхне-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посел. 上米哈依洛夫村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Г

Гавай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夏威夷群岛

Гиллой, р. 基柳依河 (古里河)

Горбица, р. 格尔必齐河

Горин, р. 葛林河

Горнет, мыс 果尔涅特角

Д

Далайнор, оз. 呼伦池

“Даурия” “达斡里亚” (达斡尔地方)

Де-Кастри, гавань 迭卡斯特里湾

(克默尔湾, 又名南格玛尔湾)

Джай, мыс 扎依

Джилийский залив 直隶湾 (渤海湾)

Дон, р. 顿河

З

Зайсан, оз. 斋桑湖

Зейский пост 结雅哨所

Зея, р. 结雅河 (精奇里江)

И

Ипшинский пост 伊利印斯克哨所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гавань 皇帝港

Ингода, р. 音果达河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茨克

Искай, залив 伊斯开湾

Иссык-Купь, оз. 特穆尔图淖尔 (伊塞克湖)

К

Казакевич, станица 卡札凯维奇村

Кавказ 高加索

Казань 喀山

Капган 张家口

Калифорния 加利福尼亚

Камень-Рыболов, п. 结土崖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

Карсаков, станица 卡尔萨科夫村

Кашгар 喀什噶尔

Кизи, оз. 奇集湖

Кизи, с. 奇集屯

Коканд 浩罕

Комсомольск-на-Амуре 共青城

полуостр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а 康士坦丁半
岛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пост 康士坦丁哨
所

Корея 朝鲜

Котунь, 阔吞屯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рым 克里米亚

Кугеда, мыс 库艾格达岬

Кумарский пост 呼玛尔哨所

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千岛群岛

Кяхта 恰克图

М

Мариичск 马林斯克 (阔吞屯)

Н

Нангмар, зал. 南格玛尔湾 (克默尔
湾)

Нева, р. 涅瓦河

Невельской, станица 涅维尔斯科依
村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 (尼布楚)

Нижне-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посел. 下米
哈依洛夫村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пост 尼古拉耶夫斯克
哨所 (庙街)

Никольск 尼古拉斯克 (双城子)

Залив Св. Николая 圣尼古拉湾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гавань 诺夫哥罗德港

Ново-Архангельск 新阿尔汉格尔斯
克

Ново-Михайловск 诺沃米哈依洛夫斯
克

О

Ольгинская гавань 奥尔加湾 (石门

湾)	
Онон, р. 鄂嫩河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П	Т
Пашков 帕什科夫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鞑靼海峡
Пейхо 白河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Петербург (С.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圣彼得堡)	Тугур, р. 土古尔河
Залив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大彼得湾	Тула 图拉
Петровское зимовье 彼得冬营	Тумень-цзян (Тумень-ула) 图们江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 克	Тур, р. (Тур-бира) 土尔河
Поворотный, мыс 波沃罗特内角 залив Посьета, 波谢特湾 (摩阔崴)	Тыр 蒂尔 (特林)
С	У
Савеловка 黑顶子	Уда (Удь), р. 乌第河
Сахалин 萨哈林 (库页岛)	Уд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第堡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Урга 库伦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У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Ситха (Новоархангельск) 锡特卡	Усурийск 乌苏里斯克 (双城子)
Сихотэ-Алинь, хр. 锡霍特山脉	Усть-Стрелка 乌斯季-斯特列尔卡
Советская гавань 苏维埃港	Х
Софийск 索菲斯克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 (伯力)
Сретенск 斯列田斯克	Хаджи, зал. 哈吉湾
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 斯塔诺夫山脉 (外兴 安岭)	Ханка (Хинкай), оз. 兴凯湖
Суйфун, р. 绥芬河	Хива 希瓦
Суйфунск, селение 绥芬斯克	Хинганский пост 兴安哨所
Сунгарийский пост 松花江哨所	Хор, р. 霍尔河
Сунгача, р. 松阿察河	Хормолдзинь 霍勒木尔锦 (豁尔莫勒 津)
Сучан 苏城	Хубгу (Хубиту), р. 瑚布图河
залив Счастья 幸运湾	Хунгари, р. 宏加力河
	Хунгари, с. 宏加力村
	Ш
	Шабин-дабага 沙宾达巴哈
	Шанта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善塔尔群岛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河
	Шилкинский завод 石勒喀札沃德

Шкотово 什科托沃

Ц

Цурухайтуй 祖鲁海图

Ч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ита 赤塔

Я

Яблоновый хребет 雅布洛诺夫山脉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

Япония 日本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本卷叙述 19 世纪中叶沙俄凭借武力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走向，以及攫取通商权、领事裁判权等各种侵略特权的经过。本卷第一章论述《尼布楚条约》后 150 年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野心；第二章论述沙俄武装入侵我国黑龙江地区和逼签中俄《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第三章论述沙俄武力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迫订中俄《北京条约》；第四章论述沙俄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恶活动。